陸超祺 著



六四內部日記

《人民日報》內部兩派鬥爭秘密大公開

《新華社》謊報學運「軍情」把矛頭指向趙紫陽

「六四」期間北京九成四市民認為鄧小平應該全退

冰心《人民日報》撰文籲政府與學生對話

董建華霍英東支持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平息衝突

李鵬派錢予北京農民遊行「支持政府」

「六四」凌晨軍隊進城血洗「部長樓」

朱鎔基：「上海不派軍隊進城……比北京好。」

本書內容：

- 胡耀邦為保護劉賓雁王若望與鄧小平鬧翻
- 《新華社》謊報學運軍情把矛頭指向趙紫陽
- 保守派千方百計激怒學生圖激化矛盾渾水摸魚
- 「六四」期間北京90% 市民要求罷免李鵬
- 逾九成學生及市民主張鄧小平「全面退下」
- 冰心老人在《人民日報》撰文籲政府與學生對話
- 董建華霍英東支持召開緊急人大常委會平息衝突
- 八大上將向中央上書懇請軍隊切勿對學生動武
- 鄧小平親自拍板北京實施戒嚴軍管
- 李鵬派錢給北京農民上街遊行「支持
- 「六四」凌晨軍隊入城血洗「部長樓」
- 西長安街坦克輾過人群死傷無數
- 袁木開「記者會」不讓錄音不許紀錄
- 「老人幫」談血腥鎮壓：「空軍還沒動用呢！」
- 人民為電影《巍巍崑崙》中的國民黨將領熱烈鼓掌
- 76 年人們「掛小瓶（平）」，89 年人們「摔小瓶（平）」
- 朱鎔基說：「上海不派軍隊進城……比北京好。」
- 李瑞環「六四」後爭取讓胡啟立當天津市長不果
- 89 年國慶日通令國民禁止穿純黑純白衣著
- 中國四成大學生不願加入共產黨
- 大學生說：「現在是國民黨好，共產黨壞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

定價 HK$78.00
海外 US$16.00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以北京當局出動軍隊展開大屠殺結束，表面上看來，「六四」的非暴力抗爭是失敗了，但這場中共建國以來人民第一次以公開大規模的方式，向政府正面展開非暴力的民主訴求，影響必然是十分深遠的。

有關「六四」的書，市面上已有了不少，但由親歷了這場偉大民運的人士執筆，而有充份可信性的卻不多。這本《六四內部日記》正是少有的這類作品之一。

本書作者陸超祺，在「六四」時是中共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中最資深的一位，因為當時的總編輯與執行副總編都先後「病休」和請假，陸超祺實際上主持了當時《人民日報》的運作。因為《人民日報》在中共建制中的特殊地位，作者可以參加不少高層的內部會議，和得知許多內幕消息。這本書是作者當時的日記式記錄，從中可以看到當時中央權力鬥爭是何等的激烈和錯綜複雜。

除了中央權鬥的內情，書中也收入了《人民日報》記者採訪到大量有關民運的第一手資料，從其中讀者可以看到不少感人和發人深省的民情，從而知到，「六四」之後共產黨在人民的心目中，已是徹底的腐敗、墮落和破產了。



作者簡歷

陸超祺，1925 年生於廣西，1946～1948年就讀北京大學歷史系。1949年到《人民日報》工作，直至1990 年離休。在《人民日報》工作共41 年，先當記者（朝鮮戰爭時做隨軍記者，50 年代做駐上海記者），其後長期在編輯部擔任編輯和評論員職務。1978 年以後歷任總編室副主任、主任，1986 年後任副總編輯。1989 年「六四」期間，因總編輯及執行副總編同時「病休」，實際上擔任了執行總編輯之職，負責主持當時《人民日報》的運作。

六四
內部日記

陸超祺 著

卓越文化出版社
出 版

目　錄

「六・四」紀實

風暴之後

懷念胡耀邦

為了未能忘卻的記憶

——《六四內部日記》代序

「六・四」——偉大的民主運動15周年了。

1989年「六・四」的時候，我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一個副總編輯，負責主持每天報紙編輯出版工作。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6月4日鄧小平李鵬等血腥鎮壓群眾的這一段時間裡，我沒有參加過一次遊行，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沒有喊過一句口號，但我每天卻接觸到許多有關資訊。有在現場採訪的記者談的，有駐各省市記者發回來的，有駐國外記者發回來的，也有讀者直接向報社反映的。這些資訊有些編為新聞發表了，更多的是作為內部情況送給中央領導人參閱。應該說，無論是上面的領導意圖，還是工農兵學商、東西南北中廣大群眾的呼聲，我們還是比較瞭解的。

經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胡耀邦領導的真理標準討論和撥亂反正，我們已經不像文革前那樣以作共產黨的一顆螺絲釘和馴服工具為榮了。我們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斷是非。

然而《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在共產黨的經典語言裡，它是黨中央的喉舌，在政治上要與中央保持一致。作為《人民日報》的一個工作人員，我們

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完全本著自己的認識採編稿件，組織版面，有些文章根本不允許我們提意見，非登不可。影響極壞的「四·二六」社論，就是在趙紫陽出訪朝鮮期間，李鵬組織曾建徽、袁木按照鄧小平談話寫好後交《人民日報》發表的。這篇社論把愛國民主的群眾運動定性為「動亂」，不但引起廣大群眾的憤怒，報社絕大多數工作人員也有意見，後來報社部份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高呼「四·二六社論不是《人民日報》寫的」，就是這種不滿的表現。

我們是在憋悶的大氣候下辦報。我們力求通過報導緩和與化解黨、政府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力求避免出現第二個胡耀邦（趙紫陽被迫辭職）。我們既要盡可能地反映各界群眾的訴求，又要避免授人以不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把柄。這太困難了，特別是中央出現了兩種不同聲音，有人利用群眾運動作為權力鬥爭的籌碼以後，他們還沒有把政敵打倒之前，根本就不想讓矛盾緩和下來。

1993年5月30日紐約出版的《世界週刊》，有一篇署名子夜的《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扎》長篇通訊，比較詳實地介紹了《人民日報》同人在「六·四」時的抗爭。當時在美國工作的的兒子將報紙剪下來寄給我，問文章裡講的是不是真的。我告訴他是真的，只有個別細節不夠準確。「子夜」，我猜想作者是九十年代出去的一位叫張志業的記者的化名——「子夜」即「志業」的諧音。稍晚一點，也是從報社出去的吳學燦，也在一家中文報

刊上發表過一篇類似內容的文章。

《人民日報》從1948年創刊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都以做忠實的黨中央喉舌耳目為己任，中央領導正確了它也正確，中央領導犯了錯誤它也跟著犯錯誤。從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到文革，莫不如此。進入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央雖然有華國鋒推行「兩個凡是」，鄧小平等搞「清污」和反自由化，但因上面有胡耀邦等頂著，報社有胡績偉、秦川等領導，《人民日報》才沒有淪為「兩個凡是」、「清污」和反自由化的喉舌。

1989年民主愛國運動期間，尤其是5月19日北京宣佈戒嚴，趙紫陽、胡啟立等被逐出中央領導層，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政治老人和李鵬等完全控制中央領導權，他們以黨的紀律要求《人民日報》做他們的喉舌的時候，我們報社的同志仍然力爭發出自己的聲音。儘管我們的抗爭是那樣的微不足道，但這在《人民日報》歷史上，甚至是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歷史上，還是很值得珍惜的。所以，許多同志，特別是看過子夜文章的同志，都希望我寫點東西，把這段歷史紀錄下來。

我有責任把這段歷史留下來。共產黨「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秉承鄧小平李鵬的旨意，編印了一本小冊子：《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到6月9日每日紀實》，接著一個叫華原的寫了一本《痛史明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及其教訓》

（北京出版社）。這兩本小冊子，是「六·四」之後中南海領導層用來統一全國人民思想，所以極盡顛倒黑白、歪曲事實之能事。許多單位都用公款購買發給職工閱讀。看了這兩本小冊子，我愈益感到有寫這段歷史的必要。不是為我自己，也不只是為《人民日報》，而是為了給歷史留一點真實的材料，特別是為了當時不在北京的人們提供一點真實材料。

怎麼寫？從八十年代起，我開始寫日記。幾經考慮，幾經易稿，最後採用日記形式。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到6月19日中央任命《人民日報》新的領導人止，都是日記摘編。因為是日記，它包括了我當時的所聞所見和所思。我覺得這樣能比較真實、全面反映歷史。6月19日以後，黨中央已任命新人來主持報社工作，我已變成清查運動的重點清查對象，上面的指示聽不到了，國內外記者發來的資訊也不大聽到了，日記雖然還寫，但內容過於單薄、零碎。在整理材料的時候，我決定將不同時間記的內容相同的材料編在一起，並標一個題目。我想這樣更便於讀者瞭解歷史真實。既是日記又不全是日記，所以我便給這本書取名《「六·四」紀聞與隨想》（編者按：出版社於出版時改為現時的書名《六四內部日記》）。

這本小書在「六·四」十周年就整理完畢並輸入電腦了。1999年4月，當時國內報刊沒有發表紀念胡耀邦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我有點憤憤不平，2000年4月，便

以自己的日記為主要材料，寫了一篇《不合時宜的思想——紀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因為「六・四」是胡耀邦逝世引發的，故放在一起，作為「六・四」紀聞的一部份。

這本小冊子定稿後我不急於發表，一是考慮到文章揭發「六・四」血腥鎮壓是有預謀的，這題材在大陸不可能出版；二是書裡提到一些好人，他們還在工作崗位上，我不想因這本小書給他們帶來新的麻煩。現在又五年過去了。我所要保護的人已屆退休年齡，其中有的人在子夜、吳學燦的文章裡也提到了。現在的大氣候畢竟與「六・四」後大清查時不一樣了，書裡提到他們，估計不會給他們添麻煩。

「六・四」15周年之際，在網上看到一些反思「六・四」的文章，作者在肯定「六・四」民主愛國運動的偉大意義，聲討鄧小平李鵬等武力鎮壓之後，總流露一點遺憾，即惋惜北京學運領袖缺少靈活性。他們認為，如果學運領袖主動與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合作，在趙紫陽「五・四」講話之後，見好就收，就能保住趙紫陽等改革派的領導職位，民運就有可能避免慘痛的結局，中國的政局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

我相信這些文章的作者完全是出於總結經驗教訓，完全沒有責備民運領袖之意。不過歷史是沒有「如果」的，況且「六・四」自始至終並不存在「如果」所設想的條件。鄧小平為首的政治老人和李鵬這些人，根本沒有給

學生與黨內改革派配合的機會，把趙紫陽拉下馬，是他們早就謀劃了的。一再改變（縮小）胡耀邦追悼會規模，故意不理在人民大會堂門前跪遞請願書的學生代表，趙紫陽出訪歸來，5月初袁木等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公然批評趙紫陽打高爾夫球，學生聽了趙紫陽「五四」講話宣佈復課，北京市和國家教委馬上派人到學校說趙的講話不代表中央……。從這裡，人們不難看出在政治局常委之上有一隻手在操縱著，不斷激化矛盾，好把趙紫陽等改革派打下去。我想，我這本小書，對認真反思「六·四」，可能有一點幫助。我這裡是不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敬請讀者指正。

作者

2004年7月19日

「六．四」紀實

「胡耀邦同志逝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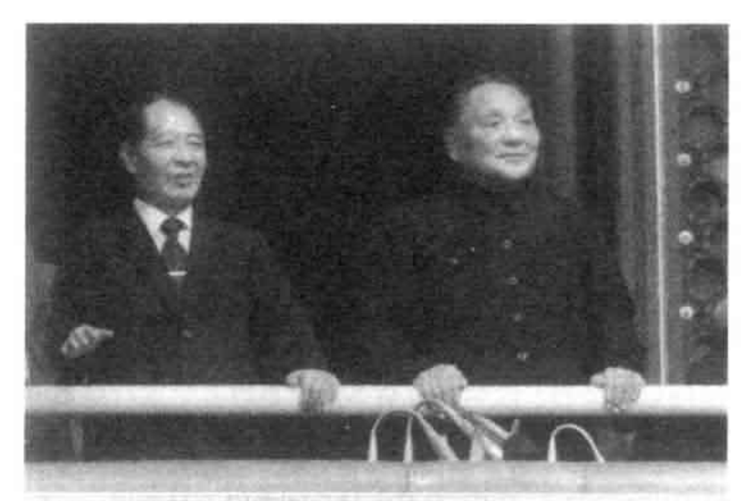
4月15日　星期六　晴轉陰

下午上班，路上遇陳維偉，政法部一位採訪黨政機關新聞的年青記者。他告訴我：「胡耀邦同志逝世了！」

太突然了！真不願相信這是真的。看兩會期間登的照片，他的精神還是頂好的。雖然12日李鵬在機場答香港記者問時，證實耀邦同志有病在醫院治療，但沒有想到病情這麼嚴重。

耀邦同志是當代中國現代化改革開放的先驅。沒有他，幾十年積累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工作不會進行得這麼快，這麼徹底。正如趙紫陽說的，別的人沒有他那個膽識和氣魄。沒有他，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即使不能說根本開展不起來，至少也不會取得現在這麼大的成績，這麼深入人心，撥亂反正也不會如此順利。沒有他，以及與他一道順乎人心衝破重重阻力的趙紫陽、萬里等同志的努力，改革開放也不會有今天的不可逆轉的局面。

人們對這些，後來包括胡耀邦在內，都歸功於鄧小平同志，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資深，威望高，一言九鼎，功勞是不能低估的。我們是親歷改革開放的人，很多事情的始末我們是知道的。客觀地公正



胡耀邦（左）與鄧小平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袖。

地說，有些事關戰略上的考慮和排除保守勢力的干擾，確實首推鄧小平之功，但論不避艱險、不顧個人得失率領群眾往前闖，要數耀邦、紫陽第一功。如果沒有一批有權勢、思想僵化的政治老人當道，中國今日的情況，至少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上，比現在要好得多。

中央在訃告中說，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說他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工作，表現出非凡的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這當然是耀邦同志當之無愧的。

一個人死了，在他的訃告或悼詞裡，或墓碑裡，只說好話不說壞話，而且說好話往往多溢美之詞。這是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講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也不能避免，唯

獨對胡耀邦是個例外。對他的優點、他為黨為人民作出的貢獻，不是言過其實，而是講得很不夠，七折八扣的。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這兩件事，只說他做了大量工作，而不說他是首倡者，是領導者，組織者。當時他只是中央黨校一個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的上頭有主席和幾位副主席，他們中至少有一位副主席和主席是最堅決的「兩個凡是」派，是最堅決反對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的。不講「首倡」，不講「領導」和「組織」，就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不能表現出胡耀邦人格的偉大。與這相聯繫的就是不講耀邦同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讀了訃告，總難免有一種感覺：耀邦同志的突然病逝，可能與1987年初對他的不公正的批評和處理有關。

耀邦同志一身正氣，他的突然逝世，群眾的反應會是很強烈的。

好人不長壽，不該死的死了

4月17日　星期一　晴

耀邦同志的逝世，海外傳媒反應很快。香港《文匯報》除了刊登中央的訃告、耀邦同志的簡歷外，還登了該報駐京記者採寫的耀邦同志發病治療經過，他家裡設小靈堂，什麼人去弔唁，紫陽同志與胡德平的談話，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談話等，整整登了兩塊版。新聞透明度和



報上《新華社》關於天安門廣場上群眾悼念胡耀邦的報導

記者工作效率之高，恐怕是內地同行望塵莫及的。講新聞改革，真正的改革，應當如此。

對比香港《文匯報》，深感在內地我們的報紙對耀邦同志的逝世太冷清了。昨晚上班，沒有什麼東西可登。正在發愁的時候，攝影組的同志送來一幅群眾自發到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的照片，說是通訊員送來的。我看畫面尚好，問有關方面對群眾自發送花圈取什麼態度？拒絕呢還是照收？回答是不拒絕，凡是送去的都收。我也不請示老錢（社長錢李仁）和老譚（總編輯譚文瑞），決定在一版用這張照片。大余也決定在海外版用。我們是不謀而合。我所以不請示錢和譚，主要是考慮到這張照片，廣大群眾固然高興，反映了他們的感情，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向中央告我們的狀。為了不

給他們兩位添麻煩，有事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來承擔責任。不要把主要領導人一下子就推到矛盾的第一線，給他們留下周旋餘地，這也是《人民日報》的一個優良傳統。

果然，今天一上班就聽說北京市告了我們一狀，是芮杏文同志電話告訴老錢的，大意是這張照片會引發群眾到天安門去鬧事，像當年周總理逝世時那樣。帽子是夠嚇人的。不過，我有了思想準備，沒什麼可怕的。

下午，正在開編委會的時候，中央辦公廳來電話通知老錢去中南海開會。老錢在五點鐘左右來電話叫我們不要走開，等他回來。會有什麼事呢？可能與今天登的照片有關。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五點半過一點，老錢回來了。他說，會上沒有人提照片的事。會是喬石主持的，啟立參加，主要是商量耀邦同志逝世的有關事宜。一是決定21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人的向遺體告別儀式；二是22日開四千人的追悼大會；三是群眾性的就地的悼念活動可以適當報導；四是駐外使領館除追悼會那天下半旗外，還要設靈堂，耀邦同志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誰來了就簽個名；五是已經有了的專案就不要收縮，如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不得拒絕，等等。

編委會在討論近期宣傳報導應注意的問題時，決定報導人民群眾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要按照中央意圖進行；寫內參要全面、準確，這項工作仍由總編室情況組負責，上送的內部情況要經老譚或值班副總編輯審核。

根據這個精神，我們晚上決定用李銳同志寫的悼念詩

和留美同學會的唁電，並要求駐省市記者適當報導各地群眾的悼念活動。

晚上九點，夜班的同志正在議論中央比較瞭解群眾感情的時候，老錢來電話說，情況變了——21日10萬人向胡耀邦遺體告別的儀式取消了。老錢沒有說明原因，也沒說是誰決定的，但我們心裡明白，這是「最高指示」。因為下午的會喬石和啟立定的幾條，肯定不是他們倆的意見，而是當時是政治局常委的意見。敢於改變、能夠改變常委決定的是誰，不是「和尚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嗎？

耀邦同志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中的功績，他對知識份子的態度，他的直率和廉潔樸素的作風，在群眾，特別在青年學生中享有極高的威信。他們的情緒不可低估。

這兩天京津兩地群眾自發寫的悼詞、悼詩的基調是：民主改革戰士，知識份子朋友，對他受到的不公正處理懷有忿忿不平的情緒：

「心憔力瘁顧大局，撒手先去；前功盡棄為小平，罷黜政壇。橫批：死了也罷！」

「祝小平同志萬壽無疆，祝楊尚昆同志永遠健康，祝王震同志天天快樂，祝萬里同志比較健康！」

「該死的還活著，不該死的死了。」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賢良不辨，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不塌會毀掉我中華。」



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堆滿了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和站滿了來弔唁的群眾。

「巨星隕落折天柱，英傑辭世哭耀邦。」

「君去何以安邦，星落何以耀國。」

以上是北京地區的，下面是天津南開大學的。

「中華上空耀星猝隕蒼天低垂淚，炎黃大地希望何在天地常慟哭。」

「上有獨夫下有愚民，國殤將至吾輩何悲！」

「好人不長壽，不該死的人死了。」

給宣傳報導定調

4月18日　星期二　晴

中央辦公廳通知下午三點在中南海152會議室開會，不知什麼內容，估計與耀邦同志悼念活動有關，老錢和老譚都有事，讓我去參加。

會議是耀邦同志治喪辦公室召集的，喬石、啟立、宋平、李鐵映、溫家寶等同志都參加了。出席今天會議的新聞單位只有《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廣電部三家，其餘是黨政軍工青婦等部門負責人。喬石同志宣讀寫好了的五條。大意如下：一、中央對耀邦同志從發病、治療、逝世到治喪等都非常重視，逝世的時候全體常委和尚昆同志都在場。二、對耀邦同志的評價（訃告）各方反應較滿意。三、廣大群眾沉痛悼念耀邦同志是正常的，少數人借題發揮，發點牢騷，要加以引導。四、還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幕後煽動鬧事，只要不觸犯刑律，

也要避免與他們正面衝突。五、是宣傳報導的，希望嚴格按照中央指示辦，不要報導誘發鬧事的活動，包括文字和圖片。後來特別說明不要登群眾上街，特別是到天安門廣場活動的照片。毫無疑問，北京市委告我們的狀起了作用。喬石一再強調4月15日公告的治喪事項沒有改變，大家不要聽信外面的傳言等等。

「群眾上街的悼念活動不能報導，在單位內部的悼念活動可否報導？」我提出這個問題。

喬石、啟立都給以肯定的回答，只要求不要太集中。啟立還以中央黨校為例，說耀邦同志任黨校副校長時，吃住在學校，創辦了《理論動態》，領導真理標準的討論，在師生中很有影響，黨校要求設靈堂，治喪辦同意了。

團中央劉延東提出，要是昨天決定的21日10萬人向遺體告別儀式不搞了，傳出去的話，群眾可能有意見。真沒想到，喬石竟一口否認有這個決定，說什麼不能把治喪辦公室個別人的設想傳出去……我百思不得其解：要不是中央常委決定，而只是治喪辦個別人的設想，中直工委就敢幹召集各部門黨委負責人（一把手）去開會佈置傳達嗎？要不是中央常委討論決定，在老錢參加的那個會議上，喬石對靈堂要不要人守靈，政治局委員參加不參加守靈，能說得那麼肯定、具體嗎？

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是無可非議的。有些計劃後來要改變，也是常有的。但說話不算數，對自己說的話不敢承擔責任，教人如何想呢？

風雲多變

4月19日　星期三　陰轉晴

風雲多變。

昨天下午中南海會議說得好好的，單位裡的，特別是耀邦同志工作過的部門、單位的悼念活動可以報導，只要求不要過於集中。今天就變了：一切悼念活動都不得報導，連耀邦的生平照片也不能登，除了外國發來的唁電，統統留到22日，即舉行追悼會那天刊登。

原因沒有說明。這恐怕是昨天晚上有一部份人圍攏在新華門前企圖衝擊中南海引發的。不過，據報社一些同志說，群眾並沒有衝擊中南海，而是有一位上訪婦女被警衛帶進去了，群眾才跟著往裡擠，或者引發和警衛衝突。對這樁事，《新華社》發了二篇新聞。以《新華社》名義發的對外稿，說得很肯定，群眾是衝擊中南海了。以《北京日報》名義發的對內稿，導語說「衝中南海」，但在文裡敘述事件過程時，只說群眾「想衝」中南海。

為什麼對內對外用兩個新聞媒體名義，對內對外兩種說法？為什麼要製造這種矛盾？是增強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呢還是相反？這裡面有什麼奧妙？

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即與《科技日報》刊登一張寫有「中國魂」三個大字的大幅挽幛的照片有關。因為群眾把耀邦同志譽為「中國魂」，有些人就不舒服，覺得群眾在變著法子貶低自己！有些人怕惹出事來，於是下令不管什麼悼念活動，統統不讓報導。

這不能怪《科技日報》。《科技日報》的同志說，昨天中南海會議精神，他們不知道，因為沒人向他們傳達。

群眾對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本來就有意見，對訃告中不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連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提）就不滿意，現在又這麼變來變去，群眾的對立情緒就會越來越大。今後幾天如何發展，值得注意。這給我們辦報的增加很多困難。

新華門事件

4月20日　星期四　陰雨

天氣不好，仍有很多青年學生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耀邦同志。除了一般悼念活動，增加了抗議昨天新華門事件處理的內容。如果說這是節外生枝，那麼是誰催發出來的？

報社內部也有幾張大字報，評論昨天新華門事件。總的意見是：學生沒有什麼過錯。所謂衝擊中南海，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有一位上訪的中年婦女挾在群眾隊伍裡，見到警衛就跪在地上訴說冤情，可能是警衛戰士想把她與靜坐群眾分開，將她帶到裡面去，站在後面圍觀的群眾看不見，往前擠，把隊伍擠向新華門。警衛部隊以為是真的衝中南海，便出來阻攔，發生摩察。另一種說法是靜坐隊伍要求派人送花圈進中南海，共三位代表，進去了很久不見出來，以為是被扣押了，便想衝進

去要人。不管那一種說法，所謂「衝擊中南海」都不是事實。

據老錢說，衝是衝不進去的。新華門進門的正中是寫有「為人民報務」幾個大字的影壁，影壁與大門兩邊通行的地方，已經用大卡車封了，靜坐的群眾本事再大也衝不進去。

目擊者說，靜坐的學生不過三幾百人，所謂上萬人，不僅是誇大，而且絕大部份是過路圍觀者。後來，警察把圍觀者與靜坐者分開，隔於新華門長安街兩側。下午四點多鐘，大部份圍觀群眾已陸續離開。

五點鐘左右，警察把圍觀群眾向東西兩側推出去，東到南長街，西到六部口，然後把準備好的汽車開到新華門，一聲令下，兩個警察挾著一個學生，像老鷹抓小雞一般，不幾分鐘，靜坐的學生全被抓進汽車送走了。

因為有學生到新華門靜坐，與警衛發生了衝突，《新華社》的新聞還說有人呼喊反動口號，治喪辦公室宣傳組要求新聞單位寫評論。下午，《新華社》的評論《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發出來了，殺氣騰騰的，各方反應都很強烈，報社內部亦然。我們的評論，強調怎樣正確悼念耀邦同志，多作引導，緩和矛盾。評論強調要像耀邦同志那樣處處以大局為重，不要做任何不利於改革和四化建設的事；要像耀邦同志那樣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為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多做工作，絕不做任何不利於安定團結的事；青年同志要努力把自己造就

成耀邦同志所希望的四化建設的可靠人才，絕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個基調得到啟立同志的肯定，他只要求最後一段要有警告少數人不要借題鬧事的內容。

《新華社》的同志告，《新華社》的評論和有關群眾在新華門製造事端的報導，都不是《新華社》的人寫的，連《新華社》的領導人事先都不知道。

反對腐敗

4月21日　星期五　晴

除北京外，天津、上海、武漢、西安、成都等地，都有群眾（主要是學生）上街悼念耀邦同志。

北京的形勢更嚴峻。大學生聲言，要採取聯合行動，統一指揮。果然，白天還平靜，晚上八九點時，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聚集了十幾萬人。據記者瞭解，絕大多數是看熱鬧的，並不打算加入學生行列。十一點多鐘，我和夜班的同志驅車前往觀看時，廣場上只剩下四五千人左右，其中有南開大學的代表。這時首都各大學的隊伍正從郊外向城裡集中。

晚上十二點，即22日凌晨以後，本報跟隨學生隊伍從西郊進城的記者報告，隊伍有幾裡長，先頭部隊已進入天安門廣場，尾巴還在西四。隊伍組織得很好，很嚴密，男同學在兩邊，女同學在中間，陌生人很難混進去。每人還帶一條毛巾，用來防催淚彈的。呼的口號都經政

法大學教師審定，既有針對性，又沒有越出憲法許可範圍，是無可指責的。如「堅決反對幹部終身制」，「反對腐敗」等等。唱歌只唱國歌和《國際歌》。

北京市有言在先，說22日凌晨四點清理天安門廣場，實行區域性交通管制。他們大概沒有想到，大學生們趕在交通管制之前，趕在凌晨四點以前，就把天安門廣場擠滿了。

大家都很擔心發生流血衝突。建國四十年，還沒有發生過用催淚彈驅趕群眾的事。如果由於學生悼念耀邦同志而用催淚彈驅趕他們，發生流血事件，無論如何辯解歷史都不會饒恕的。還好，正在大家擔心的時候，傳來警衛全撤出天安門廣場的消息。這個舉措太明智了。壓在人們心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明天是開追悼會的日子，編委臨時開會研究明天的版面。中央的指示是要跟葉劍英的取齊。李仁臣（副總編輯）翻了舊報紙，看到葉劍英在開追悼會之前，什麼也沒有報導。按照這個規格，22日的報紙什麼也登不了，就是說，報紙是冷冰冰的。這怎麼行呢？我說，儘管毛主席誇葉帥「呂端大事不糊塗」，但論對歷史的貢獻，論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葉劍英都不能同耀邦比。況且葉帥久病在身，悼詞寫好了一年之後才去世，黨內外群眾毫無反響。他沒有群眾自發悼念這個背景。我建議，除出一個版的生平照片外，一版登一篇本報記者採寫的耀邦家裡靈堂的特寫和一幅照片，二版登中組部、團中

央、共青城等悼念活動的專題報導，也是本報記者採寫的。大家同意我的意見。

億萬人民同聲悲泣

4月22日　星期六　晴

耀邦同志追悼會，原定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按要求我們9點30分前到達河北廳等候，我們原定9點從報社出發，臨時考慮到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遊行，交通可能受阻，提前於8點30分離開報社。沒想到一路很順利，除了原定從東門進改為西門進外，一切照原計劃進行。

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約10萬人左右，從紀念碑到大會堂之間坐得滿滿的，秩序整然，除了有領導地唱國歌、《國際歌》和呼口號外，並不喧鬧。他們也是悼念耀邦同志的。《新華社》的報導說，廣場上有萬餘學生，真是瞪著眼睛瞎說。

追悼會一切正常。原來擔心鄧小平同志不來，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中，他對胡耀邦同志是很不滿意的，加上這次學生群眾一上街，估計他可能像當年毛主席對周總理逝世那樣不露面的。但鄧小平畢竟是鄧小平，不是毛澤東，不但來了，連夫人和子女也來了，大家見了都很高興。不過由於搞清污和反自由化很傷害知識份子心的「左」的運動，以及撤換胡



鄧小平和趙紫陽出席了胡耀邦的葬禮

耀邦職務，他在廣大群眾中的聲望已遠不如以前了。

晚上安排版面，當然沒有辦法按照葉劍英的規格運作。葉帥沒有全國群眾自發悼念，沒有首都十里長街百萬人送靈的動人場面。最費斟酌的是追悼會的特寫。一是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場面如何處理？完全不提有違新聞真實；如實報導，與《新華社》的「萬餘學生」不一致，而且上面也不會同意。二是記者的初稿中特寫的實景不多，過多的事前採訪的幾個人的議論，不是通過記者的眼睛告訴讀者在追悼會上（包括在大會堂外面的）發生了什麼，而只是告訴讀者誰在耀邦逝世後發表了什麼談話，雖然是有關耀邦同志的。

關於大會堂外面，我們最後改成這樣：「從昨晚起就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首都高校學生和其他群眾，收聽


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

《人民日報》上對群眾為胡耀邦「送行」的報道

高音喇叭轉播的現場實況，向青年導師、群眾領袖、知識份子的知音耀邦表示深切的哀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億萬人民在收音機、電視機前收看（聽）現場直播，同聲悲泣。」

還發了一篇《偉大的足印，留在億萬人心間——來自胡耀邦同志走過的地方的報告》，是駐河北、廣西、湖南、陝西、湖北的記者發來的。

喪事結束了，風波未了

4月24日　星期一　晴

耀邦同志的喪事總算順利結束了，但風波未平。

今天人們議論最多的是星期日的《科技日報》。這份報有一篇特寫：《風一程　雨一程　壯歌送君行——首都人民悼念耀邦同志》。它主要是寫天安門廣場上和十里

長街的群眾隊伍悼念耀邦的思想感情的，人民大會堂的悼念只寥寥幾筆帶過。它幾乎把學生們的挽聯、標牌和口號都發表了，如：「耀邦精神不死」，「民主鬥士青年摯友」，「科學興國教育為本」，「德先生賽先生我們盼了你70年」，「尊重人權，教育興國」，「打倒貪官污吏」，「反對腐敗」……

這家報紙在四版還刊登了五幅天安門群眾悼念場面的照片。這些從共產黨正統的觀點看，都是犯忌的，但從新聞學的觀點看，是真正出奇制勝的佳作，難怪在廣大群眾（包括新聞界）中引起強烈的反響。

據說《科技日報》內部鬥爭很激烈，總編輯、副總編輯是手裡拿著烏紗帽簽字付印的。他們知道這樣做不為領導所容，一大早就由職工將報紙拿到學校去散發，等到上面發現有問題下令禁止發行時，已經沒有多少報紙可「禁止」的了。

據記者瞭解，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幾所大專院校學生，昨天都在校內集會遊行，張貼大小字報，抗議新聞媒介不說實話，就新華門事件、人民大會堂前哭跪請願事件發表意見。清華有宣佈罷課的大字報，北大、科大等校一些青年教師宣佈罷教。《人大博士生宣言》提出八項要求，其中有自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罷課，有要求75歲以上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全部辭職，有要求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允許民辦報刊、電台和電視台，有要求成立廉政委員會，清查黨

政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審查高幹子女親屬的非法經商活動，等等。

今年是「五四」70周年，從年初開始，要求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政治改革的思潮就逐漸在全國蔓延開來。據一份月初對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北航大五所高校師生的政治思想、政治態度的調查材料表明：學生中傾向於一黨多派、兩黨輪流執政和多黨制的佔50.2%；21.8%的人否定社會主義這種社會形態；12.3%的人根本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早在耀邦同志逝世之前，各地高校學生就醞釀利用紀念「五四」70周年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等。耀邦同志的悼念活動雖然結束了，但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和部份教師）的政治要求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加上悼念活動中對一些事件的處理也欠明智，如果處理得不好，學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是令人擔憂的。

鄧小平定調：堅決反對動亂

4月25日　星期二　晴

中午，秘書室通知：下午二點在三樓會議室開編委會。原來並不打算開的會突然通知要開，一定有什麼急事。

果然，二點的時候，連正在黨員輪訓班學習的老譚和大余也來了。老錢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

老錢說，昨晚十二點啟立通知今早讓他帶一位主管評論的副總編輯到中南海開會。會議只有《新華社》、廣播電視部和我們三家，後來又來了王忍之。啟立同志傳達昨天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叫我們發表一篇社論，明天見報，用大字排印。社論是針對耀邦同志追悼會以後，首都大專學生的無限期罷課、募捐、準備派人南下串連而發的。

老錢說，常委會議精神，基本上在明天見報的社論都反映了。這個精神，包括紫陽同志出訪朝鮮前留下的三點意見：恢復正常秩序；警惕少數人鬧事，但要努力避免流血；民主化只能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加上中央支持各省市發動群眾、黨員起來打退少數人的進攻。最後這一條，是根據北京市委的要求作出的。

三點半，召開各部副主任、行政管理系統處長以上幹部會議，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會上宣佈由俞成秀、江世傑、趙連宏和王庚南組成臨時小組，負責接待來報社示威衝擊的人群。散會時老范回來了。他是帶著送審社論稿回來的。他還傳達了鄧小平聽李鵬匯報時的講話。

鄧小平充分肯定常委決定。他表示要堅決反對動亂，要四個堅持，不要怕外國人說三道四。他還講到耀邦同志的錯誤。他說，耀邦對反自由化是動搖的。反自由化的時候他下的台，現在還是那些人支持他。又說，對「兩個凡是」，耀邦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正因為這一點，不能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說：

「耀邦同志不夠格，我也不夠格，我連《資本論》也沒讀完。我死以後，你們也不要封我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講了耀邦同志堅持高速度發展經濟，如果照他的意見辦，現在困難還要大。

看來，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最主要的分歧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具體一點講，是如何對待持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鄧小平在四個堅持下，對他認為「左」的「右」的不同政見，往往不容許存在，不容許出現，統統宣佈為非法，對於堅持者必須予以無情打擊。胡耀邦則主張按民主原則處理。他不同意「左」的「右」的觀點，並與之作鬥爭。他主張在平等的原則上，在寬鬆的環境下開展批評和反批評。他允許不同政見的存在，反對整人，特別是反對在人民內部搞無情鬥爭。反精神污染時，鄧小平指名要開除王若望等人的黨籍，胡耀邦對此有保留。他按照黨章規定，要由基層黨組織討論決定。當時王若望所在的黨支部就是不同意。此事就一直拖下來，成為胡耀邦保護自由化分子的一條罪證。胡耀邦帶頭批判「兩個凡是」，撥亂反正，但他不主張像毛澤東整劉少奇、鄧小平那樣，把人往死裡整。這大概就是所謂「保護華國鋒」吧！平心而論，胡耀邦的觀點和作法，是真正順乎時代潮流的，更有利於共產黨的長久統治，更有利於中華民族的振興和發展。這也是胡耀邦得到廣大群眾、黨員和知識份子擁護的一個重要原因。

鄧在講話中，還二次說到，要給胡績偉、于浩成、蘇

紹智等人打招呼。這個動向值得注意。

哥兒們，姐兒們，去醉生夢死吧！

4月26日星期三晴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把廣大群眾，主要是青年學生悼念耀邦同志並藉以提出的政治民主，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的正義行動，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引起強烈的反響。

據科教部和駐省市記者反映，說社論好話的還沒有，說社論錯誤的、不同意評論觀點的很多。總編室和辦公廳接到的電話不斷，沒有一個是肯定社論的。有的人對報社發這樣的社論表示理解，但不同意社論觀點。主要有兩點。一是不同意把動亂的原因歸之於學生遊行示威，不同意把學生悼念胡耀邦說成是動亂，反對扣帽子，打棍子。二是認為學生提出的許多問題，也是廣大群眾所關心和議論的問題，如民主問題，官倒問題，腐敗現象問題等等。社論對這些問題沒有提出解決辦法，卻一味責備學生。而這些問題正是動亂的根本原因，一天不解決，動亂總會潛伏著。今天，群眾不借悼念耀邦上街表示自己的意見，明天也會借紀念「五四」70周年，或者什麼偶發事件上街表示自己的意見。按照憲法，公民是有這個權利的。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明白「動亂」的含義。儘

管社論把廣大學生和少數搞動亂的人分開來，但廣大讀者都清楚這只是一種策略。既然認為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為什麼要那樣大張旗鼓地動員全黨全民起來反對「動亂」呢？這豈不是太小題大做了嗎？

昨晚電台、電視台播完社論不久，首都大專院校就有反響。

北京農業大學貼出了《有感於中央對學生運動的結論》的大字報，呼籲「哥兒們，姐兒們，爺兒們，趕快把書扔到火爐裡吧！去當倒爺吧！去醉生夢死吧！去放縱淫蕩吧！」

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都有學生在學校周圍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高呼「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等口號。

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籌委會聲明：不反黨，不違憲，只為了推進民主進程。並提出復課的三個條件：一、同政府對話，二、正確解釋「四・二〇」事件，三、要求新聞立法。

最值得注意的動向是首都高校學生聯合會發出通知：27日（明日）全市統一遊行，到天安門會合，抗議「四・二六」社論。

晚上，《新華社》和本報駐京滬記者，分別發來京滬市委召開黨員大會，動員幹部黨員群眾學習「四・二六」社論，打退動亂的報導。嚴格說來，屬於老套話，有些話經不起推敲。但因是市裡頭頭的話，且兩家記者的稿

子是一樣的，只好照樣採用了。27日凌晨，《科技日報》總編輯來電話談起這個問題，他說他是違心地簽字發稿的。

違心地簽字發稿的豈獨他一個人。

《新華社》還發來京滬各一則綜合各界對「四．二六」社論反應的新聞，只講擁護的話，不講不同意的話，並且凡是尖銳地批評學生的話，都沒有說話人的姓名，有的連單位名也沒有；凡是有名有姓的都是比較中性的話。這顯然是失真實的，是按照領導意圖編造的新聞。給《新華社》一位負責人打電話瞭解，知道這二條新聞不是上面指定的，決定不用。

又想樹靜下來，又要不斷颳風

4月27日　星期四　晴

首都大學生果然上街遊行示威，說是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對學生悼念胡耀邦活動的誣衊。可能是由於傳達了中央常委會議精神和鄧小平的講話，學生們的主要矛頭（公開的）已經不是《人民日報》，而是黨和政府。他們的口號有：「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堅持改革開放」，「新聞要講真話」，「穩定物價」，「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真誠對話」，「和平請願」，「反對動亂」，等等。對《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對激昂的群眾情緒有如火上澆油。

只有在政法大學隊伍裡有一幅「向法院起訴人民日報」的橫幅。總之，從標語口號裡是絕對挑不出毛病來的。

據記者說，今天參加遊行的有三十多所高校學生。隊伍組織得非常好，外人很難插進去；也很有秩序，不妨礙交通。儘管北京市領導向中央打了保票，在各個交通路口組織軍警隊伍阻攔，讓學生沒法遊行，但正義在學生一邊，他們得到上百萬圍觀群眾的同情與支持。每次衝破軍警阻攔防線的主力並不是學生，而是在學生隊伍之外的群眾。數以萬計的群眾像潮水一般把阻攔的軍警衝得七零八落的，學生和群眾雄糾糾氣昂昂地前進。在一些地方，群眾還沒有衝，奉命阻攔的軍警已主動讓道，有的還舉手向遊行隊伍致敬。

這次遊行，可以說是《人民日報》社論逼出來的，從

根本上說，是黨和政府工作，特別是政治改革、教育改革滯後造成的，是中央決策造成的，是北京市委、國家教委向中央和鄧小平提供不真實情況，導致中央和鄧小平決策不當造成的。

這次遊行既是對黨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委決定的蔑視，也是對鄧小平權威的挑戰。這次學生運動，很值得黨中央、鄧小平等一批老人反思。他們固守的老一套，已經不適用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了。

新聞界許多人對中央的決策也有意見。《新華社》穆青同志堅持客觀報導。他們既發了學生遊行的新聞，也發了北京市發言人說遊行非法的新聞。

看來事情還未了。今天的遊行隊伍散發的一份傳單透露：學運的近期目標，一是成立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二是通過罷課、輿論等形式，促使政府就七條與學生公開對話。學生們早就醞釀在「五四」70周年提出的民主改革要求還沒有完全表達之前和得到適當的回應之前，他們是不會輕易罷手的。今天還有一個新的刺激學生的因素，就是首都主要報紙刊登的《新華社》消息：「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欽本立，解放前上海的地下黨員，五十年代曾是《人民日報》經濟部的編輯和負責人，因一本論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小冊子而獲得斯大林獎，在中國經濟學界、

新聞界頗有名氣。他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宣傳改革開放是最積極的，各界名家都給它撰寫文章。在讀者中，特別是在經濟界讀者中很有影響。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也很重視。所謂「嚴重違反紀律」，指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在北京召開座談會悼念胡耀邦同志，與會者對胡耀邦的評價跟訃告的不一致，對「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提出一些與鄧小平不一致的看法，還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這些都是鄧小平等政治老人所不高興的。上海市委承旨要求《世界經濟導報》修改報導，欽本立沒有執行。不管怎麼樣說，上海市委如此處理欽本立，無疑是又一次刺激廣大學生起來跟黨和政府對立。又想讓樹靜下來，又不斷颳風。

羞答答地從「四．二六」社論後退

4月28日　星期五　晴

據記者談，今天首都各高校仍有新大字報，內容是有關對話的建議的。北大、清華提的建議大體相同，主要有：一、關於反貪官污吏和官倒問題；二、增加教育經費和提高教師待遇問題；三、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問題；四、學生運動性質問題；五、公正評價胡耀邦問題等。

北大、清華、北師大等二十多所高校的學生代表開會，除討論與政府對話有關事宜外，提出專業性的藝術院校、外語學院明天可以復課，其他學校要繼續罷課到

「五四」。

過了「五四」真能復課，恢復正常秩序，那是再好不過了。

上海市委關於《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引起知識界一些人的不滿，嚴家其、包遵信、蘇紹智、許良英、張顯揚、吳祖光、于浩成等三十多人，簽名散發了《捍衛新聞自由──致上海市委的公開信》。

晚上用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這是為了緩和廣大群眾對「四．二六」社論的強烈不滿情緒，李鵬叫鮑彤起草的，調子比《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低。因此，北京市委對它不大感冒，送小樣請他們提修改意見，他們以此文不是針對北京市情況為由拒絕發表意見。

說這篇社論調子較低，主要是它沒有把近來學生活動與動亂聯繫，而只把動亂與發生在西安、長沙的打、砸、搶聯繫。可以說，是總結了這兩天的教訓，羞答答地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後退了。但學生們未必滿意，因為社論還是落腳在要求學生趕快復課，趕快恢復學校正常秩序上來。

從邏輯上社論也有不夠嚴密的地方。

社論的一些論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中國經濟現在之所以處在這樣一種的水準，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現在之所以受到這樣多的客觀因素制約，除了歷史條件這個根本原因外，建設時間太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乍一聽，頗有道理，但往細一想，矛盾出來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時間並不太長，至少不比我們的長，最突飛猛進的時間也不過十幾二十年。政策對頭，抓住了機遇就上去了，如日本和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亞洲四小龍」。現在有一種觀點不利於我們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這就是動不動就說資本主義國家需要一百年才達到的水準，我們只用五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能達到，用以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用以證明我們領導的多麼英明。殊不知現在的科技水準與幾十年前，與一百多年前很不一樣。過去，一項重大技術，從科學實驗到變成商品大生產，需要很長時間，現在則不然，只需三幾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就完成了。拋開這些因素不講，光比時間，是不會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來的。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說得多，做得少，更是沒有道理的。這除了說明我們一些同志繼承了孫中山的「訓政」學說，抓住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個遺產不放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找沒有意見的學生代表對話

4月29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國務院和李鵬委託袁木、教委何東昌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本立與首都大學生代表對話。從電視上看（非現場直播）好像很正常，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但現場

採訪的記者告訴我，電視廣播是剪接過的。例如，對話快結束時，非官定的學生代表發言時，與對話者爭論，雙方拂袖而去的鏡頭被剪掉了。

尤其令人不解的，也可能會再一次激怒學生的是搞了一些小動作。例如，45 名學生代表中，41 名是政府指定的各校的學生會幹部，都沒有參加過遊行，只有 4 名是參加過遊行的非學生會幹部。有些學生提出，應該有最近經過學生民主選出的首都高校學生聯合會的代表參加對話，沒有被採納。袁木、何東昌明確表示，「對未經官方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真正有意見的學生不找來談，而偏偏找那些沒有參加遊行、唯領導意見是聽的學生來談，這種對話是真心誠意想解決問題，緩解矛盾的呢，還是做一個「對話」的姿態給群眾看，然後把「動亂」的罪名加給學生群眾？因為正確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有些人在會上申明：他們不能代表任何人。

二是誰提問題，問什麼，都得事先提出（實際上是上面佈置的），袁木等人的答覆也是事先準備好了的，故他們才顯得那麼從容不迫。

三是最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這次學生遊行，對趙紫陽的意見雖然有，但並不多，也不太尖銳，而對李鵬的意見卻不少，甚至有要他下台的。可是這次對話，學生提問中根本沒有提李鵬，對趙紫陽卻兩次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評。一次是指斥他每星期打一次高爾夫球，脫離中國經濟發展水準（袁木答覆語）；一次是關於對胡耀邦

的評價，指責趙在悼詞中為什麼把胡捧得那麼高。明眼人不難看出，這裡面大有文章。

鑒於這種情況，中宣部又有言在先，以《新華社》稿為準（實際上是由《新華社》統一發稿，不許各報如實報導），索性用《新華社》稿，免得兩面不討好。老錢同意這樣處理。

今天，武漢、吉林、長沙、瀋陽、哈爾濱都有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武漢學生打的橫幅有：「憂國、憂民、憂自己」；「要民主，要自由」。東北工學院學生標語口號有：「開放黨禁、報禁，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職務」，「科學救國，民主強國」，「健全法制，廢除專制」，「正確評價學生民主運動」等等。

學生不承認29日的對話

4月30日　星期日　晴

下午編委會，主要討論近日學校形勢。一致的看法是：昨日的對話，可能引發新的矛盾。要求科教部和首都記者站，這幾天要密切關注各高校動向。

情況組提供情況：北京大學三角地已有十幾張大字報，都是譴責昨天的對話的。一張大字報說，「政府少數人想讓學生先復課，否則就會造成內亂。」「和平請願活動在總方針上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必須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戰果。」據說，昨天晚上，

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在香格里拉飯店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不承認4月29日政府與學校學生代表的對話。

科教部同志反映：人民大學、農業大學也出現了譴責對話的大字報。農大署名「校自治會」的大字報，批評對話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強烈要求政府在平等、公開、時間地點由雙方都認可的情況下對話，學生代表必須是代表廣大同學意見的。

高自聯提出：5月4日前，由各校學生民主選舉的代表團與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話，如果政府不同意，將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

昨天晚上，蘭州大學、蘭州醫學院等校二千多學生，聽了袁木等人與學生對話的廣播後很氣憤，高呼「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的口號上街遊行。

對昨天的對話，報社沒有聽到有人說是明智的。老錢說：「我不想用『愚蠢』二字，但做得實在太笨拙。」

老錢是長期從事外事工作的，說話向來很謹慎，考慮問題很周到。他對昨天的對話的批評是非常中肯的。

高自聯提出對話要求

5月1日　星期一　晴

據情況組和記者提供的材料，首都和上海、西安、重慶一些高校學生都積極為「五四」活動作準備。

北京「高自聯」在北大召開新聞發佈會，《美聯

社》、《美國之音》等二十多家外國和港台地區新聞機構的四十多位記者到會採訪，北大、清華數以千計的學生旁聽。高自聯發言人在會上宣讀九項聲明，其中有高自聯對話要求草案，高自聯致各階層、各界人士書，致香港同胞書，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公開儀，留美學生致國內同學的公開信。

高自聯的對話要求的主要內容有：

一、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對胡耀邦的突然離職做出公開的解釋。

二、重新公正評價報導這次學生運動，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為，成立專門調查組，調查此次學運始末。

三、維護憲法，追究侵權行為，懲處「四・二〇」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

四、反貪污，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康華（公司）問題。

五、盡快出台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公開向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發出赴大陸辦私人報紙的要求。

六、糾正十年來最大的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佈政協三個調查組對北京市5所高校教育經費的調查報告，並繼續派出調查組，調查中學情況，公佈調查結果。

七、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由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政府提供一切必須資料，分析去年通貨膨

脹原因。

這七條，把這次學潮以來各校提出的要求都包括進來了。這既反映了廣大群眾，特別是知識份子之所以自發悼念胡耀邦的原因，也反映了青年學生對近幾年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的要求。就這些問題進行坦誠的對話，勾通思想，對國家、對共產黨都是有好處的。

上海一些高校學生秘密集會，商量5月2日上街遊行。復旦大學有幾百學生集會，要求恢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的職務，要求將4月24日的《導報》原版重新發行，要求遊行集會自由，新聞出版自由等等。

西安、重慶也有高校學生醞釀罷課、上街遊行。

《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科技日報》、《文藝報》等新聞單位的幾百名編輯記者聯名致電《世界經濟導報》和欽本立，表示慰問和支持。

團結學生會

5月2日　星期二　晴

晚上上班，看到老錢傳來的一份情況，是根據今天上午中南海會議精神寫的，主要講學生遊行的情況。總的估計是「五・四」的遊行是難免的。學生代表今天中午提出請願書，提出十幾個條件，在北大原提的七條基礎上加以具體化，其中不少是有關對話的，有些條件從政

府方面看是太苛了點。有一點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他們處處學習波蘭團結工會。有人稱他們為「團結學生會」不是沒有根據的。

29日袁木等人的對話，看來是想撇開自發的學生組織——自治聯合會，而只與黨和政府支持的學生會打交道，面向廣大學生，把廣大學生與自治聯合會分開。效果如何，尚待實踐證明。不過，現在看得出來的，是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堅決不買賬，而被指定參加對話的學生也不滿意，覺得更加脫離了廣大同學，無臉見同學。如果現在硬要他們去做同學的工作，勸他們「五・四」不上街遊行（前些時勸他們不上街悼念胡耀邦未果）不成，又不讓他們主動領導同學上街，那他們就更脫離群眾，將自己置於與廣大同學相對立的地位。29日的對話會，已又一次置他們於非常尷尬的地位。這種做法，很難說是明智的。

中南海會議形勢的分析，特別是對29日對話後果的分析，與我們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老錢傳來的情況中，最可笑的是有人埋怨我們為紀念「五四」而發表的劉再復文章（同時被提到的還有《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這篇題為《兩次歷史性的突破——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新時期的「現代文化意識」》的文章（發表在25日6版），批評了過去幾十年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歡呼現在知識份子恢復了「五四」時代已經燃燒起來的個性精神、獨立意識和對人類社會終極

價值的關懷精神。他們要做自己的主人，對工人農民進行現代意識啟蒙和現代意識的普及。它反對「代聖人立言」的遵命文學。

我不覺得這樣的文章有什麼可指責的。

說實在的，今年紀念「五四」的文章，我們已經根據中央的精神淡化民主的主題。儘管民主遠沒有實現，但考慮實現真正的現代意義的政治民主，並且要形成一種制度，即使沒有現在的種種人為的障礙，也還需要相當長的過程。現在在文章裡，把讀者對民主的期望提得很高，未必有利於當前的改革。所以，在紀念「五四」的文章和新聞中，我們要求盡量少談政治民主，但可以講一講思想民主、意識民主、決策民主，反對和肅清封建思想的影響。誠然在我們黨領導下，封建思想的影響得到了很大的克服，特別在人際關係方面，上下級之間、父子兄弟之間、夫妻之間，講平等的多了，依附關係少了，這是有目共睹的。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我們黨內生活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封建家長式的統治（領導）還是很嚴重的。不承認這一點，就沒法解釋為什麼會有「文革」，為什麼會有「文革」前十幾年的一系列「左」的政治運動，會有1986年末19987年初胡耀邦的下台，以及與此有關的「清污」和反自由化等很不得人心的不叫運動的運動。現在，在紀念「五四」的文章裡，講一講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人出來反對，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這是一些死抱住

一黨專政不放的人，或者是一些沒什麼本事，又想當官做老爺的人。只要社會上一有風吹草動，與他們的願望不一致，他們便埋怨新聞輿論。像指責我們刊登群眾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悼念胡耀邦的照片的人一樣。在他們看來，一切他們看不順眼的事，都是新聞媒體鼓動起來的。有時候，他們是明顯的不贊成中央的決策，但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意見，只好借機拿報紙來出氣。這是他們的慣技。對他們的意見太認真了是會上當的。因此，對某些人的埋怨，只能姑妄聽之。

《世界經濟導報》編委駁斥上海市委

5月3日　星期三　晴

章世鴻同志從上海回來，帶來一份《世界經濟導報》編委會給上海市委的公開信：《對「中共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決定」的陳述──事實真相，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信的開頭說：中共上海市委宣佈停止欽本立同志《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職務的決定後，我們反覆調查、核實並通過各種方式向市委表明，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決定是錯誤的。但我們反映的情況根本沒有引起市委和「整頓領導小組」的關注。鑒於上海市委已通過大眾傳播工具將此事向海內外公開，因此我們只能以公開信的方式來說明實際情況，並表明

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公開信逐一駁斥市委決定的理由。如所謂嚴重違反紀律，根本不存在。市委調看大樣時，按該報出版規定，已是正常出版時間。

市委審查期間，未表明要抽換稿件之前，報紙已付印並開始發行了。因此，所謂欽本立當面同意抽換，事後一字未改照印，是不實的。

公開信批評市委主要領導人不顧基本事實，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對《導報》的這種處理方式，「為建國以來所罕見，是極其輕率的」。「用製造新的錯誤、用錯誤的態度對待像欽本立同志這樣在海內外新聞界都有影響的老同志，是不得人心的」。說「在被整頓的環境下，《導報》要堅持原來的辦報方針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們



北京大學生聲援《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

除要求撤銷對欽本立同志的處分外，還要求撤回目前主持《導報》工作的整頓領導小組，讓《導報》恢復正常工作。

隨公開信一起散發的還有他們整理的社會各界聲援《導報》的情況。其中講到4月25日收到的首都新聞單位的聲援電，在上面簽名的，《人民日報》102人，《工人日報》45人，《光明日報》53人，《中國日報》74人，《中國青年報》88人，《中國婦女報》26人，《文藝報》18人，《國際電台》18人，還有《中國電機報》、《科技日報》、《文摘報》、《解放軍報》、《農民日報》等單位的記者編輯。

嚴家其、許良英、蘇紹智、于浩成、吳祖光等33人聯名給上海市委公開信《捍衛新聞自由》，指出上海市委違背了「黨政分開」的精神，決定是對參加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由導報和新觀察聯合召開）的同志的嚴重誣衊（因為市委決定認為，「發表這些座談會的講話，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他們要求上海市委公開道歉。

上海市委早就想按照胡喬木、鄧立群的意見整頓《導報》了，只因胡耀邦、趙紫陽不同意才遲遲不能動手。這次趁胡耀邦逝世，趙紫陽出訪朝鮮的機會，改組《導報》領導班子，可以說是蓄謀已久的。

不過，像這麼匆匆忙忙地在萬人大會上宣佈決定的處理方式是空前的，它引起的反響之強烈，恐怕也是未料到的。中國畢竟是進步了。人們敢於講話，敢於起來維

護真理了。不管你市委書記、省委書記，也不管你鄧小平說了什麼，要想像「文革」前那樣，企圖用個人權威、組織權威來封人們的嘴是辦不到的了。

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5月4日　星期四　晴

「五四」70周年。昨天首都大專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就放出空氣，說今天要上街遊行。一方面是紀念「五四」，另一方面是抗議政府（袁木、何東昌等人）的假對話。到下午四點編前會掌握的情況，大約有40所大專學校數萬學生上街，沿途觀看的群眾不下百萬，連王府井大街也因之行人稀少，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從打的橫幅看，還有外地學生，如天津南開、上海復旦、蘭州西北大學、吉林大學、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時，有人宣讀《五四宣言》，並宣佈明天無條件復課。宣言內容包括要求在高校實行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的試點，要求繼續與政府對話。語調是和解的、求實的。北京市曾佈置將學生堵塞在校內，或在半路攔截。今天情況有改變，除在新街口有道防線外，幾乎沒有什麼阻攔。

參加今天遊行的還有首都各新聞單位的編輯和記者。他們打的橫幅和標語有職業特點：「嚴正抗議上海市委撤銷欽本立職務！」「首都新聞界要洗刷恥辱！」「不要



趙紫陽（左）和鮑彤都在八九民運中扮演了悲刻英雄的角色

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真話！」「新聞屬於人民！」「開放報禁！」

最重要的情況是趙紫陽在接見亞行各代表團團長時的講話。上班後老譚就告訴我，胡啟立向秦川透露，趙紫陽已與鄧小平攤牌，表示寧可辭去總書記職務，也不同意鎮壓學生運動！據說鄧小平已妥協，看來情況正在起變化。

老錢告：鮑彤來兩次電話，通報今天趙紫陽在亞行的講話很重要，希望我們在版面處理上要突出這條新聞；但具體內容未悉，估計十九是對學生運動表態的。晚上從電視新聞聯播得悉，這篇名為對國內形勢分析的講話，果然是對學生運動表態。他是站在與學生平等的地位上



「五四」的大遊行回應了70年前的學運精神

談形勢的，並無袁木、何東昌等人對話時訓人的架勢。他要求政府、黨、學生各界都要冷靜、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解決問題。他肯定學生是愛國的、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他們要求解決的問題，也是黨、政府所要解決的問題。趙公開提出一個新觀點，即不能認為有群眾遊行示威形勢就不好。在各個方面都這麼看，對群眾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別的什麼，就不會看得那

麼嚴重，就不會那麼惶惶不可終日，不會那麼處於被動應付的地位，而應積極解決問題。不應把群眾放在對立的、處處防範的地位，而應看作推動改革開放，推動歷史前進的積極力量。

趙的講話，在大學生中的反應非常好。有位學生聽了廣播後說：「紫陽，你大膽地往前走吧！人民支持真正的改革者。」

余煥春給我送來一份台灣出版的《中國時報》（4月29日），上面刊登王若望4月25日寫給鄧小平的一封公開信的全文。報紙在文章前加了個駐香港特派員江素惠的一百來字的導語，介紹說：「王若望這篇《上鄧小平書》中，希望鄧小平不應將青年爭民主、自由的活動視作洪水猛獸，建議他學台灣蔣經國生前作出的開明而有遠見的決策，面對歷史，切勿一誤再誤。」

綜觀全篇文字，感情是真摯的，有些話說得很尖銳，亦屬逆耳忠言。信末有云：

> 你的身體得天獨厚，我倒寄予期望，希望你運用你舉足輕重的影響，還來得及為中華民族做幾件好事、實事，為後人景仰而流芳百世。現在你老是走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乞三思而行，切不可一誤再誤了！

王若望是鄧小平指名要開除黨籍的一位老革命。但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初衷未變，實在難得。這也證明了給他加上「自由化分子」的罪名是完全錯的。

維護公民權利

5月5日　星期五　晴

據悉，昨天除北京外，尚有上海、武漢、南京、重慶、西安、太原、長春、杭州、廣州、貴陽、長沙、昆明、福州、蘭州、西寧、石家莊、天津、大連、成都、合肥等城市學生上街遊行，其規模聲勢之大，是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

下午，在老黃牛錢辦公室開會，李仁臣同志傳達上午應急小組會議的情況。

應急小組是耀邦同志逝世以後，為處理學生運動事宜而成立的，成員有喬石、啟立、李鐵映。今天的會似乎是回顧總結。教委何東昌，北京市委李錫銘、陳希同等一再對中央的降溫方針表示不滿，一再強調要把指導思想統一到小平同志講話和「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去。他們無視趙紫陽講話在群眾中得到積極反響的事實。這不奇怪，他們是當官的，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很深，他們總希望老百姓都成為俯首貼耳，循規蹈矩的臣民。他們很懷念過去手裡拿著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鞭子，在群眾頭上晃來晃去，對群眾說一不二的日子。現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是不大好提了，但鄧小平的「反自由化」這根大棒也頂靈的。

看來，一場黨內鬥爭是難免的。白熱化的鬥爭可能在四中全會上。

老錢說了他的想法，說他正準備在明天啟立召集的會

上反思這一段宣傳報導的提綱。他表示不準備講具體的問題，包括4月17日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獻花圈的照片，儘管喬石、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一再指責我們刊登這幅照片。我同意他的想法，我說，籠統談反思可以，具體的不宜談。就拿4月17日那幅照片來說，如果有錯，責任在我。我至今並不認為有什麼不妥。有些人把群眾上街歸罪於刊登這幅照片，是毫無道理的。是先有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送花圈，而且有人接收，從中央到北京市，沒有人說不應該，更不用說是犯法。照片只不過是客觀存在的反映。沒有群眾上街的客觀條件，別說登一張，就是登一百張照片，也不會有十萬、數十萬群眾上街。解放戰爭期間，被毛主席譽為「第二戰場」的學生運動，難道不是先有國民黨統治的專制腐敗，再經我們共產黨做艱苦的、危險的群眾發動工作的結果，而是什麼人在報刊上登幾幅揭露國民黨黑暗的照片就能促成的嗎？世上哪有這樣的事？



北京市長陳希同一再對中央對學運的降溫方針表示不滿

再說1986年那次學潮，也是全國性的，那時《人民



參加遊行的北京市民

日報》何曾登什麼照片？根本連文字報導也不讓登嘛！可是學生消息照樣靈通。你官辦傳媒封鎖消息，人家可以收聽《美國之音》！你不客觀報導人家的活動，人家找外國記者、港台記者來開記者招待會。解放前，咱們搞學生運動的不就是這樣做的嗎？說實在的，如果從一開始就讓新聞界客觀地報導，各種形式的，官方的，民間的悼念活動都有報導，不一定釀成後來大規模的學潮，也不至於把學校的學生會、黨團組織弄得那麼脫離群眾，不至於出現所謂「非法組織」。

說到年青編輯記者昨天的上街遊行，鄭州市的一些人，國家教委何東昌等一再強調要嚴肅查處，似有不給處分就不甘休的勁頭。會上，大家都認為，年青編輯記者不是代表報社去遊行的，報社事先也做了勸阻的工作。

我說，我們做了勸阻的工作，是盡了領導的職責了的。但我認為青年人上街遊行，並沒有違反憲法，而且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因此，儘管我們不贊成遊行，但他們既然遊行了，提的要求，呼的口號又都是正確的，作為領導，我們有責任保護他們。

情況很微妙

5月6日　星期六　晴

今天一版頭條位置刊登了《首都高校昨起陸續復課，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是我們派記者到首都各高校採寫的。

下午，老錢、老譚和我商定：趙紫陽同志講話的反應暫停一停，不要刊登得太密太集中。在目前的情況下，太密太集中可能會幫倒忙。我們也議論了中國青年報的做法。他們集中刊登思想比較解放的同志，如胡績偉等同志的談話，好是好，讀者定會歡迎，但也可能給反對趙講話的人以口實，用以挑撥和激化趙鄧的矛盾。

情況很微妙。

胡啟立：認真落實趙講話精神

5月8日　星期一　晴

下午編前會，到老錢辦公室問他有什麼事需要在會上

講的。我們還沒說兩句話，紅機子電話響了，老錢忙著接電話。不知說什麼，只聽老錢問：「現在大局怎麼樣？」



胡啟立是「六四」中一直堅定站在趙紫陽一方，表示同情學生的中央領導人之一。

對趙紫陽的講話，學生的反響是好的，各校陸續復課就是證明。老錢電話裡問的大局，我猜想可能是指政治局對趙講話的看法，能不能得到多數贊成？趙的「五．四」講話，與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北京市委、國家教委何東昌等人，前些天已明顯表現出不同意趙的講話。這兩天，他們還派人到學校和基層散佈他們的觀點，說趙的講話不代表中央，激怒學生，並繼續整理、印發學生運動中少數人提的針對鄧的口號和小字報，企圖引起鄧的憤怒，堅持己見。老錢電話裡問的「大局」，估計指的就是這個。我不知對是誰，但必定是他信得過的人。

正在開編前會，老錢來了。他說，剛才啟立同志來電話，希望各部門認真落實趙紫陽講話精神，新聞界有什麼要求也可以提出來。

由此看來，大局是好的，趙的講話至少在政治局是得到多數人擁護的。

晚上，國際部同志告：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在國內記者吹風會上說，伊朗總統來訪，原計劃有鄧小平會見，現在小平同志表示，他不見了，除了與戈爾巴喬夫會談，以後各國元首、政府首腦來訪，一般都不見了。

這是個值得注意的動向。鄧如果真的能從這次學潮中反思，從今以後，不再以最高領袖自居，不再超越黨章，不再超越憲法，干預第一線工作，未必不是他本人的大幸，未必不是黨和國家的大幸，未必不是人民的大幸。

司法要獨立，新聞要自由

5月9日　星期二　晴

北大等校學生都有些活動。有人散佈趙紫陽的「五・四」談話不代表中央，引起群眾思想混亂，各校學生仍然不放心。

下午，200多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到全國記協遞交一封聯名信，要求就中國新聞界近期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對話。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1013們編輯記者簽了名，本報肯定也有人簽名，但我們編委恐怕事先都不知道。

北大、北師大等校一千五百多學生上街聲援新聞工作者。他們高呼「新聞記者，為民說話，爭取民主，不用害怕」等口號。他們也向記協表示三點意見：一、當前

情況違反新聞自由的原則；二、袁木說的新聞自由、總編輯負責制與事實不符；三、上海對欽本立的處理是錯誤的。

下午編委會，老錢比較詳細地傳達昨天啟立同志電話的意見。

啟立同志說，對學生運動總的是因勢利導，引導到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司法要獨立，新聞要自由。

司法獨立，由喬石負責提出實施方案。

新聞自由，由啟立負責提出實施方案。

新聞自由，總的要求是增加政治公開性、透明度。問題是當前的「度」定在那裡比較合適。新聞改革，能否在去年定的四條基礎上再前進一步？

他希望《人民日報》根據這次學潮的報導，總結幾條經驗，提出幾條措施，包括報社的自主權有多大，就可以做到客觀、真實、全面報導，可以進行輿論監督，可以引導輿論。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佈。

我們編委聽了都很興奮，都談了自己的看法，並取得了共識。這就是希望中央和各級黨委，從這次學潮中真正認識新聞輿論的作用，既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要從觀念上來個撥亂反正。比如說，新聞自由，讓報社按照新聞規律辦事，黨委不要管得那麼具體、那麼細，讓報社社長、總編輯獨立負責，包括報導突發事件，揭露

陰暗面，反映不同聲音等等。這樣做，是有利於安定團結，有利於改革開放，有利於提高黨和政府的威信呢，還是相反？自從「大躍進」以後，藉口不讓帝修反利用我們的報紙、廣播上的批評來反對我們，對新聞批評採取種種限制，直到現在。結果呢，有些心術不正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以至黨風敗壞越來越不可收拾。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人看清楚了。這次學生運動看得尤其清楚，以至黨報社論、鄧小平講話都不靈了。人民群眾失望了。如果不從根本上，即從觀念上來個撥亂反正，不從對新聞機構、事業的領導體制上來個轉變，即使多提出幾條措施，效果是不會大的。當然，具體措施也要提。

最後決定，由李仁臣負責，我協助起草一個文字的東西，供下次討論用。

聲援記者爭新聞自由

5月10日　星期三　陰小雨

又有一萬多大學生和文藝工作者騎自行車到首都幾家主要新聞單位——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遊行示威，聲援新聞工作者爭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隊伍到達本報西大門時已是下午五點左右，因路旁觀看的群眾太擁擠，走得很慢，差不多二小時才走完。

現在，有一種情況需要警惕。這就是北京市委、國家

教委以做群眾思想工作作幌子，派人到處散佈說，趙紫陽5月4日講話不代表黨中央，只有鄧小平的講話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才能代表黨中央；或者說，趙講話是對外國人說的，對內還是以「四·二六」社論為準……他們有意激怒學生鬧下去，從「左」的方面證明趙的講話不能解決問題，趙沒有解決突發事件的能力。聽說，有的學生要求5月15日戈爾巴喬夫來訪那一天，從首都機場遊行到城裡，歡迎戈爾巴喬夫；有的要求戈爾巴喬夫兼中國黨的總書記。這雖近乎笑話，但既反映了一些學生對我們黨（準確地說，對黨的高層領導）已不再抱有什麼希望，同時也不能不讓人將它與某些人的用心聯繫起來。

黨內的鬥爭太複雜了，太殘酷了。

據記者反映，天津南開大學出現署名「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大字報《和平民主進京》，說「學生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為了把本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推向新的高潮，決定組織『和平民主請願團』，於5月14日騎車進京」。目的是：一、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二、聲援首都大學生，敦促政府盡快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三、要求深化政體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

山西大學出現由五所高校組成的學生聯合自治會的緊急通告，宣佈各高校開始總罷課，組織學生上街遊行。

上海高校學生要求與江澤民對話

5月11日　星期四　陰雨



江澤民是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

老錢昨天在胡啟立同志那裡開會，研究跟學生和青年新聞工作者對話問題。

他說，總的精神是認真對話，但不能不管什麼問題都統統找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對話。中央的方針是多管道、多層次對話。在跟首都請願的新聞工作者對話之前，啟立同志擬分別到各新聞單位徵求意見。

今天下午的編委會上研究了這個問題，並作出了向各部門廣泛徵求意見的決定。

據記者反映，今天下午，上海部份高校的學生代表在復旦大學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組織七人請願團代表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赴京請願。請願內容包括：一、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印發《導報》439期原版；二、修改上海市人大通過的遊行條例；三、就欽本立問題與江澤民對話；四、要求新聞自由。同時，要質問國務院：《導報》錯在那裡？欽本立錯在那裡？什麼叫新聞自由？什麼叫總編輯負責？

太原市，山西大學等五所高校六千多學生遊行到省政府靜坐，要求與省長對話。

海南大學二千多學生在海口市遊行。

按民主與法制軌道解決問題的設想

5月12日　星期五　晴

午夜（13日凌晨）一點多老錢來電話，問一版拼了沒有？接電話的小谷告訴他還沒有拼。老錢說，先不要拼，等會兒有個重要新聞。

什麼重要新聞？小谷沒有問。按正常做法，重要新聞一般都由《新華社》先發預告，而這一次《新華社》並無消息。我給海外版大余打電話，問老錢給他打電話沒有？他說沒有。我告訴他老錢要等重要新聞的事。他說，太晚了，海外版恐怕等不及了，問我怎麼辦？我建議他給老錢掛電話請示。

大余打完電話告訴我：老錢說10分鐘以後可以告訴我們什麼內容，並說鮑彤正在來他家的路上。

新聞內容雖然不知道，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個新聞是紫陽同志關照要發的，而不是什麼人背著他發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大家這麼一分析就放心了。

現在鬥爭真是太複雜了！

二點左右，老錢把新聞傳來了，並囑放一版頭條位置。內容是對下個月人大常委會議程，即討論這次學生

運動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反應的，其中有工人，有大學生和教師等，最後希望大學生採取克制、冷靜態度。老錢還告訴我們，這些反應都是確有其人其事的。當然，我明白這是趙紫陽要鮑彤辦的。

我們想起了今天一版刊登的下月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新聞來。這個議程是委員長辦公會議提出的。這麼早就公佈議程，而且都是當前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這個會議，這則新聞也是按照趙紫陽和政治局的意見辦的。

看來，趙紫陽對按民主與法制軌道解決問題是有一套設想的。但願沒有人，特別是那些政治老人給他出難題。

——安定團結很重要，但鴉雀無聲，萬馬齊瘖是否就是安定團結？背離憲法和黨章講安定團結，是否妥當？

——建議中央徹底否定「清污」和「反自由化」這兩次運動。

——建議中央注意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表演。

……

大家的發言雖然很尖銳，但都比較含蓄。比如關於中央政治生活不民主，背離憲法和黨章講安定團結這麼一句話，誰都知道指的誰；關於注意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表演，誰都明白指的是他們抵制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精神，堅持「四・二六」社論和鄧小平講話，名為向學校黨支部做工作，實為激化學生的不滿情緒，用心險惡。

座談會六點結束。

今天下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13所高校300多絕食學生和上海七人請願團中的三位學生，在2000多同學的護送下到達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北大的絕食學生離校時，青年教師為他們餞行；正在北大學習的作家班學員為他們寫一條大橫幅：「壯士已去盼回還」，並與絕食學生在橫幅下攝影留念。

晚上，圍觀的群眾把天安門廣場擠得水泄不通。

絕食品店學生的要求有二條：

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的對話；

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北京大學二百多教師聯名給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公開信，建議：

一、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人盡快與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對話，以求盡早妥善解決問題。

二、應當盡早對這次學潮的性質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安民心、黨心，不應採取拖延政策。

三、應當高度重視這次絕食請願活動，以認真、謹慎和人道主義的態度，採取一切措施保障學生的身心健康。

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在北大貼出大字報《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號召知識份子聲援絕食學生。

中國人民大學教師貼出大字報，呼籲：「人大的教師們、教授們，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們的良心、勇氣和社會責任感來吧！讓我們書寫歷史！」

閻明復感到很為難

5月14日　星期日　晴

中午12點剛過，秘書室通知：十二點半到老錢辦公室開會；他現在在府右街，馬上回到報社。

不用說，是有重要事，估計跟天安門學生絕食請願有關。

我趕到老錢辦公室時，只差老范沒找到沒有來，其他人都到了。

老錢說，十一點以前，中央辦公廳通知他到閻明復同志處開會，他趕到時，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新華社》的穆青，廣電部的馬慶雄已到了。閻明復說，他昨晚找北大、北師大、清華的學生頭頭談話。李鵬事先定了一個談話原則，就是這次學生運動的性質是動亂，不能退讓。這是一條線。他感到很為難。在談的時候，他對學生頭頭說，4月26日以前的和4月26日以後的情況不一樣。4月26日以後，大家都很克制，守秩序，中央是肯定的。學潮的性質，主要看以後。他只能講到這

一步。他問學生頭頭，如何開始對話，他們有無能力影響天安門絕食的同學？他們回答可以影響三分之二；只要開始對話，就可以往回撤。學生頭頭要求的是黨、政府與他們單獨對話。他們也沒有要求馬上承認他們組織合法化。


閻明復在政府與學生中左右為難

閻明復將情況報告胡啟立，胡啟立馬上報告趙紫陽，趙馬上──今天上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

在常委會上，胡啟立基本同意閻明復關於學潮性質的說法，即「四・二六」社論是根據4月26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月26日以後情況不同，沒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故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紫陽同志「五・四」講話就表明了。這既照顧了學生，又照顧了鄧小平和李鵬同志。當然，學生不一定滿意。

趙紫陽同意胡啟立的意見。會議決定下午由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三人與學生對話團對話。

中辦、國辦信訪局已將決定正式通知學生。他們找對話團成員需要一點時間，反正他們什麼時候找齊就什麼時候開始對話。

據老錢介紹，李鐵映調子很高，有點想推諉，不願當

主講（他是政治局委員）。會上大家一再說明利害，他才勉強接受任務。

報社決定派以羅榮興為首的四位記者採訪對話。

我們衷心希望對話成功，但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李鵬對學生運動性質定的原則讓人不解。前些日子袁木等人不是也說過，「四·二六」社論說的動亂，不是指參加遊行示威的廣大同學，而是指所謂極少數壞人說的嗎？現在面對學生對話團，為什麼又不肯這麼說了呢？難道前些時說的並不是真心話，而只是一時策略的需要？這是一個不祥的信號。對人民群眾搞政治權術是很危險的！

據記者反映，今天有一萬多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請願學生。

戴晴、于浩成、包遵信、李澤厚、李洪林、嚴家其、蘇曉康、溫元凱、劉再復等，發表《緊急呼籲》：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學潮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罪人。

呼籲也懇請同學們發揚理性精神，暫時撤出天安門廣場，以便中蘇高級會晤能得順利進行。

山東、遼寧、陝西、上海、南京、天津等都有高校學生以不同方式聲援北京學生的絕食鬥爭。

知識界和各地聲援絕食請願

5月15日　星期一　晴

戈爾巴喬夫到達北京。原計劃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歡迎儀式，因絕食學生沒有退出廣場，臨時改在首都機場舉行。可能由於時間太匆促，檢閱儀杖隊時連紅地毯也沒有鋪。在國際上，這可能是十分罕見的。這也是對那些自我估計過高、無視群眾意見的人的一種懲罰。

下午，嚴家其、包遵信等「中國知識界」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包遵信說，參加遊行的有首都二百多單位的四百多人，其中有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社科院、北大、清華、北師大、政法大學等單位的教授、講師、研究員，也有博士生、碩士生，馮友蘭、季羨林、湯一介等著名學者教授也參加了。包遵信對學生說：「我們的政府到現在還沒有出來講話，這是一個無能的政府。你們肩上承擔著中國現代化的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希望。」

中國知識界的大遊行，顯示了知識份子要求獨立自主、民主自由意識的覺醒，要挺起脊樑做人。

北京學生的絕食鬥爭，繼續在陝、黑、皖、冀、豫、川、鄂、津、滬、甘、寧、晉等省市院校引起強烈反響和聲援。



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部份學生開始絕食絕食

下午的編前會上，請昨天和今天採訪中央領導人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等與首都部份大學生對話的記者介紹情況。

總的印象是：受命於李鵬的李鐵映等人堅持不得在學潮性質上讓步的原則，在對話中老處於被動地位，老在「讓實踐來檢驗」上面兜圈子，給人的印象是缺乏誠意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閻明復發言，表述了得到胡啟立、趙紫陽首肯的觀點。但當他離開會場上廁所的時候，李鐵映等馬上聲明閻的發言不代表中央意見，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才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對話不但激怒了學生，也引起了許多原來並不主張遊行，更不同意絕食的知識份子的憤怒。今天下午那麼多知識份子參加「中國知識界」大遊行，其原因就在這裡。



趙紫陽會成為第二個胡耀邦嗎？事態發展的結果真的證實了這個人們的惡夢成真。

編前會結束後，我們幾位編委在老錢辦公室交換意見，大家都對黨中央、國務院的態度感到失望。老錢說，看來，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出現「第二個胡耀邦」是難免的了！對趙被迫辭職以後的形勢，我們覺得可能會激起各界的更大不滿，不能排除工人罷工，農民也用別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意見。反正，不會是86至87年耀邦同志下台時一模一樣。歷史可能會重演，但決不會完全一樣。那些搞陰謀詭計的人，他們吞下去的可能是自己釀成的苦果。

不管怎麼樣，只要趙被迫下台，新上台的人不會是開明的，是不會饒過《人民日報》的。我們的最好出路是辭職。

夜班工作結束以後，與劉允洲、谷嘉旺乘車去天安門廣場看一看。天快亮了，仍有三萬人左右，四周存放的

自行車不下一萬輛。停在歷史博物館前面的救護車有十幾輛。

趙紫陽代表常委發表書面談話的由來

5月16日　星期二　晴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進入第四天，隊伍已達到三千人，先後暈倒的已達六百多人。下午，北京新聞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醫務界、企業界，以及民革、民盟、九三、台盟等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十萬多人，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東西長安街交通為之斷絕。報社也先後有二批人參加遊行。

北京大學貼出一張有一百四十多人簽名的《北京大學教授支持南京大學教師來電聲明》的大字報，說：「鑒於目前局勢發展嚴重，鑒於何東昌在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表現的冷漠和無能，以及他對十年教育重大失誤所應負的主要責任，我們北大教授堅決聲援南京大學教師倡議，敦請何東昌先生馬上辭職」。

北大朱德熙等十位教授發表《緊急呼籲書》，要求黨和政府肯定這次學潮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不是動亂。

據不確切統計，今天南京、成都、重慶、合肥、新鄉、鄭州、保定、太原、上海、武漢、青島、西安、漢中、長春、瀋陽、杭州、蘭州、天津、廣州、海口、哈爾濱、呼和浩特、長沙等城市，都有學生以各種方式聲

援北京學生。

大家心急如焚，見面除了議論此事沒有別的。

下午二點半，按計劃召開總結這次學潮報導開展新聞改革的第二次座談會。到會的人與上次的差不多。老錢首先介紹今天上午中南海開會的情況：承認形勢嚴峻，又講黨和政府如何重視。中心意思是希望大家想辦法降溫，不要再給天安門廣場升溫了。

我理解老錢（也是中央領導人）說這些話的苦心。作為領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誰願意看見目前這種局面？誰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局面？然而，不管怎麼說，對學生的合理要求不肯痛快答應，領導人不願與群眾面對面地談話，給人一種冷漠的感覺，卻是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的事實。在舉國不安、焦急、憤慨的情況下，要降溫談何容易。

有人在會上介紹說，今天聲援的隊伍中，打的標語，呼的口號，有相當一部份是衝著小平同志來的，如：「小平，你該退了！」「小平，你好糊塗！」「小平，小平，八十高齡，身體還行，腦子不靈，處理國事，胡亂逞能，及時引退，利國利民。」也有要求李鵬下台的。

會上許多人發言都很激動，大家都不理解：為什麼為了維護一個人的錯誤——小平同志「四．二五」關於動亂的講話，竟不惜激怒全國人民？

大家廷對如何有利於降溫提了一些建議。有人建議由《人民日報》寫評論糾正「四．二六」社論的錯誤，主動



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寫下了遺書

承擔責任。這行不通。這並不是我們怕承擔責任。「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古人尚且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這是因為現在誰都知道了，「四・二六」社論是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寫的，並且知道社論也不是報社寫的。我們現在還是黨中央機關報，未經中央授權，報社是不能辦的。

有一位同志建議，用記者訪問趙紫陽的方式，給趙一個表態的機會。大家認為這個主意不錯。座談會後，編委留下繼續商量，作出二條決定。一是設法與趙紫陽取得聯繫，二是派記者訪問一些在學生中有影響的名人，請他們發表談話，既肯定學生運動，又不超出閻明復講的界限，同時又對學生、對黨、對政府提出要求。

說巧也巧，下班以後，六點多鐘，楊尚昆同志的兒子楊紹明送他拍的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會談的照片來報社。老錢與他談我們的想法，請他說服楊尚昆同志出來推動促成趙紫陽發表談話——既盡量滿足學生的合理要求，又

不傷害小平同志。他回去一說，尚昆同志果然同意，要求我們趕快擬一個講話稿交晚上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八點多鐘，我們把擬好的稿子送給啟立同志。這個稿對學生運動基本上是重申趙紫陽「五・四」講話精神，但有二點新意。一是強調是中央常委一致意見（針對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向基層散佈「五・四」講話不代表中央）；二是秋後不算賬。講話共500多字，題目是《趙紫陽總書記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談話》。

晚上值班，一直等回饋資訊。到十二點，除了中國青年報電話詢問傳說趙紫陽今晚去天安門廣場發表講話，中宣部傳出同樣傳聞外，毫無動靜。我和大保等得不耐煩，打了二個試探性電話，一個給閻明復，一個給鮑彤。閻的家裡和辦公室都有無人接電話，鮑彤的電話是位姓吳的接的，說開會未回來。這說明會上鬥爭很激烈，但會議沒結束，還有一線希望。

快二點時分，《新華社》預告要發重要稿件。不用問，準是我們久等的了。

《新華社》稿很快就來了。我們代擬稿的內容還保留著，但形式變成了趙代表中央常委發表書面談話，並增加了勸學生停止絕食，保護身體，以及黨、政府將繼續與各界對話，認真研究民主化方面改革的問題。

夜班一些同志看了《新華社》稿以後，覺得不夠癮，懷疑這個談話能解決問題。主要是沒有明確表示「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同時沒有親自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

請願學生，時機也晚了一二天。這些看法是頗有道理的。

然而，畢竟是前進了一步，繼續這樣走下去，這次民主愛國的群眾運動是可以慢慢緩和下來的。

「我們不要皇帝」

5月17日星期三晴

群眾繼續遊行聲援絕食學生，估計有幾十萬。在遊行隊伍中，有高校教授、講師，中小學教師和中學生，有新聞、出版、科技、法律、工交財貿、郵電、醫療、國家機關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有各民主黨派和宗教界人士。在廣場上還有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外地學生一萬餘人。

趙紫陽代表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看來時機晚了一點。正在群情激憤，無法控制的時候，這個談話顯得落在群眾後面了。晚上派記者到絕食學生中瞭解，認為滿意、可以接受的為數很少。

報社內部也群情激昂。年青人不用說了，一些老同志，三八式、解放式的，六七十歲的人也不夠冷靜。有個青年寫張小字報貼在一樓評報欄裡，說編委會處境困難，建議編委出去旅遊或休養，由報社組織志願者臨時小組協助辦報，安排版面，直到外部環境改善為止。我並不認為寫小字報的人要奪權，但卻使人想起「文革」中造反派奪權的醜劇來。可能是許多人都有此聯想，覺得

這個建議不可取，所以無一人簽名回應。不過，大家要干預、影響編報的意圖還是很明顯、很強烈的。

剛吃過晚飯，本想休息一會兒再去上班，無奈李仁臣來電話，說五號樓前面已聚集一百多人，要求和我對話。九點到報社，剛坐下，就有三位青年進來。他們自我介紹後，遞給我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六點要求，包括遊行消息要登一版頭條，遊行的通訊，一個圖片專頁，還有本報青年和其他十三家新聞單位部份編輯記者的聯合聲明等，都要在明天見報，並要求立即答覆。我說，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建議，請繼續提，我們一定認真考慮，能採納的一定採納。至於今晚的版面如何安排，等我們全面研究情況後才能答覆，如果沒有別的意見，請大家退出去。

老錢也接到電話從家裡趕來。十點半，他召集在家編委開會，分析今天情況，安排版面。今天沒有比群眾遊行更重要的新聞，大家同意我的建議，群眾遊行的新聞放一版頭條位置，照片可以適當增加，但出一個版太多了。會後，受編委之托，向聚集在一樓大廳的同志們通報版面安排的初步考慮，多數人表示滿意。

凌晨三點，《新華社》通知，中央領導同志可能要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見面，要各報等候新聞。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個舉措，聽了都很興奮。我們立刻派記者到天安門等候。等到五點，天已大亮，才知道中央領導人是到協和等醫院看望病倒住院治療的絕食學生，而不是

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見面。這雖然也重要，但從新聞價值看，比到廣場與群眾見面和百萬群眾大遊行的新聞來就差一點了。時間也太晚了，決定在遊行新聞前發一則「最後消息」。

二版《人民論壇》專欄刊登冰心老人寫的200多字的短文《「此謂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孫」》，文如下：

這是兩句我小時在煙台農村裡很小的一座土地廟裡柱上看到的對聯。

現在天安門廣場上有幾十萬受苦受難的我的子孫，這苦難何時才能了結？

我極其贊成北京十位大學校長發表的公開信內說的：「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

我認為現在只要有一兩位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在天安門上露面，向幾十萬群眾哪怕說一兩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話，就會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那麼，我們的子孫們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慘重的代價。

在這裡我請求今天的民之父母們，盡快地來保「我的子孫」們吧！

今天，嚴家其等人發表《五・一七宣言》，說「清王朝已滅亡76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清華、北大也有類似內容的大字報，要求結束老人政治。

民盟主席費孝通、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聯名致函黨中央，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建議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全國婦聯等也發出呼籲，呼籲學生停止絕食，呼籲黨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學生對話，要求中央否定「動亂」的定性。

北京以外的二十七個城市約三十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有些城市的遊行隊伍，不僅有高校學生和教師，還有新聞出版單位的職工，有產業工人。也有宣佈絕食的。在口號標語中，也有「我們不要皇帝」，「打倒獨裁」的內容。

矛盾在激化。

只求不要出現第二個胡耀邦

5月18日　星期四　晴

社內外群情繼續高漲。首都遊行聲援學生的群眾不下百萬，大多數是產業工人和國家機關幹部。打的橫幅比較集中在要求小平同志離休和李鵬辭職上。

報社內部，從下午二點起，大家就聚集在編輯部二樓和三樓辦公室和過道裡，議論紛紛，彷彿天下就要大亂，民主政治馬上可以實現似的。我們編委在老錢辦公室聽取羅榮興關於上午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情況的介紹，還



人民日报

希望中央领导尽快满足
学生赤心爱国要求合理

应该出来见见孩子们

「此谓民之父母，
以能保我子孙」

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紧急呼吁
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

《人民日報》上關於絕食學生的報道

未結束，高集、于明、傅真、劉衡、林晰、陳泊微等老同志進來要求談話。編委會不得不停下來，老錢、大保和我三人代表編委和他們談話。他們剛說完看法和要求，老錢正準備談自己的看法，林鋼等同志闖進來，說對話不要分層次，二樓會議室還有許多人等著對話哩！經幾位老同志同意，大家一起轉到二樓會議室，和那裡的同志一起對話。

二樓會議室和走廊擠滿了人。

會議由群眾推舉的代表主持，我們三個編委算是他們請來對話的。

發言的人很踴躍，共同的意見是不滿意目前關於學生

運動的報導，說態度不鮮明，篇幅少。許多人在發言中都強烈要求發表一篇批判「四·二六」社論的社論，向社會表明《人民日報》廣大群眾的觀點。也有人要求發表一些對運動性質的看法跟中央（「四·二六」社論）不一致的言論——個人署名文章，等等。這些意見、要求，都不算過分，按照新聞規律辦事，就應這樣做；在民主國家，早就這麼辦了，但在我們這裡不行。

說是對話，實際上搶到話筒的人，都發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說，博得熱烈的掌聲。老錢、大保和我，完全處於被質詢的地位。既不是對話，要理智地回答問題，大家也很難聽進去。

老錢要去中南海開會，臨走時簡明扼要地講了自己的觀點。大意是，一、中國現在還需要鄧小平的領導；二、來《人民日報》工作並非自己的意願，是中央讓來的，並且早向中央表示，希望在《人民日報》的時間不要太長，故對當前的宣傳報導，只是考慮不要越出中央黨報這個格局，並沒有考慮個人的利害；三、在他認為不能履行中央交給他的任務的時候，他就自動辭職。

我也從總的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我說，由於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對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可能跟大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的心跟大家是相通的，一致的。說實話，我從來沒有想過要保什麼烏紗帽，現在的職務，我個人的德和才都是不配的。我和編委諸同志，對版面的處理，考

慮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更好地反映群眾的意見，又能避免出現第二個胡耀邦。我們認為，這樣做，可以避免歷史大折騰，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對改革開放更有利……

對我和老錢的話，有些人聽進去了，但許多人聽不進去，包括一些老同志，他們聲言出現不了第二個胡耀邦。會議沒法繼續下去，主持人也控制不了會場秩序。

我回到辦公室，許多同志跟了進來，表示希望編委會不要撒手不管，並說有些同志的想法不現實。這時，不知那裡傳來（可能是有人從天安門廣場聽來的）鄧小平辭職的傳聞，頓時整個大樓像要倒塌似的，人們從辦公室走出來，奔相走告，好像終於盼到了這一天——中國結束了老人政治。還有人說，天安門廣場已放了鞭炮。

我和大保不敢相信。聽到幾聲不同意見就辭職，這不符合鄧的性格，這是一。小平同志再開明，也不會在目前的情況下撒手不管，這是二。我們用紅機子給胡啟立同志辦公室打電話，沒人接；又給中辦秘書局打電話，接電話的同志回答沒有聽說。大保又給鮑彤打電話，鮑彤說不可能。這時大家才慢慢冷靜下來。

參加首都新聞工作者遊行的記者告，北京市的新聞工作者散發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的傳單，揭露北京市領導人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的不光彩的表演。傳單要求：

一、通過新聞媒介，公佈市委對4月學生運動的分析、匯報材料和「請戰」、要求中央授權的全過程，及

「四・二六」萬人大會上李錫銘、陳希同等講話的全部內容、向各區縣局（總公司）部署「反擊」的具體步驟。

二、公佈市委、市府在學潮中，制訂及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不准募捐、不准接待學生、不准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

三、市委、市府要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問題明確表態。

四、要求李錫銘、陳希同盡快同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行總編輯責任制，取消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

這幾條，自4月26日以後就陸續聽說過，北京市新聞單位的這份傳單證實了過去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說明了袁木等人在4月底與學生對話時為什麼敢於指名道姓把總書記趙紫陽拋出來（指責他打高爾夫球），說明有些人如何利用這次學生運動納入黨內權力鬥爭，以實現他們早就蓄謀要達到的目的。

晚上，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局——出現第二個胡耀邦的消息還是來了。雖然只是傳聞，但無風不起浪，傳聞總是某些人心態的反映。大家感到迷惑、失望，整個大樓出奇的安靜，夜班辦公室沒了往日活躍的氣氛！

中國總是有希望的，但恐怕至少要停滯（如果不是倒退的話）十年。

李鵬宣佈在北京實行戒嚴

5月19日　星期五　晴

首都各界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遊行和聲明、談話有增無已。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同加總督會談時也指出：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是愛國行動。朱學範呼籲：希望黨中央立即召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會議。葉篤正、吳大琨、林蘭英等十二位人大常委緊急呼籲：肯定學生愛國熱情，真誠籲請學生停止絕食，建議從速召開全國人大黨委會緊急會議，研討當前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今天二版除了幾則戈爾巴喬夫活動的新聞外，絕大部份篇幅是各界繼續呼籲的新聞，有全國工商聯的，農工民主黨的，致公黨的，台盟的，團中央、全國青聯和全國學聯的，中國作協的，新聞界的，還有包括紐約美洲華僑日報、紐約蘋果電視台、華盛頓華府新聞報、洛杉磯論壇報在內的海內外19家新聞出版單位的領導人聯名致趙紫陽和李鵬的信。文藝界名人陳荒煤、馮牧、吳雪、周巍峙、丁嶠、周海嬰、楊憲益、張汀、黃苗子、唐達成等，社會科學界名人丁偉志、胡繩、任繼愈、俞平伯、呂叔汀、李澤厚、馮至、劉再復、賀麟等，也分別聯名呼籲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盡快與學生對話，接受學生的合理要求，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民主性質，同時也勸學生停止絕食，回校復課，言辭懇切，十分感人。對於各界有名望的人士，（其中不少還是老共產黨員、高級幹部）的這些聲明、呼籲，那些一口咬定這次學潮是極

少數壞人煽動起來的人不知作何感想，難道他們真的相信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各界人士也是受極少數壞人的唆使？

上午，報社同志對昨天二則截然相反的傳言仍議論紛紛，無法證實。儘管民心傾向趙紫陽的「五·四」講話，但我更為相信趙紫陽下台的傳聞，因為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加上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影響太深太重了。一個人一旦掌握了全國的最高權力，要他自動交出來是不可能的。無論戴的什麼帽子，總統也好，主席也好，委員長也好，總書記也好，反正都想當皇上則是一致的。中國自古以來的改革家都沒有好下場，即使在今天，也很難避免。

下午，聽說閻明復向民主黨派領導人通報情況，共三點內容：鄧小平為黨的領袖；「四·二六」社論是對的；黨員不准上街遊行。這進一步證實我的分析。

晚上十點，黨中央、國務院在總後禮堂召開幹部大會，中直機關、國務院、中央軍委、北京市四大系統副部級以上幹部和部份離休幹部代表參加。報社參加的有老錢、老譚、老范、大余、大保、李仁臣和我，還有老胡、老秦、老李，加上機關黨委書記許仲英、離休老幹部總支書記王澤民和評論部的于寧。

大家的眼睛都盯著主席台：趙紫陽沒有露面。雖然主持會議的喬石說趙因病請假，楊尚昆也說趙身體確有不適，但在新中國生活了三四十年的人，誰都明白這是什

麼一回事。



李鵬代表中央宣佈在北京實施軍管

李鵬代表中央講話。因為是內部講話，又是對高級幹部講的，所以是用不著掩飾的，他對這次學生要求民主，要求改革的愛國民主運動大張撻伐；連所謂「動亂」是對極少數壞人說的這一類偽裝也撕下了。他宣佈在北京實行戒嚴。

楊尚昆說明為什麼調部隊進城執行戒嚴令。邏輯是矛盾的。既然說派部隊進城不是針對廣大群眾，包括遊行示威的廣大學生，而是針對極少數壞人的，那麼為什麼要從全國調那麼多的部隊到北京來呢？北京的武警加上北京衛戍區部隊，難道還對付不了「極少數壞人」嗎？

李錫銘代表北京市作書面發言，介紹這次學生運動的情況。材料是按照他們的觀點整理的，充斥著歪曲和捏造。

大會進行和結束時，鼓掌的人最多時也只有一半左

右。這在過去的這種範圍的大會中是沒有的。本報出席的人員中，除王澤民外，從頭到尾都沒有人鼓掌。這也是黨心人心的一次測驗。

大家都不說話。在回來的路上，也沒有說話。

回到報社走進五號樓，發現原來貼滿評報欄的大小字報都不見了。問總編室的同志，原來是他們看見我們乘車出去以後，猜測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問題，並且報社有幾位同志已在北京周圍看見軍隊調動，以為要實行軍管，所以把大小字報都收藏起來。人民，中國人民，在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中鍛煉出來了。

昨天，李鵬、李鐵映、閻明復、陳希同等會見絕食請願學生代表。據《新華社》報導，學生代表王丹、吾爾開希等提出停止絕食請願的兩點要求，也可以說條件，一是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民主愛國運動，而不是所謂的「動亂」；二是盡快對話，並且要現場直播。他們說，只要政府給予滿意的答覆，他們就可以做學生的工作，撤離廣場。這兩個條件，一般人都認為是合情合理的，黨和政府有誠意的話，行或者不行，三五分鐘就可以說清楚。但作為黨和政府的領導，李鵬就是不肯痛快地回答學生的問題，而總是兜著彎子說話，只肯定學生的出發點和提出的要求是好的，否定學生運動的效果，堅持「四・二六」社論給這次學生運動的定性。這是很矛盾的。

電視廣播這則新聞以後，報社收到不少讀者電話，都是批評李鵬等人缺乏解決問題誠意的。汽車製造廠一位

工人說，他和他所接觸的工人，無不對李鵬在對話中的態度表示憤慨。另一位工人說，現在形勢非常嚴峻複雜，一旦出現什麼不好的情況政府應負責任。也有一些天真的讀者懷著良好的願望理解李鵬說的這句話：「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在搞動亂。」他們質問《人民日報》為什麼發表「四・二六」社論，希望報社發一篇糾正「四・二六」社論的社論，向人民道歉，不要充當替罪羊。這些天真善良的人們，明天看到李鵬在今天總後禮堂的講話，應該清醒了吧：他們17日與學生代表見面，原是逼於社會輿論的壓力，並不是真的想通過民主、平等、法制和協商的原則解決問題。

趙紫陽向學生發表告別講話

5月20日　星期六　晴

原計劃上午、下午都去協和醫院作體檢，因城內交通中斷，主要交通路口，如附近的呼家樓、大北窯、三元立交橋等，群眾都設了路障，以阻擋部隊進城執行戒嚴任務，並估計醫生也無心工作，所以不去了。

昨晚在家休息，是李仁臣值班。今天的報紙編得很好。右上報眼刊登趙紫陽19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與絕食請願的學生們見面講話的消息和圖片。話是全文，除了懇切希望同學們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化外，還婉轉地說出了黨內高層的鬥爭以及他的處境，十分感人，

赵紫阳李鹏昨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

赵总书记恳切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

[illegible]



[illegible]

北京部分高校请愿学生昨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

[illegible]

《人民日報》上關於趙紫陽到廣場探望絕食學生的報道

是一篇向全黨全國告別的演說。小谷告，稿子是昨晚鮑彤派人送來的，沒有送給別的新聞單位。我們這麼處理是非常好的。首都其他報紙都把李鵬在黨政幹部大會上的講話放在頭版頭條位置，我們把它放在一版下面，通

版標題無「動亂」二字，這也是與別的報紙不同的。

昨天凌晨，天安門廣場上的同學聽了趙紫陽的講話，晚上九點已宣佈停止絕食，但晚上十二點從廣播裡聽到李鵬在黨政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後，二十萬人宣佈要繼續鬥爭，學校師生和廣大幹部、群眾也為之憤慨！

早晨，李鵬發佈北京實行戒嚴令，北京市陳希同發佈三項戒嚴事項，禁止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罷市，禁止發表煽動性演說，禁止集會等等。這是我們黨進城四十年來頭一回，揭開了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很出一些人的意料，今天又是一次群眾遊行示威的高潮。這就是廣大群眾對黨的戒嚴的決策的反響！

19日有人在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說「趙紫陽總書記已被罷免，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學生採取強硬措施」，呼籲社會各界絕對不要採取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中共全國特別代表大會。今天，報社幾位青年私自將這個講話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為散發。這等於《人民日報》印發一樣，當然是不能允許的。老錢決定在明天報紙的一版上刊登一個聲明，說明《人民日報》近十年來從未印發過任何號外。

自從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宣佈絕食請願以來，每天晚上總有一些並非夜班的青年同志到夜班辦公室來打聽消息，或者交換資訊。今晚海外版楊良化等人來，說想寫一篇記北京戒嚴的新聞特寫。我覺得這個語音不錯，請他寫

出來看一看。

快到十二點時，他真的寫出來了。通常的通訊特寫寫法，洋洋一千多字。在平時，這樣寫是可以的。但現在是非常時期，是戒嚴期間，禁止這禁止那的，按通常的寫法是不行的。

我本著既要適當反映客觀真實情況，又不要給人以跟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印象的報導原則（這是耀邦同志逝世以後我們編委定的原則），改寫成一百多字的新聞特寫，題目也改為最平和的《北京戒嚴第一天》，把數十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街上遊行示威隊伍不斷的情況透露出去。加上花邊，放在一版刊出。新聞界把這類新聞叫「打擦邊球」。全文如下：

> 本報北京5月21日4點30分訊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發佈第一天，首都社會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
>
> 天安門廣場上，數十萬大學生仍在和平靜坐。白天，大街上遊行隊伍不斷；夜晚，廣場附近，東西長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道口滿是市民。

估計這則新聞會引起不同反響，沒有請示老錢（老譚住院）就用了，為的是萬一上面怪罪下來，我來承擔責任，讓他超脫一些。

八位上將呼籲：軍隊不要入城

5月21日　星期日　晴

數以萬計的北京和外地的高校學生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抗議國務院的戒嚴令。

有位記者告，他下午二點在北京火車站六號月台，看到一列滿載士兵的軍車，共14節車廂，約1200人。他問從車上下來的一位上校：知道北京發生什麼事嗎？上校點點頭。月台上擠滿前來堵軍車的大學生和市民。大學生向士兵介紹北京情況，給士兵送水。北京市民舉的一個標語牌寫著：「49年解放軍進京，我們夾道歡迎；89年解放軍進京，讓你寸步難行。」鐵路員工很支持學生，他們密切配合，維持秩序，火車進出站正常。

北京「高自聯」、「工自聯」和「絕食團」聯合發表《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在廣場內外散發。聲明主要內容如下：

> 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
>
> 第二、反對軍管，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

也呼籲絕食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牆。

第三、反對獨裁者愚弄軍隊，呼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個暴君。我們的原則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的。

第四、我們不承認國務院總理簽發的關於對北京部份地區的戒嚴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款並沒有規定國務院可以授權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論、遊行、示威等憲法給予的權利。為此，我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這個戒嚴令。

第五、我們學生將同教師一道罷課、罷教，直到我們取得最後勝利。

第六、我們首都工人將利用一切和平而有效的手段，包括罷工，來達3的。

在天安門廣場散發的傳單中，還有一份署名「首都知識界300餘人」的《緊急呼籲人大常委會提出彈劾李鵬案》：「鑒於目前的局勢，只有李鵬下台，才足以平民憤，拯救國家、民族的災難。為此，我們緊急呼籲人在

常委會委員，在國家民族危難之秋，不負全國人民的重托，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彈劾李鵬，以解國憂。」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業發展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也聯合散發《關於時局的再次聲明》的傳單。

聲明說，「由於少數高層領導堅持並擴大已有的決策失誤，對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採取鎮壓措施，中國目前已面臨真正的社會大動亂和民族分裂的危險，處於歷史的緊急關頭。」「李鵬5月19日晚上的講肆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製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視各界人士的呼籲，排斥趙紫陽總書記5月4日以來一系列正確講話的精神，嚴重惡化了局勢，致使社會面臨動亂。」聲明「再次呼籲全國人大和中國共產黨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行使憲法和黨章賦予的權力，對時局進行干預」。

中央美術學院召開黨委緊急擴大會議，發出致北京市委並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電報，「以愛護黨，愛護人民的赤誠之心」，呼籲和懇請「立即撤回從外地調到北京的軍隊，以避免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態不可設想的惡化」。

在諸多的呼籲、聲明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八大上將的一封信：

鑒於當前事態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提出以下要求：人民軍隊屬於人民，不能同人民對立，

更不能鎮壓人民，絕對不能開槍，絕對不能造成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軍隊不要入城。

信是上午10點寫的。署名的有：張愛萍、葉飛、蕭克、楊得志、宋時輪、陳再道、李聚奎，（後來王平也簽名），共八位，都是上將。

據說，寫信的消息是張愛萍的女兒打電話告訴社科院一位研究員，這位研究員又打電話告訴本報一位老同志。這封信很快就在社會上傳開了。

晚上，許多同志，包括幾位老記者，都到夜班辦公室來找我，建議我們刊登這封信。我也很興奮，覺得這封信如能發表，影響非同小可，特別是對軍隊，因為這八位上將，解放戰爭期間，都是兵團級幹部，解放後，不是中央軍委三大總部負責人就是大軍區負責人，在部隊很有威信。為了慎重起見，我請總編室夜班的同志和一些與部隊有聯繫的老記者，幫助核對事實，徵求這些老將軍同意不同意在報上發表。經分別和這些老將軍的秘書聯繫，證實信是真的，至於公開發表，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這不好辦。我和大保（晚上只有他在辦公室）商量，給總參謀長遲浩田打電話，聽聽他的意見。遲浩田在粉碎「四人幫」後曾率工作組進駐報社，任副總編輯，是熟人。

遲浩田同志聽了電話，表示不能發表，但並不肯定，只是說「恐怕不好吧」，讓我慎重考慮。過了半個小時，他來電話，估計是請示了什麼人或者和什麼人商量了，

用很肯定的語氣說，「千萬不要發表，因為信是寫給領導的，不是供公開發表的」。

我們也覺得影響太大，署名的人意見不一致，以暫不發表為好。

匈牙利總理內梅特說《不准用軍隊解決內政問題》這則新聞，原來國防部放在國際版，我看大樣時，看到文裡有「斯大林模式的一個最可恨的特點就是肆意動用武裝力量整治本國人民。我們應該最堅決地同過去的這種做法決裂……」。這句話對我們很有現實意義，決定把這條新聞移到一版來。有些人看了可能會不高興。

許多同志對今天一版的《北京戒嚴第一天》都很感興趣，希望繼續寫下去。還是由一位記者寫出初稿，我和在場的同志（有些並不是夜班編輯）反覆修改後定稿，題目用《北京戒嚴第二天》，這樣便等於一個專欄，每天一篇。因為「第一天」說北京市民生活如常，今天接到許多電話，不同意這個說法。他們認為戒嚴對市民生活影響還是很大的，如交通不便，買不到牛奶等等。因此，在今天寫的「第二天」裡，除了反映群眾怕部隊進城造成流血事件的恐懼心理，設路障外，也有反映群眾感到生活不方便的內容，為的是更真實、更全面反映客觀實際。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2日凌晨4點30分訊國務院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生效已40多小時，在市政府規定的區域內，仍未見到異於往日的突發情況。



北京市民在進城的路上設了路障，堵截進城的軍隊，圖為市民和軍車上的士兵互相作出友好的手勢。

21日星期日，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首都的和外地趕來的大批大學生比肩靜坐。東西長安街上，人流夜以繼日；在不到百米的低空，數架軍用直升機往復掠過，不時撒下用大號字印的李鵬總理講話傳單，引起陣陣騷動。

戒嚴令發出以後，廣大市民擔心執行戒嚴令的解放軍進城後發生流血事件，夜間在通向郊區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設置道道障礙。城市公共汽車、電車已中斷兩天。地鐵停運。東西長安街等主要街道，群眾自動維護交通秩序，指揮過往的各種車輛和行

人。一些居民給報社打電話，抱怨看不到報紙，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種大型車輛及其他什物設起路障的許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壓壓的人群。

功過由歷史去評說

5月22日　星期一　陰間晴

北京、湖北、甘肅、內蒙古、貴州、廣東、吉林、雲南、鄭州、合肥、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學生繼續遊行，抗議北京戒嚴。北京知識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約四五千人，不顧戒嚴令上街遊行，呼籲「立即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恢復正常秩序」，「反對軍管」，「打倒李鵬反黨集團」等。外地遊行隊伍喊的口號，舉的標語，內容比較集中在「李鄧辭職」、「紫陽回來」上面。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今天凌晨二點，記者從天安門廣場來電話，說《新華社》四百多位編輯記者，以《新華社》社旗為先導，正繞著廣場遊行。他們舉的橫幅上寫著：「新華社無新聞」，「新華社以血抗暴」；喊的口號有「新華社站起來」等。遊行隊伍受到廣場上人們的熱烈歡迎。

駐美國和日本的記者也來電話反映留學生的情況。駐美國記者說，今天（21日），來自美國東部、中西部各州及加州的三十餘所大學的留學生四千多人，聚集在華盛頓杜邦廣場，中午時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留美學

者學生聯誼會聯合會」橫幅為先導，沿賓夕法尼亞大街向中國大使館前進。在使館門前，示威者高呼：「中國要民主！」「不准槍口對人民！」「順從民意，李鵬下台！」等口號，並散發《致萬里委員長》、《致全國同胞書》。記者說，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留美學人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台灣、香港留學生也參加了。

在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等二十多所大學的留學生，也於 21 日舉行集會遊行，聲援北京學生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愛國運動。

總編室資訊組接到農業部一個幹部的電話，說農業部接到北京市通知，每一個局抽一名身強力壯、立場堅定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組成糾察隊，任務是拆除路障，歡迎解放軍進城。據瞭解，北京市屬單位和國務院各部委都接到了這個通知。看來，解放軍是非進城不可的，一場流血衝突很難避免。

下午，老錢召集在家編委開會，商量《北京戒嚴第×天》問題。他說，《北京戒嚴第×天》很得到首都一些新聞單位負責人的讚揚，都說寫得很巧妙。接著他說，上面有人提出，能否停下來不辦？

老錢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原則性很強的領導幹部。對上面的指示，他分別不同情況、不同場合，有的說是某某人說的，有的則只籠統地說上面如何如何，有的他根本不說，只默默地照著辦。如現在新聞界傳說的 5 月 6 日趙紫陽對胡啟立、芮杏文的談話——「放開了一點，遊行作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戒严部队指挥部告北京市民书
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
希望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给予大力支持协助

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
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

北京市政府发言人答记者问

呼吁市民共同努力
维护公共交通秩序

北京戒严第二天

《人民日報》上《北京戒嚴第×天》的專欄

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他就沒有正式傳達，但他的確是照著做了。這一次，他沒有說「上面」是誰，但我理解「上面」決不是胡啟立、芮杏文，說不定他們已經靠邊站了。我想，不管這個「上面」是誰，既然是以商量的語氣提出問題，就可以力爭繼續辦下去。

在編委裡，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個才見報二次的欄目的創辦經過。我把出這個欄目的來龍去脈向大家介紹以後說，現在我們能夠向讀者反映一點真實情況的就只這個欄目了，而且從這兩天看，報社內外的反應都不錯。

有些人可能看著不順眼，但實際矛盾就這麼尖銳，一篇報導都得到所有的人認可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已走到了這一步，是功是過，只能由歷史去評說。反正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是我們照這樣走下去，只要趙紫陽不倒，是會平安無事的；如果趙紫陽保不住，我們即使馬上停下來，將來也會有人跟我們算賬的。我主張繼續辦下去的意思是很明白的。

大家都沒有意見。老錢最後說，他也覺得馬上停下來，可能會引起讀者的更大不滿。他同意繼續辦下去，但把關要嚴一些，不要給人以跟中央不一致的印象。他提出，從今天起由他來定稿。

根據下午編委會決定，晚上將《北京戒嚴第三天》清樣送請老錢審定。他只在第一段最後一句改動兩個字，即把「也有一些部隊向後撤退了」，改為「也有一些部隊向後移動了」。將「撤退」改為「移動」更切貼，更能反映事實本質，因為這些部隊並不是真的撤退，而只是由於被群眾阻攔不能前進才往後移動一下位置而已。

文如下：

【本報北京23日凌晨訊】在度過緊張不安的又一夜後，首都迎來了國務院下達戒嚴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內秩序基本恢復到三天前的狀態。執行戒嚴令的一些受阻解放軍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隊向後移動了。

記者昨天中午時分看到，東西長安街、天安門

廣場周圍以及城區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營業，道路交通順暢，但大部份公共電汽車和地鐵仍然沒有恢復運營，上下班的職工感受到不便。

在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儘管高校師生仍在靜坐請願，但圍觀群眾已比前幾日減少。

一些大學生配合環衛工人清除廣場和街道上的垃圾，噴灑消毒藥水，以防傳染病流傳。

天安門前仍有斷斷續續的遊行隊伍，22日下午打著『首都知識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橫幅的隊伍引人注目。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雖明顯減少，一群群的市民仍在守候著……

善良的人們，警惕啊！

5月23日　星期二　晴、大雨

記者從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獲悉，到目前為止，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院校有319所（指在指揮部登記的），遍佈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自治區。

總編室資訊組收到的兩則資訊很值得注意。

一則是石景山區人武部一位幹部來電話說，上午10點，65軍30多人乘一輛大轎車進城，車上軍人全部化裝成大學生，頭上戴絕食標誌，懷揣航太航空大學學生證，打著背包，手提包裡是衝鋒槍，部隊代號51056部隊一

分隊。這輛車行至石景山發電廠附近涼水塔旁邊時，被上千的市民和學生圍住。有些市民很氣憤，要打他們，學生勸說別打。群眾打碎了汽車擋風玻璃，放了輪胎的氣。車上軍人拒絕回答一切問題。

另一則資訊是商務印書館的一位同志來電話說，他們剛給北京市委打電話，詢問地鐵為什麼還不通？市委接電話的人答覆：學生還在地鐵裡，正在拆鐵軌，不讓通車。他們又問，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都不是這樣說的。市委一位女同志說：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都不代表黨中央的聲音，都是胡說八道，並說這不是她個人意見，而是市委的意見。

軍隊冒充絕食請願的大學生，市委編造謊言（關於地鐵），這說明什麼問題？正在醞釀一個大陰謀！善良的人們，警惕啊！

還有兩則反映民心的資訊。

一則也是石景山區人武部來電話，說是65軍近萬名官兵，乘400輛軍車進城，因遭到市民阻攔，便於昨晚十一點撤離石景山地區。數萬市民湧上街頭，夾道歡送。他們高呼「解放軍萬歲！」「祝子弟兵一路平安！」還放鞭炮禮花。解放軍官兵也高呼「人民萬歲！」「理解萬歲！」「大學生萬歲！」戰士和市民都流了眼淚！市民們最後喊：「歡迎解放軍再到北京來，但千萬不要帶武器來。」

一則資訊是中央電視台一位同志來電話，說21日晚

電視台收到四川省委直接電傳的一份新聞稿，是對國務院戒嚴令表態的。電文說：省委常委對北京的事態極為關注，認為應該按照趙紫陽同志說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八個字來處理。艾知生不讓播發，說「這倒是個重要情況」，把電傳稿拿走了。22日晚電視台播發的四川省那個表態稿是重新發來的。

下午，我一到辦公室，老錢便把在報館的編委找去，說上午李鵬找他單獨談話，希望轉變思想，希望報紙能夠配合。老錢表示在目前情況下，要編輯記者馬上轉變思想有困難。李鵬提出，王維澄（原李先念秘書，現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瞭解領導意圖，讓老錢有事找王維澄，王維澄也可以主動找老錢。李鵬或者是在座的什麼人提出，要報社每天給王維澄送大樣，主要是一版的。老錢表示有困難，要回來和編委商量。這時老錢問我們：萬一王維澄要求送大樣怎麼辦？我和余煥春都說，他要看大樣可以，但他必須簽字；他又要看大樣，又不簽字負責是不行的。

下午四點，新成立的宣傳協調五人小組組長王忍之（中宣部部長）電傳緊急通知，要求各報、電台有關戒嚴、學潮的報導必須與李鵬、楊尚昆5月19日講話一致。這是宣佈宣傳紀律！

現在很清楚了：胡啟立、芮杏文已不再管宣傳工作；新的五人小組沒有老錢。老錢已被劃到趙紫陽一邊。

四點半，正在開編前會，老錢通知，編委散會後到他

辦公室開會。

老錢說，剛才王忍之來電話通知：他們不看大樣，因為不願意簽字，但要求每天將一、二版的內容用電話報告王維澄。老錢告訴他，一個版一萬多字，如何用電話報告？他又要求只報告標題。上面對《人民日報》的控制比上午又進了一步，老錢覺得不好辦，和我們商量對策。

大家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見：

一、電話報告版面無法執行，只報告標題也不行，因為標題正確，見報以後他們認為內容有不妥之處，該誰負責？最切實可行的辦法是，我們每天給他們送八個版的大樣，他們簽字後我們付印。

二、以老錢個人名義提出，如果非要按照他們的要求辦不可，只好辭職，請求中央另派人來主持報社工作。

三、如果老錢辭職獲准，其他編委立即集體辭職。

老錢辭職報告晚八點半前送達中央。

北京戒嚴以後，我們編委決定每天晚上碰一次頭，就一些重要情況交換意見。今晚十點半，在編委碰頭會上，老錢說，他的辭職報告已有反響。袁木從李鵬辦公室給他打電話說，李鵬指示，不要求報社每天向王維澄報告一二版版面（包括標題）；也不要送大樣，錢李仁也不要辭職，有事可以與王維澄聯繫。王維澄為中央聯絡員，李鵬有什麼指示，由王維澄向錢傳達，錢有什麼事要向中央請示，由王維澄轉達。

老錢說，李鵬對他辭職的事很生氣，說：「《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的事已經引起學生的強烈不滿，你現在要辭職，後果是什麼你想過嗎？」

第一回合的鬥爭暫告結束。

《北京戒嚴第四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4日凌晨訊】昨天上午，街頭隆隆奔馳的公共汽車，給首都市民帶來了欣慰的笑容。戒嚴令發佈第四天，北京的社會秩序繼續向穩定方向發展，絕大多數市民沉著冷靜，生活日趨正常。

昨日起，首都已有100多路公共電汽車恢復運營，停駛三天多的地鐵也於上午10時38分開出了第一趟列車。在學生和市民的疏導下，全市街道基本暢通，職工上下班大多轉入正常，運送煤炭、液化石油氣及肉蛋菜奶的車輛受到格外的關照。

天安門廣場上，沉睡了一夜的請願學生黎明即起，灑掃周圍場地。在高聲播送的國歌聲中，一些同學向冉冉升起的國旗行注目禮。請願學生廣播，同意撤出停在廣場上的公共汽車（原來供絕食學生用），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營運。

下午，長安街上出現了數以萬計的遊行隊伍。遊行隊伍裡，有人認出了一些知名人士。在黑雲壓城、雷電交加的大雨中，市民紛紛給遊行隊伍送來各式雨具。

雨後的天安門廣場，氣溫驟降，大批寒衣和薑

糖水送到學生手中。某中央機關捐贈的4000件衣服，不到晚上9點已分發到學生手中。

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報導，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大都停在城外原地。

入夜，街頭仍有許多關切事態發展的市民難以入睡……

出現偽中央怎麼辦？

5月24日星期三晴

戒嚴已五天，調進北京的部隊受阻仍未能進城。

北京仍有零星的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北京市民組成數十支工人、市民敢死隊，聲稱如果李鵬不顧民意，就要血戰到底。學生和市民召開「保衛首都誓師大會」。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也宣告成立，發表時局聲明，提出最低綱領：取消戒嚴，撤回軍隊，召開兩會，罷免李鵬；最高綱領：推進民主，爭取人權、自由。他們說，幾千年來，人民的鬥爭都是為溫飽，這次四月運動是高層次的，劃時代的。他們要公開站出來，不怕當「長鬍子的」，不怕被說成「非法組織」。

武漢、上海、昆明、西安、四川等省市的學生繼續上街遊行或集會，反對北京戒嚴，高呼「李鵬下台！」「不要垂簾聽政」等口號。上海華東師大學生召開全校黨員大會，發表聲明說，「以李鵬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已經喪失了對黨心、民心的感應能力和判斷能力……」

記者報告在豐台地區發生兩件事。一是昨天防暴警察打傷四十多名學生，在旁的解放軍戰士很氣憤，說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另一件是昨晚八點，從山西來的一百多輛滿載部隊的軍車到達豐台一帶後，向群眾打聽進城路線。群眾將他們引到豐台東面的一個三角地帶，然後給他們送水和食品，並告訴他們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今天早晨，北京的大學生趕到現場，給他們介紹北京學生運動的實況，許多官兵聽了都流下眼淚。他們說，來的時候，領導對他們說，要到北京拍電影！

以王忍之為首的五人新聞宣傳指導小組開會。聽老錢介紹，總的調子是要求新聞媒體配合，氣很粗，但很虛弱。比如說，他們要求新聞單位與中央保持一致，有人以反映群眾意見形式問道：現在到底誰代表中央？如果出現偽中央怎麼辦？他們都無言以對。

從思維到做法，都是「文革」那一套。比如，王忍之說，群眾遊行時高呼「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就說明不是一般的要民主，而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就是「四項基本原則」，這不就是「朕即國家」封建專制那一套嗎？

不過，他們要進一步控制報紙的意圖是很明顯的。今晚王維澄給老錢打電話，提出「北京戒嚴第×天」能否不要？老錢給他頂回去了。

各省市、各大軍區、各兵種表態的電報已發三天，北京軍區未公開表態，引起人們關注。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遲遲不能進城，固然與群眾阻攔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軍內意見不一致。張愛萍、楊得志等八位上將的信是一個信號，北京軍區未表態是否也是一個信號？社會上流傳38軍軍長拒絕派部隊進京，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從全國各地調那麼多軍隊進京，固然有對付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的一面，是否也有對付北京軍區的另一面？

凌晨四點，一版未最後付印之前，駐美國記者倉立德從華盛頓來電話，並指定要我接。他說，萬里同志決定立即回國，要在報上發新聞，明天（24日）見報。內容簡明：萬里委員長因健康原因，決定提前結束對美正式訪問，決定今天下午（華盛頓時間）乘機回國。倉立德說，這是代表團的一致決定。萬里正在與布殊會談，會談一結束即乘機回國。

萬里回來是廣大群眾翹首以待的。這兩天廣泛流傳外交部先後給萬里去兩次電報的傳聞。一次是趙紫陽叫打的，要萬里提前回國，主持人大常委會議；另一次是李鵬叫打的，要萬里暫時不要回國，結束美國訪問以後，可以到歐洲一些國家遊覽休息。如果這兩則傳聞不虛，那麼萬里這次提前回國，是聽從趙紫陽的召喚了。從他迄今為止的在外的發言看，這是完全可能的。但願他不負眾望，回來後推動局勢向好的方面轉變。

《北京戒嚴第五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5日凌晨2時訊170多條線路公共電汽車通車了，環城地鐵運營了，交通警上崗了，全市交通網絡基本暢通。儘管生活秩序趨於正常，人們對時局的關注有增無減。

繼23日淒風苦雨後，北京昨天烈日當空。天安門廣場上廣大櫛風沐雨的學生的健康狀況受到北京市民關懷。23日傍晚出現的為請願學生送衣服、食品、藥物的人流，一直持續到24日清晨。前些天為救護絕食同學忙得一刻不停的醫務人員，現在正忙著噴灑消毒藥水，以防疾病蔓延。大學生則組織慰問團，向醫務人員表示感謝。

長安街頭及廣場周圍，仍有零星遊行隊伍出現。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路口，入夜仍聚集著很多市民。

據昨天的《北京晚報》報導，目前靜坐請願學生的健康狀況趨向好轉，外地來京學生病倒者增多，被阻於城外的戒嚴部隊戰士身體抵抗力急劇下降。

據北京車站有關人員介紹，外地學生每天進出人數大體相當。

楊尚昆講中央的分歧

5月25日星期四晴

資訊組接到記者電話，說昨天晚上6點，河南省委收

到密電：有的地方人大代表正在簽名，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要求省委勸阻簽名，因為現在開人大緊急會議的時機尚未成熟。

吉林省委也收到同樣內容的密電。

把這條資訊和萬里提前回國的事情聯繫起來看，很清楚，萬里的決定決非現在中央主事者的意見。現在的主事者對萬里的回來採取這種防範措施，透露出他們的恐懼。

下午三點，中央辦公廳通知老錢去中南海開會。晚上九點半，老錢向編委傳達。他說會議是喬石主持的，內容是李鵬、楊尚昆、喬石跟黨員副委員長談話，也就是通報趙紫陽的「錯誤」。

他們的談話雖然沒有使用外間傳聞的「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叛亂」這些詞，但說明這次學潮是趙紫陽挑起來的，是趙紫陽的智囊人物指揮或策劃的，趙紫陽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公開黨內分歧，分裂黨，把矛頭引向鄧小平等罪名，是很清楚的。但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歪曲事實，無限上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反正對方已被打倒，沒有發言權，沒有辯誣的機會。成為王敗則寇，這是幾千年中國歷史的傳統，也是我們黨內鬥爭的傳統。

譬如說，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講鄧小平是我國黨內外公認的領袖，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大事件仍需請示他，這次被說成趙向群眾



趙紫陽（左）與戈爾巴喬夫（右）會談的內容，被保守派加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

拋出鄧小平，第二天群眾遊行就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云云。稍為關心中國情況的人都知道，除了十三屆一中全會決議外，其他說法，如領袖、總設計師等，在胡耀邦同志任總書記時，就公開說老祖宗主導十三屆一中全會決議，從對外來說，為的是向全世界說明，為什麼一個既非中央政治局委員，也非中央委員的鄧小平代表中國黨同蘇共第一把手舉行最高級會談，宣佈兩黨關係正常化。從對內來說，也是針對黨內一些同志批評鄧不遵守黨章，干預政治局工作而發的，為的是解脫鄧。至於群眾遊行喊打倒鄧的口號，早在4月27日，即傳達鄧4月25日談話以後就出現了。這是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積極向學校傳達鄧的講話，企圖用鄧的講話來壓服群

眾的意想不到的結果。這與趙和戈的談話有什麼關係？

這次沒讓往下傳達的涉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見分歧的有李鵬、喬石和楊尚昆的講話，其中以楊講得最有條理。下面是我紀錄的要點：

學生的口號從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慢慢發展到打倒腐敗政府、官僚主義，以至發展到打倒鄧小平，黨內老同志李先念、彭真、陳雲等，都認為性質變了，決定寫「四·二六」社論。小平同志講話和「四·二六」社論都報告了趙紫陽（當時他在朝鮮訪問），他同意。但他回來第一天，就提出社論調子高了，要改。為了團結，大家說服他。5月3日大會堂紀念「五·四」70周年講話，李鵬、姚依林、喬石、李錫銘都要求加上「反自由化」內容，他都拒絕；李鵬把改寫的文字交給我，我轉給他，他都不同意。特別是「五·四」亞行講話，小平知道情況不好，即同李先念、陳雲、彭真商量，後來在那裡開一個會，紫陽也到了，我也是列席者之一，萬里已出國。小平就提出一個問題：退（指從『四·二六』社論後退）還是不退？退，退到那裡去？我當時說，這是個水壩的最後一道大堤，再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說，我知道你們當中有爭論，今天不討論爭論，只討論退還是不退。小平說，不能退。問題就出在黨內。要戒嚴，有一部份老同志早就提出這個問題，我也認為不能退。趙紫陽也講了話。他說，



楊尚昆(左)的態度，對鄧小平所作的決定無疑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這個方針（戒嚴）我執行不了，我有困難。小平說，少數服從多數。紫陽說，黨內是有這個原則，他表示服從多數。

當晚八點開常委會，佈置執行戒嚴。紫陽說，我的任務到今天結束，我不能再幹下去了。我的意見與你們大多數的不一樣，如何執行呢？我辭職。大家說，你不能再說辭職了。在小平那裡，你說少數服從多數。我說，紫陽的態度不對。現在，維護團結，不能甩手不幹。他說身體不好。會後，他給小平和常委寫信，說你那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我批評他說，你有五個不好交代：怎樣向人民交代？怎樣向全黨交代？怎樣向中央委員會交代？怎樣向政

治局交代？怎樣向常委交代？你口口聲聲要維護小平同志，小平說少數服從多數，你到底是維護還是反對？他表示辭職信不寫了，但仍保留意見，說實在執行不了。他要我給小平同志捎信，說「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我說，這話我不能捎。他說他有病，頭暈。他確實有病，醫生說他有心臟病。

彭真、陳雲、李先念、王震後來都知道這個消息。他們說，這個問題要到小平那裡去解決。那一天，小平找彭真、陳雲、李先念、王震、我和常委幾位、軍委幾個人開會，趙紫陽請病假。會上，陳、李、彭都說，太不像話了！他們還說，問題出在黨內，如黨內一致，問題不至鬧到這個地步。臥軌、打砸搶，不是動亂是什麼？我們行動都不方便。先解決北京問題，全國問題好解決。

決定戒嚴以後，軍隊來得匆忙些。原定21日開始戒嚴，後來提前一天，從20日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信公司經濟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個單位，冒充《人民日報》發號外，透露紫陽講話，說趙的五條都被否定了。沒有那麼回事。（！！！）這四個單位給27軍打電話，講的是號外內容。（陸按：不是四個單位冒充《人民日報》發號外，而是四個單位將趙的五條內容用傳單方式在天安門廣場散發，《人民日報》個別工作人員盜用報社名義印成《人民日報》號外散發。《人民日報》第



鄧小平(左)與陳雲、李先念等「超級老人」，主導了中南海的運作。

二天就發表聲明，說《人民日報》近幾年來從未印發過任何內容的號外。）先念講，現在有兩個司令部，究竟是什麼司令部在指揮？這裡開會保不了密，人大開會也不能保密。（喬石：人大副委員長開碰頭會，第二天傳單就把內容傳出去了。到底什麼原因，不清楚。）

（陸按：「兩個司令部」，「文革」那一套復活了！）

在大家看來，紫陽是改革派，實際上，基本是執行小平的方案。亂子是他當總理時出的。小平說，三年以後都明白了，五年以前就出現了。（姚依林：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作檢討那部份，在紫陽那裡通不過。他修改了，都歸到李鵬頭上。）（李鵬：他不承認問題是多年積累的。因此我說：人大常委這個會——擬定6月下旬開的，不能開。）

《北京戒嚴第六天》文如下：

【本報5月26日凌晨訊】昨天，北京烈日當空。下午起，東西長安街和廣場周圍的遊行隊伍一時不見頭尾。從橫幅看，有來自科研、教育、衛生、文化、新聞等單位和部份工廠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學生。長安街交通一度中斷。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農貿市場，糧菜肉蛋等生活必須口充足，貨架攤床琳琅滿目。據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報導，全市工業系統的職工出勤率已達80%左右，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穩定，中小學校書聲琅琅。

萬里被「安排」在上海「治病」

5月26日　星期五　晴

昨晚《新華社》發消息，說萬里抵達上海，因身體不適留滬治療。夜班編輯議論紛紛，都感到意外。大家從他在加拿大和美國發表的談話看，他是同情學生運動的，都以為他是趙紫陽的要求而提前回國的。如果這個判斷不錯，則他應直接飛北京。北京曾傳說有些大學生準備到機場路列隊歡迎他呢。現在卻在上海停留「治療」。據看過電視的人說，他在上海下飛機時的身體，看去並無什麼大病。看來，所謂留滬治療，不知治的是生理病，還是政治病？是他自願留滬治療，還是被別人安排留滬治療？大家一致認定是後者。這次學生運動的前景又增

加了一層暗影。

下午，按照編委昨晚分工，向總編室、國際部、記者部、經濟部、新聞戰線、市場報、新聞系的正副主任傳達昨晚老錢傳達的內容。大家聽得很認真。傳達完了，大家沉默不言。後來有人問要不要討論？我說不用。其實用不著討論，大家的意見我也很清楚。要真讓他們敞開討論，還不知說出什麼話來呢！



人大委員長萬里的回國家眾所期待的

晚上看今天到達的香港報紙。香港時報在關於所謂趙紫陽反黨集團的報導中，把錢李仁同志也列進去了。老錢看了一笑了之。後來，他說，把敝人名字和總書記的列在一起，光榮之至！

《北京戒嚴第七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7日凌晨訊】昨日北京全城氣氛平靜。

街上沒有出現遊行隊伍。在最高達36度的酷熱氣溫下，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紛紛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裡。前些時候提供給絕食學生避雨

的一百多輛大客車，到下午只剩一輛停在廣場，其餘全部開走投入運營。

北京火車站前，大量外地進京學生排隊等待返回，新來的學生已經不多了。車站一位負責人說，他們已準備了一些專列或車廂，供疏散返回各地的學生們使用。

來自部份大學的消息表明，不少連日請願疲憊不堪的學生已返回學校，其中也有人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廣場。

旅遊部門人士稱，近日來京旅遊團組和探親台胞人數銳減，一些旅遊飯店經理抱怨生意清淡。

尚在城外整休待命的戒嚴部隊，開始接待各級政府組織的慰問隊伍。有些官兵還與當地居民聯歡。據《新華社》記者在一篇報導中反映，駐在大興縣的戒嚴部隊正逐步為群眾理解，一位軍官說，他們想以嚴整的軍容軍姿出現在首都人民面前。

北京各界聯席會議的十點聲明

5月27日　星期六　晴

記者從天安門廣場來電話說，學生們得悉28日世界各地華人將舉行全球大示威，各地高校代表會議的一些代表提出，要抓住這個契機，在國內組織聲勢浩大的遊行，進行勝利大撤退。遊行之後怎麼辦？有人建議採取空校政策，於6月23日人大常委開會前返校，組織起來到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請願。空校政策遭到大多數人反對。



一位老人訓斥守衛在新華門外的軍人

據軍內幹部傳達，進京部隊要在北京地區較長時間住下去。「撤」是為了「進」，為了更好更快地進。進的方式是先組成工作隊，深入廠礦、單位、家庭，做群眾工作，逐步推進。軍隊進京的真正意圖主要是針對學生運動引起的「動亂」。

今天是「四·二七」和平請願大遊行一周月。在天安門廣場的北京「高自聯」、「外高聯」、「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知識界聯合會」、「工自聯」、「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糾察隊」、「北京市民敢死隊」等發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說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眾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超出『四五』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

之處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依、根本不依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民主運動。

聲明說，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的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億萬人民痛恨的『官倒』等現象。」因此，「這次運動才能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至全世界人民群眾如此廣泛而強烈的回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展成如此浩大的全國愛國民主運動。」

聲明說，對於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

聲明批評李鵬、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完全無視人民群眾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否定及反對甚至鎮壓的態度。「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的腐敗以及官倒現象，無疑有重大責任。但是在訪朝歸來時，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這場民主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創造了一條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及條理性。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響，也使人

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希望事態在趙發表講話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聲明說，「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立的目標。我們重申近期的具體目標如下：第一，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第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二〇』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他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第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免李鵬的呼籲……」。

聲明警告一些政治領導人：「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著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聲明最後向全國人民建議，將「四・二七」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資訊組獲悉：清華大學於昨天在海淀區、豐台區、西城區、東城區、宣武區搞了一個民意測驗，收回問卷235份，其中工人71人，農民27人，機關幹部23人，學生41人，市民27人，個體戶3人，待業青年2人，軍官3人，退休人員1人。結果是：反對戒嚴的93.6%；認為軍隊不應進城的93.6%；認為治安沒變壞的88.5%；認為不需軍隊維持秩序的96%；認為學生不應撤（出廣場）的70.2%；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的98.7%；認

為學生在廣場靜坐是對的並且對市民生活影響不大或沒有影響的94.9%；認為「動盪」責任在政府的94.5%；贊成學生繼續在廣場的96.6%；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的91.1%；認為鄧小平是偉大的改革家的111人（不到50%），其他人答不知道或不回答；認為鄧小平應退下來的94%；認為官方報導一般的23人，不滿意的192人，共佔91.5%；答共產黨主流是好的41.3%，不好的24.7%，不知道的24.7%。

下午去協和醫院作定期體檢。文化界、新聞界的副部級幹部幾乎都來了。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協和的醫務人員，這些平時被視為不關心政治的人，對學生的同情，對黨和政府和不滿情緒，已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他們知道我們是《人民日報》的更是高聲縱論，其思想之激進並不亞於報社的年青人。

這是對清華大學的民意測驗結果的一個佐證。

有人說，共產黨每搞一次反右運動，它及其領袖的威信就降低一次。這次民意測驗又一次證明了此論不妄。

《北京戒嚴第八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8日凌晨訊】北京又在平靜的氣氛中度過戒嚴後的第八天。

昨日停立街頭，只見行人神色安詳，市區秩序井然。戒嚴，似乎不再是市民們最激烈的話題了。

世人矚目的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的學生在烈日下支撐。是繼續靜坐還是撤離回校，學生們意見

不一。學生的指揮中心已就此問題反覆徵求廣場上各高校代表的意見，據說將付諸投票表決。

據《北京日報》昨天報導，在一批批外地學生離京的同時，一隊隊外地學生還在湧入北京，他們的生活目前遇到很大困難。為學生送飲食的人少於前些天。

入夜，城區一些主要街口，仍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議論時局是他們的主要話題。

于光遠：五四以來最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

5月29日星期一晴

昨晚上班與老錢交換情況。他說，看來還是軍隊內部互鬥。他左右手握著拳頭，作互鬥狀。

昨天，首都以大學生為主的知識界大遊行。這次遊行是回應海外華人發起的全球華人大遊行的倡議而舉行的。上海、南京、天津、武漢、哈爾濱、成都、杭州、西安等城市也有規模不等的大學生同時舉行這次遊行。呼喊口號最多的還是「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等。

有消息說，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可能不久就撤回學校，學潮將進入低潮。但這次學潮的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于光遠同志在給報社寫的一篇文章裡說，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最偉大的。

它在中國歷史上，在人類歷史上，已創造了好幾個新紀錄：

全球華人大遊行；

全世界中國留學生大遊行，發表聲明回應；

香港百萬人遊行示威；

學潮前後持續一個半月，遍及全國各省市，學生進駐天安門廣場達半月之久；

三千人宣佈絕食請願；

各界人士，各民主黨派，工青婦領導機關普遍支持和同情；

北京全市人民齊心協力阻攔部隊進城執行戒嚴任務；

宣佈戒嚴後，群眾遊行示威不斷，甚至在新華門靜坐示威，高呼最得勢的大人物下台的口號更響更集中；

至於要求現代民主、法制的思想影響之深，群眾思想覺悟之高，更是不可低估的。

這幾天也有另一些情況值得重視，就是繼各省市、各軍區、兵種致電擁護黨中央、國務院戒嚴等措施後，中顧委常委、中紀委常委、全國政協常委都分別開會，表示一致擁護。陳雲和李先念在講話中，一再使用「極少數極少數」這個詞（以前只說「極少數」）。但他們都迴避了一個極簡單的問題：既然別有用心的人只是「極少數極少數」，為什麼要從全國調動那麼多軍隊進京？這不是比「殺雞焉用殺牛刀」更令人不可理解嗎？

萬里在上海經過兩天的「治療」，發表了一篇與在國

外發表談話的調子完全不同的聲明，是完全擁護鄧小平和李鵬的，也用了「極少數極少數」這個詞，與陳雲、李先念的講話何其相似乃爾？

《北京戒嚴第九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29日凌晨訊】昨天是星期天，市民們似乎已經失去剛公佈戒嚴令時的那種疑慮感，大小商店又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下午2時許，以高校學生為主體的遊行隊伍口號聲聲，通過長安街繞行天安門廣場。這一帶交通短時間內受阻。據遊行隊伍的廣播車宣稱，這次遊行是對海外華人發起的一次活動的響應。

天安門廣場傳出的消息說，儘管各地捐贈的一批新帳篷剛剛支起，學生們仍有可能近日內撤走。

入夜，暑氣不退。各路口成了市民們納涼、聚談的場所。對北京人來說，歌星演唱會和高水準球賽吸引力似乎已不像已往那樣大了。仍然駐紮城外的戒嚴部隊，不斷接待被派去的慰問團。一些文藝工作者的演出，在官兵中博得陣陣喝采聲。

有把達摩克利斯劍在我們頭上晃

5月30日　星期二　晴

昨晚王維澄給老錢打電話，傳達上面指示，叫轉載星期日《北京日報》一封七位中年知識份子的來信，並配

一篇評論。老錢與值班的李仁臣商量，先擬一個編者按，上面不同意，一定要寫評論。沒法子，只好寫成一篇評論員文章《以全國人民利益為重》。不過，這封來信還是比較中性的，沒有出現「動亂」二字，對政府對群眾兩面都講，當然重點是勸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復課。一般群眾，包括高校學生還可以接受。我們的評論也沒有用「動亂」二字，因此也沒有跟「不與人民對立」的原則相悖。這恐怕是上面不大高興的。

老錢說，現在有把達摩克利斯劍在我們頭上幌，隨時都有可能砍下來。在不與人民對立，不讓抓辮子的前提下，盡量推遲達摩克利斯砍下來的時間，是很必要的。我同意這個原則。鑒於北京戒嚴地區社會秩序漸趨正常，每天寫一篇《北京戒嚴第×天》相當吃力，如這兩天的文章，有的材料就取自北京晚報，有的取自《新華社》的報導。經與老錢和大余商量，決定今天發《北京戒嚴第十天》後即結束，以後有值得寫的材料時，以別的形式報導。

這個專欄是北京宣佈戒嚴後第一天開始與讀者見面的。這是新聞不自由環境下，設法向讀者透露一點真實情況的產物。創辦頭二天，曾在國內同行中引起震動，並獲得讚揚。接著各報和《新華社》也用類似形式介紹戒嚴後北京的一些情況。大家都這麼做了，原來有點特色的專欄也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被譽為反映中央意圖的《北京日報》和《解放軍

報》，連續發表一些「讀者之聲」的來信。這些來信有個共同點，就是都不署真名，沒有具體位址，沒有具體工作單位。這真是個絕妙的主意，愛怎麼樣寫就怎麼樣寫，需要什麼輿論就泡制什麼輿論，自由得很！誰說中國沒有新聞自由？但這也是主其事者心虛，知道製造的輿論很不得人心的反映。

今天報紙頭條新聞《受中共中央委託，彭真邀請黨外副委員長座談》，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新聞。所以有意思，一是彭真在人大，連人大常委委員也不是，在黨內，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為什麼由他出面邀請黨外副委員長座談？萬里不在北京，難道其他黨員副委員長也統統不在北京？是他們的資望不敵彭真呢，還是他們不像彭真那樣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方針？二是彭真說，誰反對共產黨提名、經人大批准任命的國家領導人，誰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按照這個邏輯，豈不是凡是依法產生的領導人都是不能反對的？即使是非暴力的。在封建專制時代，只有皇帝老子一人是「朕即國家」，在社會主義的中國，豈不是有許許多多的官員都成了「朕即國家」了嗎？三、彭真的調子和陳雲、李先念的一樣，使用「極少數極少數」一詞，但從新聞報導看，黨外副委員長們並沒有跟著他的節拍唱，他們在發言中，沒有人用「動亂」一詞。

《北京戒嚴第十天》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30日凌晨訊】昨天是北京部份地區宣

佈戒嚴的第十天。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較平靜，長安街上沒有出現遊行隊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門廣場上靜坐請願學生卻未見撤走的跡象，還新搭了一批旅遊帳篷，並正在安裝一座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份清潔工人清洗掉了貼在燈杆、牆角的傳單，而另一些街道上，又有些新貼的傳單，圍觀、議論者仍時有所見。

鑒於北京宣佈戒嚴地區的社會秩序已日益正常，本報《北京戒嚴第×天》專欄，已無每天出現的必要。今後有關新聞，將隨時用別的報導方式向讀者介紹。

「民主之神」宣言

5月31日　星期三　晴

昨天，一尊高達7米的「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北側安裝完畢，吸引著數以萬計圍觀者。塑像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二十多位師生精心製作的。塑像揭幕時，高自聯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說這尊塑像是他們「奉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援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的」。宣言說，「民主之神，你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堅信真正的民主到來之



「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北側樹立起來

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久的民主之神」。

《新華社》報導，這尊塑像的出現，引起了一位不署名的據說是「某設計院」的中年女知識份子的憤慨，要求北京市政府採取措施制止。她說，「『六一』兒童節時

眾多的兒童即將來天安門瞻仰英雄紀念碑，為了不讓兒童的心靈受到不健康的影響，我強烈要求市有關部門盡快解決這一問題」。這位女中年知識份子根本沒有弄清是什麼塑像，把「民主之神」說成「民主女神」，這且不說她。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為什麼兒童們看見了一尊「民主之神」的塑像就是心靈「受到不健康的影響」？難道說，民主之神、爭民主、要求民主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就是人們說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民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昨晚，編委碰頭會上，老錢介紹了他與王維澄談話的情況。王維澄對19日以後的報紙有二點意見：一是標題不鮮明，有的副題只講一面內容，而不講另一面內容，意思是我們偏向學生一面；二是評論跟不上。

王維澄的意見，也是上面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早就估計到。我們至今未在自己組織的文章和標題裡出現「動亂」二字。昨天和今天都根據上面指示寫了評論，但都用中性語言，都未提「動亂」。上面的不滿，是意料中事。

另外，王維澄特別提到5月5日報紙對趙紫陽「五·四」講話的處理和當天群眾的反應，說是太突出了。老錢對他說，這是當時我們的認識。我們認為趙紫陽那個講話能解決問題，比較符合實際，並且很快受到學生歡迎。老錢講的是實話，也是編委一致的意見，到現在我們也沒有想改變這個認識。今天的評論員文章《用民主

手段推進民主建設》的末段，對同學們不是還提出「通過正常民主手段，循著法制軌道，來推進民主建設」嗎？這不就是趙紫陽在講話中提出的「民主、秩序、法制」嗎？

現在，從上到下，說假話成風。北京市委向縣局級幹部傳達說趙紫陽反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張私有化股份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趙紫陽關於經濟改革的言論，白紙黑字，中外皆知，不是什麼人可以隨便歪曲篡改的。但有些人竟這麼做，只能說明他們的虛弱。

昨天的報紙已宣佈《北京戒嚴第×天》專欄結束，但今天讀者不斷來電話要求繼續辦下去。他們說，他們每天看報就是看這幾百字。為了滿足讀者要求，凌晨趕寫一篇《5月30日：天安門廣場即景》，風格與《北京戒嚴第×天》一模一樣。為了避免上面找老錢麻煩，今天的這則短文沒有送請他審定。文如下：

【本報北京5月31日凌晨訊】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多名師生集體創作的『民主之神』雕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吸引著數以萬計的圍觀者。這個未經批准搭設『民主之神』的舉措，也引起了天安門管理處和國家機關某委設計院一位女中年知識份子的異議。

儘管北京市政府第二、第三號戒嚴令中，對中外記者採訪有嚴格限制，在紀念碑第三層台基上，外國和港澳台記者的數架攝影機仍然支在那裡。

王忍之要求增加反對愛國民主運動的聲音

6月1日　星期四　晴

昨天下午，去國務院第三會議室開會。這是新的五人宣傳指導小組召集的首都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王忍之主持。這個會本來是通知老錢參加的，臨開會前一個多小時，中直工委召集中直各部部長開會，要老錢參加，才決定我參加宣傳小組召集的會議。

會議原議程是回顧總結近十天來新聞報導、報紙版面，研究下一步如何辦。會議一開始，主持人宣讀李鵬5月27日對在京中顧委委員的講話。這個講話，同5月22日李鵬、楊尚昆、喬石對黨員副委員長的講話基本相同。只有一點是新的：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胡啟立都講這次學生運動得到廣大的市民、工人、幹部的同情，趙紫陽說，連他的警衛員都同情學生，故他認為「四．二六」社論對這次學潮的定性是不對的。

會議轉入正題以後，沉默了好一陣沒人發言。王忍之指定《北京日報》的劉虎山先講。劉說，《北京日報》每天都是在市委的具體領導下安排版面的，現在最大的困難是報社編輯、記者不願寫稿。《中國日報》的陳礫說，5月28日全世界華人大遊行，對這樣一件全世界都知道、都關注的大事，作為對外宣傳的《中國日報》，一點沒有反映，報紙的威望很受影響。他也講稿源有困難。《光明日報》、《經濟日報》的同志相繼發言，調子都差不多，都強調內部思想轉不過彎來，跟領導採取不合作態

度。《經濟日報》的范敬宜說，他們今天發了一篇評論，按照李鵬講話調子給學生運動定性，報社有人貼大字報批評他「出賣靈魂」，「出賣良心」。但他還是慷慨呼籲：同志們，現在是趕快轉變立場，緊跟中央部署的時候了。

王忍之讓我發言。我感到在這種人召集的會議上講真話不行，講假話又不願意，便以臨時來參加沒有準備為藉口推掉了。接下來讓《新華社》穆青發言，他見我不發言也過了關，也表示沒有什麼意見好講的。只有廣電部的艾知生最積極。他發言給人的印象是他是緊跟中央的，對下面有抵觸情緒的幹部，如薛飛等，堅決嚴肅處理，讓他們停職檢查……這使我想起5月19日中央電視台一位同志給報社的電話，說艾知生18日從中南海開會回來時對電視台的人講的話。他說，這幾天，社會上有大動亂，我們電視台有小動亂；你們不要以為我要下台了。告訴你們，鄧小平、李鵬下不了台，我艾知生就下不了台！

王忍之最後講話，要求各報繼續總結，迅速增加自己的新聞、評論、文章，反映工、農、知識界擁護中央決策，反對學生運動的聲音，要求學生復課、恢復天安門廣場原來面貌的群眾意見。

現在唯心主義盛行。中央美術學院一些師生在天安門廣場放置一座「民主之神」塑像，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今天凌晨下班後去天安門廣場看了看，這座塑像不過如

過去「五一」、「十一」群眾遊行時台的模型一般，放置在美院學生聚集的地方，塑像架子下面是空的，可以存放東西，也可以坐人休息。主事的領導者，包括宣傳指導小組的諸公，根本不去看一看，也不作調查到底是怎麼回事，便組織報導，發表談話，寫文章，加以討伐，說什麼任何人不得隨便在天安門廣場搞違章建設，不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天安門廣場建立永久性紀念物。這簡直是現代唐吉訶德，令人啼笑皆非。

現在瞪著眼睛說假話的何止這一件呢？連一些頗有點名氣的人大黨委，明明簽了名，或委託別人代簽了名，建議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當前局勢，現在看風向變了，便要賴賬，說是有人「別有用心」強加給他的云云。好了，曾登載這資訊的香港《文匯報》和主其事的四通社會研究所都發表了聲明，介紹事情經過，把這些人的政治良心亮在太陽底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嚴正聲明》見文後）

在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記者告：昨天上午九點，約有三四千大學生從歷史博物館出發遊行。他們先繞廣場一周，高呼「愛國無罪」、「反對暴力」、「還我同胞」等口號。他們走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釋放被抓走的工人自治會三位負責人，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圍觀群眾很多。北京市公安局答應6月1日上午10點答覆學生要求。遊行隊伍又到北京市政府，高呼「李鵬下台」、「陳希同下台」、李錫銘下台「等口號。遊行隊伍在回天

安門廣場途中，在公安部門前也呼這些口號。據說，今天上午三位工人自治會負責人已獲釋。

附：《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嚴正聲明》

從5月30日廣播和電視中獲悉，6名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就部份常委委員呼籲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一事，發表聲明「闢謠」，其中有的人大黨委委員還要追究四通社會研究所的責任。為此，我們發表嚴正聲明如下：

一、今年四、五月以來國內局勢日益嚴重，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籲全國人大發揮憲法所賦予它的應有作用。5月17日盧嘉錫代表農工民主黨中央發出緊急呼籲，建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5月18日全國總工會發表五點聲明，其中第二點也提出提前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5月18日張友漁等九位法學家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5月21日楊振寧、李遠哲等著名海外華人學者致電鄧主席望立即召開全國人大。不少人大常委委員也深感自身的責任。5月17日，厲以寧、江平等24位常委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5月18日，葉篤正、馮之浚等12位常委也發出「建議從速召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來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的呼籲。

我們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在此局勢嚴重之時，召開緊急會議，是完全符合憲法原則的，也是「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必要措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作為一家民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以建設社會主義議會民主為重點研究課題和長遠奮鬥目標，衷心希望全國人大這一「橡皮圖章」逐漸變硬。同時作為共和國的公民，也有權利通過自己的代表來反映自己的意願。因此，我們做了一點「院外活動」：向更多的常委收集是否同意召開緊急會議的資訊。這一行動受到胡績偉委員的明確支持，他表示願以他的名義委託我們向其他委員徵詢意見，並向外省的常委發了加急電報。這一工作自5月21日晚開始，24日我們將關於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信件及收集常委意見的材料交給了胡績偉。胡績偉又給萬里委員長、習仲勳和彭沖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我們於當天下午一時半將上述材料送至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收發室。

二、截止5月24日，主張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常委委員共計57人，達到常委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

在《人民日報》、《科技日報》公開發表呼籲的27人：葉篤正、馮之浚、江平、許嘉璐、吳大琨、陳舜禮、林蘭英、楊紀珂、陶大鏞、胡代光、

彭清源、楚莊、楊海波、王潤生、楊立功、朱德熙、董輔仁、郝治純、任新民、厲以寧、胡德華、胡克實、徐采棟、高修、章師明、秦川、胡績偉。

除此之外，簽名同意的4人：吳仲華、平措汪傑、劉大年、林麗韞。

委託代為簽名同意的6人：謝鐵驪、劉偉、黃順興、劉東生、董建華、蔡子民。

回答表示同意的11人：馬騰靄、王永幸、馬萬祺、清格爾泰、霍英東、馬木托夫・庫爾班、宋則行、伍覺天、王猛、李崇淮、王金陵。

通過電話表示同意開會的9人：周谷城、李貴、王厚德、高登榜、李琦、李學智、宋汝棼、馬洪、劉延東。

三、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信中，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對於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提議，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等委員，是通過電話表示同意開會的，而不是參加簽名者。

四、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信中，沒有顧明委員的名字。我們已於5月27日前往顧明辦公室，向其提交了一份信件影本。顧明委員對此是清楚的。

五、劉大年委員在信件中的確簽了名，簽名手跡仍在。

六、我國憲法規定，臨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需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代表的提議，而對於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並沒有關於提議人數的限制。現在提議人數已經達到常委總數的三分之一。社會各界呼籲更是十分強烈，因此，對於召集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提議決不能不予理睬，更不容許通過各種手段對於原先提出提議者施加政治壓力。

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與人民代表、人大常委的聯繫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之內的活動，是完全正當的，何罪之有?! 公民光明正大的參政議政活動被認為「令人不解」，對此我們深表遺憾。至於所謂「別有用心」的指控，我們保留通過法律程式捍衛自己名譽的權利。

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

1998-05-31

跟著李鵬走，每人九元九

6月2日　星期五　晴

前天晚上《新華社》發北京郊區三個縣農民遊行示威，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反對學潮的新聞。這是北京市委統一組織的，要求「每天三、四個縣，搞幾天，口號統一，要振臂高呼，群情激昂」。他們不但組織農民遊行，而且組織農民說話，新聞裡農民說的話，也用了「極少數極少數」，和陳雲、彭真、李先念的講話，



北京郊區的「官辦」擁護政府遊行

萬里在上海的聲明，如出一轍。

有讀者從順義縣給報社打電話，說在遊行呼喊的口號中，有「查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不代表人民」兩個。為了證實這些情況，特派記者前往通縣、昌平、延慶採訪。昌平、延慶縣委的同志告訴記者，在市委口頭通知的口號中，確實有「揪出人民日報黑後台」、「反對人民日報一小撮」的，但在印發的口號中沒有。他們兩縣因與《人民日報》的關係不錯，沒有呼喊這兩句口號。

去昌平的記者還瞭解到，該縣原計劃組織六千人，先開會後遊行，但只有一千人進了會場，其餘的就被聞訊

趕來的三百多個大學生堵在大門外，進不去。被堵在會場外的五千人分頭聽大學生講演，既不去參加大會，也不參加遊行。

去通縣的記者說，通縣是縣領導、各局領導帶隊遊行；各鄉各村各企業按照分配人數組織隊伍。農民由縣用汽車接到縣城，遊行後送回村，每人給記2～3個工。工人、幹部未經准許而不參加遊行的，扣發當月獎金；參加遊行的有獎，有每人發5元的，有發10元的，有發20元30元的（因企業經濟情況不同）。有些單位還統一發草帽、毛巾等。

真想不到，我們黨執政不過四十年，竟然墮落到雇人遊行的地步。記得解放前，我們在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國民黨政府為了阻撓和破壞進步的學生運動，也雇人遊行。那時，老百姓都很窮，很多人吃不飽飯，國民黨只需每人發一個麵包，就能招來許多人。現在畢竟進步了，每人要花5元，甚至20、30元！

可能是對北京市組織農民遊行和編造輿論的一種回應，今天北京大學、科技大學、人民大學等校一千多學生，騎自行車遊行到《北京日報》。遊行隊伍打的橫幅寫著：「問題就出在黨內——李鵬、楊尚昆」、「支持李鵬腐敗政府」、「北京日報胡編亂造」；呼的口號有：「貪污光榮」、「腐敗有理」、「鄧小平萬歲」、「李鵬萬歲」、「楊尚昆萬歲」、「跟著李鵬走，每人九元九」。隊伍在《北京日報》門前，燃燒了一些6月1日的《北京

日報》，表示對該報刊登的《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的抗議。

今天下午，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四通公司的周舵、高欣和從台灣回來的音樂家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宣佈開始48—72小時絕食。他們發表絕食宣言，說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來解除雙方的對立，呼籲全社會應及時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者態度；推進逐步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和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他們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就是「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

昨晚上面指定發表《神聖的天安門廣場不容褻瀆》一文，作者靳仁，據說是中宣部的化名。李仁臣笑著對老錢說，這個名字有意思，「靳」者「砍」也，「仁」，就是你的「仁」，就是他們要用刀子砍過來！這雖是笑話，但有人正在暗算《人民日報》卻是不假的。上面還指定轉載《北京日報》的「一位外地大學生」的反思文章：《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這兩篇文章都是衝著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的，而且都不署真名，「一位外地大學生」，沒有校名，連來自何省、何市也沒交代，更顯得主其事者的心虛與恐懼。夜班的同志覺得老發被迫發別人的東西不是滋味，說為什麼咱們不寫一點呢？於是寫了一篇《「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反映一點點大學生和普通老百姓的心聲。文如下：



到了6月初，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已疲累不堪。

【本報北京6月1日訊】今天，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帳篷上掛起「祝小朋友節日快樂」、「大哥哥大姐姐與你共歡樂」等標語。帳篷之間，三五成群的少先隊員和跟著家長的小朋友隨處可見。

中央美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帳篷前，大學生們在一些小朋友們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寫作品。一個小女孩高高興興接過天津大學一位學生贈送的氣球和別的禮品，孩子的父親請這位學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

下午二時左右，廣場上的一些大學生紛紛與孩子們聯歡並合影留念。旗杆兩側，藝術院校的學生以橫幅為道具，為孩子們表演了文藝節目。

一位家長告訴記者，她本想帶孩子去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玩的，遺憾的是這兩處今天都沒開放。

《人民日報》目前的這種情況，看來很難繼續下去了。

在昨天發下來的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情況摘編》，收集北京市高教局的一則反映，指責我們5月29日的《北京戒嚴第九天》和5月31日的《五・三〇天安門廣場即景》，說：「好像是進行客觀報導，而站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人民日報還是不是黨報？我們黨對它就沒有辦法嗎？」「許多同志希望中央對此盡快採取措施。」

老錢在「盡快採取措施」下面劃了兩條杠，意在提醒我們：那把在我們頭上晃來晃去的達克利斯劍很快就要砍下來了！

昨天說，有些人睜著眼睛講假話是現代「唐吉訶德」，現在看，這個說法很不確切。因為唐吉訶德鬥風車，只是讓人覺得可笑，並不想傷害別人。現在刻意製造輿論的人們，包括北京農民遊行喊的口號，國務院辦公廳的情況摘編，無一不是在為「國會縱火」找藉口。

屈指當知功與過

6月3日星期六晴

昨天晚上，王維澄來電話，提出要在一版顯著位置刊

登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真相的文章，還要補登6月1日《新華社》發的中國科協主席團會議擁護中央制止動亂的決策的新聞和人大常委馬洪否認曾在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的倡議書上簽名的聲明，還提醒《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與中央精神不符，希望把關嚴一些。

馬洪的聲明所以沒有在6月2日報上刊出，是因為6月1日我們同時收到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聲明。這個聲明說，他們在給人大常委的說明中，只說馬洪只在電話中表示同意召開人大常委會，並沒有參加簽名，在倡議書上簽名的名單上並沒有馬洪的名字。這跟馬洪的聲明不一致。我看到這兩個聲明後，即送給老錢，並寫上二行字：「可否與王忍之說一聲，四通的聲明應在報上刊登，以示雙方當事者都享有同等權利，報紙並不偏袒任何一方」。到了晚上，老錢在我送去的原件上寫道：「已寫信給王忍之同志，連同馬洪聲明問題一併提出。」

我爭取發表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聲明，還有一個原因，是這個聲明把倡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的來龍去脈講得很清楚，我們沒有發表過類似的文章，廣大讀者並不瞭解事實真相，只知道有那麼幾個名人出來鬧謠，好像有什麼人在搞陰謀似的。如果能發表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聲明，豈不是給讀者辦一件好事。

王維澄的電話，可以理解為對我們給王忍之信的答覆。

錢李仁同志終於病休了。

他的要病休我前些天就想到了。他當時和我說體檢情況，還拿出北京醫院寫的冠心病、動脈供血不足的病歷單。當時我就想他在向我暗示：局勢到了不能維持正常工作的時候，他是要病休的。記得5月18日，在二樓會議室的對話會上，他在回答一位同志的提問時，曾表示到了他不能履行他的職責時，他就會辭職。北京戒嚴以後，李鵬找他談話，他要求辭職未獲准，現在只能病休。昨天下午，我一到辦公室，他就告訴我，醫生已開了一個月病休的證明，並說他已給中央辦公廳寫報告，建議由我主持報社工作。

老譚住協和醫院，即使很快出院，因已兩次病倒辦公室，一時也很難主持報社工作，況且又是在目前政治空氣令人窒息的時候。

我知道我並沒有什麼本領可以挑得起主持報社工作這付擔子。老錢所以讓我主持，一是按名字排列，我主持名正言順；二是因為我畢竟已屆離休年齡，如趙紫陽對學生說的：老了，無所謂了。名利於我如浮雲。在目前的非常時期，需要我承擔責任的時候，我是義不容辭的。

四點開編委會。老錢正式提出病休，並懇切希望三點：一、顧全維護安定這個大局（「團結」呢？他知道在目前提它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二、不做那些被視為對抗中央的事；三、希望全社同志遵法守紀，堅守工作崗位。

在會上，老錢講了他從中聯部調來《人民日報》的經

過。他說，「你們知道是誰推薦我到《人民日報》來的嗎？我說出來，你們會嚇一大跳！」「是誰？耀邦吧？」他笑著說：「不是。是胡喬木。」我們朝夕相處三年，他知道報社絕大多數同志，包括編委，對胡喬木同志有看法。他說：「我來之前，胡喬木跟我講了很多報社的情況。不過，我只是聽，沒表態，到報社後，我也沒有表態。我自己觀察、研究，看了許多材料，包括過去編委會寫的材料。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胡績偉、秦川他們是對的，胡喬木在許多問題上是錯誤的。」

老錢說是病休一個月，但誰知道一個月以後時局會怎麼樣？估計不會按照我們的願望發展，因為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思想影響太深了。故老錢講話，經常流露從此離開報社的情緒。聽話聽音，大家心情都不好受，包括老錢，大家都哭了，彷彿生離死別一般。「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我們這個集體，是1986年才建立的，但經受了1987年的考驗，經受了這次歷史挫折的考驗。我們有缺點，有錯誤，執行過像開除劉賓雁出黨，勸王若水退黨（最後是除名）這樣的上級決定，發表過像「四．二六」社論那樣不得人心的文字，但我們沒有一個人以權謀私，我們勤勤懇懇地推進改革和開放。我們得到了社內同志的普遍理解，也得到廣大讀者的理解。我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了報社體制改革和新聞改革，即使在這次學潮中，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況下，也沒有忘記「三可」（新聞報導要做到可信、可

親、可讀）的新聞改革。《北京戒嚴第×天》這個專欄，雖然只有二、三百字，在新聞界卻產生了積極的反響。

編前會上，我將老錢病休和他臨別的三點希望向各部門的同志通報。大家都表現出一種抑鬱的感情，對老錢的決定深表同情。

下午二點多鐘，總編室夜班的小廖從府右街給報社打電話，說府右街路口上，頭戴鋼盔的大批防暴警察從南往北驅趕人群。警察正在不斷地施放催淚瓦斯。一些人逃到統戰部大院，警察又往院裡扔催淚瓦斯。警察和軍隊還動用電警棍，見人就打，還有往人群裡扔汽水瓶的。

小廖說，在現場的老百姓不多，也就幾百人，沒有警察人多；也許警察的軍人想確保中南海西門及附近道路的通暢，除此看不出使用防暴警察的必要。

凌晨二點半快下班時，聽說戒嚴部隊已分幾路衝進天



6月4日凌晨，大批全副武裝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以武力清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火光燭天。

安門廣場。記者從北京飯店來電話說，有一路部隊已被群眾堵在北京飯店。接著日本人從東京來電話，問部隊已進駐天安門是否屬實？多靈通的資訊！

自從實行戒嚴以來，我們每天，特別是夜晚，都提心吊膽，唯恐發生流血事件。每天都等到天亮，接到駐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記者來電話報平安無事，大家才放心回家睡覺。這種令人焦慮不安的日子，不知還要苦熬多久？

中國最黑暗的一天

6月4日　星期日晴

昨天（3日）凌晨進入北京城區的戒嚴部隊，已被市民和學生阻攔、驅散。早晨，有八名被驅散的士兵，由於不熟悉北京街道，不知道往那裡找部隊，被人領到報社休息。在西長安街新華門、府右街一帶，攜帶武器化妝成老百姓乘著大轎車進來的部隊，亦被群眾識破，被就地趕下汽車。群眾將部隊留下的武器，包括機關槍、打人鐵棍、套頭鋼圈等，都展覽在新華門前大街上和汽車頂篷上，有的展覽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台階上。看來是想借此來提醒群眾和廣場上的學生要提高警惕，隨時提防部隊武裝強行進城。下午，聽說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新華門一帶施放催淚瓦斯，驅趕群眾，運走運送部隊的大轎車和被展覽的武器。與此同時，幾千名群眾遊行示威，包圍市公安局，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自治會領導人。

晚上，自治會廣播公安局已放人。

也是昨天下午，王忍之、袁木、王維澄聯名，將經李鵬圈閱並加了編者按語的一封來信轉給我，要求登在今天（4日）報紙一版顯著位置上。來信署名「孫巨」。據我們經濟部的同志說，確有孫巨此人，他是已故政治局委員李井泉的兒子，康華國際諮詢公司（鄧樸方管轄下的一個公司）總經理。這是一封殺氣騰騰的討伐信，從對《「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聲討起，說「從5月19日起，《人民日報》已不代表中央，而是同情動亂製造者，站在中央決策的對立面」。

「我們要問文字的作者和批准文字出籠的先生：你們還想把動亂的罪惡種子播進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中嗎？你們認為繼續坐在天安門前的那些人是共和國的英雄還是違犯共和國法律、法規的人？你們是水準不高而給平息動亂出難題，還是別有用心，堅持『對抗到底』的錯誤立場？」

來信最後說：「《人民日報》是黨中央辦的報紙。不是《人民日報》的某些先生們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報紙。無論如何，不能拿黨中央機關報的崇高形象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助長氣焰！」

原信還有叫我們滾蛋之類的話，王忍之等人給刪去了。

這是個嚴重信號：一直在我們頭上晃的那把達克利斯劍馬上砍下來了！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就人类环境问题

李鹏发表电视讲话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孙巨同志的一封信

就部队进城执勤受阻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人大常委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

北京这一夜

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郭林祥

分别看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

6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了殺氣騰騰的《孫巨同志的一封信》。

老錢病休了，老譚住院了，老范率代表團在柏林，我們在家的幾位副總編輯商量，認為在報紙上刊登如此嚴厲批評自己的來信，不但是《人民日報》歷史上，而且是在中國共產黨黨報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不僅在讀者中，而且首先在報社內部會引起強烈反響。當然，我們也認為，在目前的特殊情況下，發表孫巨這封信，對《人民日報》在廣大讀者中的聲譽不會有什麼損害，可能還有些好處。它可以讓讀者更加明白我們辦報人的難處，更加理解前些日子我們的編輯、記者遊行示威時呼喊「『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的意思。只可惜王忍之等人刪去了信裡讓我們滾蛋的那些話。因此，我

們決定在發表之前做二件事：一是給王維澄打電話，要求恢復被他們刪去的那句話；二是在編前會上向大家通報，讓報社同志有個思想準備。

我給王維澄打電話提出全文刊登來信的要求。他堅決拒絕，並一再關照不要洩露作者通訊位址和電話（王忍之等已刪去）。可見他們和《北京日報》刊登的那些擁護李鵬講話的來信的作者一樣，心虛得很！

在編前會上，我給參加會議的各部門的同志唸了孫巨的信，說明它的來龍去脈和我們幾位副總編輯的意見，幾乎沒有什麼討論就取得了共識，也都對沒能爭取到刊登全文表示遺憾。

情況已很清楚，戒嚴部隊進城勢在必行，流血衝突也難避免，只是遲早而已。

晚上是李仁臣值班。吃罷晚飯，準備在家多休息一會兒，看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沒有什麼特別令人不安的新聞（連後來《新華社》發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也沒有）。九點左右，李仁臣給我打電話，說復興門外、西長安街已經打槍了！過去的十多天裡，每天大家都集中注意後半夜，以為只有後半夜，市民大都入睡了，街上行人少了，戒嚴部隊才會進城，要發生衝突也在這個時候，沒想到今晚提前了！

我住在報社大院內，放下電話便趕到辦公室。我到達編輯部大樓的時候，除了上夜班的，許多白班的同志，男的女的，還有離退休的老同志都來了，從一樓到二樓，



北京的醫院中堆滿了死於軍警槍下的學生和市民屍體

人來人往，議論紛紛，一片沸騰。

許多年青的記者、編輯聞了槍聲都自動趕到街上觀察、採訪去了。暫時還沒有新情況，連駐天安門廣場的記者也沒有來電話。我想，衝突是難免的，但我們畢竟是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共產黨，我們的軍隊是人民子弟兵，開槍也只能朝天開，威懾威懾罷了，那能真的朝老百姓開槍。槍口對著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連北洋軍伐、國民黨反動派也是有顧慮的啊！

十點以後夜班的電話開始不斷響起來，有記者從街上打來的，有住在城裡宿舍的同志打來的，也有一般群眾打來的，大都是報告軍隊進城路上打槍的情況。也有在海外的同胞聽了外國通訊社廣播後打電話來證實的。將

近十二點的時候，一位記者從復興門外木樨地來電話，報告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接著是這個地段的22樓（即一般叫部長樓）一位曾作中監委委員的關山復同志的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廚房裡被軍隊從街上開槍打死了！這一下，大家都震驚了！上面不是一再說，部隊進城不是針對學生和市民的嗎？難道住在部長樓裡的人是「極少數極少數」？難道這位在廚房裡的關家女婿是「極少數極少數」？就算是「極少數極少數」，但人家此刻是在自家廚房裡，也沒幹礙部隊什麼事呀！

凌晨一點以後，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第一個回來的是海外版的張寶林。他講在木樨地看到軍隊如何開槍，市民倒地，他怎麼樣踩著血跡走回來的情景。最後，他撩起褲腿，脫下皮鞋，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

接著回來的是年輕記者楊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來就抱頭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講述自己目



裝甲車從廣場上學生的帳幕上輾過

睹的情況。他原是派去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聽到槍聲以後，就朝著槍響的方嚮往西走，一直走到軍事博物館躲藏在一堵牆後面觀察部隊開槍，一名武警衝過來，不問一聲，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說罷，他脫下衣服，大家看見他背上還留有一道道血印。

與天安門廣場的記者有一段時間的聯繫中斷了，大家都非常著急，擔心學生和工人頂著不撤出，造成慘案真不堪設想。後來，記者終於來了電話，說劉曉波等四人代表廣場上的學生、工人、市民同戒嚴部隊代表談判，達成協議：群眾有組織地撤離廣場後，部隊再進去清場。

最令我吃驚也最令我難忘的是天安門廣場清場以後，天都亮了，一位攝影記者給送來一張照片，是他剛剛放大洗印出來的——在六部口西長安街上，坦克從人群中衝過去，許多群眾，大都是學生倒在血泊中，慘不忍睹！記者說，這些學生就是剛從天安門廣場有組織地撤出來的。

在記者陸續回來談情況的同時，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廣安門醫院等醫院陸續來電話，告訴我們救治受傷群眾和死亡人員情況。打電話的有的是醫院工作人員，有的是自動抬送傷患的一般群眾。這些醫院大部份分佈在西城區和海淀區，小部份在宣武區和市中心。我意識到從西路和南路進來的部隊最瘋狂、最野蠻，造成的血案最多最慘。一位已離休的老記者憤怒地叫道：「血洗天安門

廣場了！」「街上血流成河了！」

我們正在考慮版面的時候，王維澄來電話。他首先問孫巨的信怎樣安排？我說，一版頭條位置準備放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剛收到的，報眼準備放李鵬就人類環境問題發表的講話，孫巨的信只能放在李鵬講話下面。我再一次要求恢復被他們刪去的那部份內容，發表全文，他堅決不同意。他提出：一、要轉載6月4日《解放軍報》社論，《新華社》很快就發出來；二、戒嚴部隊進城，各報不許發自己的新聞，部隊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新聞，由《新華社》統一發稿。我說，等《新華社》發稿已經不可能了，《新華社》已經關機了。他說，這不用你管，你們等著就是了。

聽了一夜部隊開槍的資訊，滿腔悲憤，聽王維澄說要轉載軍報社論，馬上就想起「文革」初轉載《軍報》關於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事來，估計不會是什麼好東西，抵觸情緒就來了，和王維澄通話時聲音特別大。大約又過了一個小時，我們的第一次大樣快出來了，王維澄大概查實了《新華社》確實不發稿，又來電話說，《解放軍報》社論將用傳真機傳給我們，要我們等著，並問我們自己有什麼東西。對《解放軍報》社論，我說等來不及了，我們的工人都下班了！他要我想辦法，說社論非見報不可。我說，《新華社》發不了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新聞，我們準備自己寫一篇。他一聽就急了，連聲說「不行」，「絕對不行」。我說，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都作報導，而且有的通訊社已經廣播了，作為黨中央機關報，不報導，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這件事似的，這好不好？恐怕不好吧？他說不出不讓報導的道理，但還是說不行，便把電話掛斷了。

五點了，天大亮了，第一次大樣已出來，由從現場回來的兩位記者起草的特寫，經在場的同志（有夜班的，也有日班的）反覆修改，從一千多字壓縮到二百多字，把一些情緒性的語言都刪除了，只是客觀的報導。軍報的社論也排出來了，題目是：《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社論第一句就是：「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儘管聽了一夜槍聲，大家看了還免不了大吃一驚！因為如果「從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是事實，那麼到現在整整一天有餘了，為什麼政府（包括國務院、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不通過電台、電視台向人民宣佈，告誡人民不要上街頭，而拖到4日凌晨由《解放軍報》來宣佈？連安排在一版頭條位置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也沒有說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由軍報社論宣佈北京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這件震驚全世界的大事，真是聞所未聞的偉大創造！

我便在《北京這一夜》的開頭引用軍報社論這句話，藉以立此存照。這時，王維澄又來電話問軍報社論怎麼樣安排？我說，收到社論時排字工人已下班，版也拼好了，是留下來的車間幹部親自排字和改版的，只能放在

一版下面，因為這個地方原來安排的新聞，字數與社論相當，將它換下來最方便，放在別的地方，版面變動太大，時間來不及，很容易出錯。他問我們自己準備的稿子還用不用？我說，也安排上版了，只是客觀的簡單的報導。我便在電話裡唸給他聽。他不置可否，再一次提醒千萬別登孫巨的位址後便把電話掛斷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來電話，估計他請示了什麼人後來的。我問，我們自己準備的那篇稿子怎麼樣？他說，就這麼用吧！謝天謝地，上面終於同意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因為一、他沒有用中央名義強迫我們撤下來，報紙上終於留一點我們的聲音；二、他既然同意了，就是合法的了，即使將來有人秋後算賬（這是一定的），從組織上說，我們也沒有錯誤。就是說，別人不能以「對抗中央」的罪名責備我們。

《北京這一夜》全文如下：

【本報6月4日凌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了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給中央寫信：我們不幹了

6月5日星期一晴、大雨

昨天，6月4日，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一整天槍聲不斷。從東面進城的部隊，在紅廟——報社附近受到群眾阻攔，有一輛軍車被燒。他們路過報社南門和西門時，瘋狂地打槍，大部份是朝天開的，有時也平射，甚至向兩旁觀看的老百姓掃射。報社的同志幾次險遭不測，驚恐地往報社大院跑。大保他們不得不再三告誡職工和家屬不要到大門外觀看。晚上，有人報告，一位老同志的兒子和保衛處一位同志，在附近街上行走時被打傷，已送醫院救治，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在報社大院，到處是受驚的群眾，十人八人。十幾二十人一夥，互傳資訊，議論，咒罵！人們不罵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工人，也不罵上面記說的「極少數極少數」，單罵共產黨，罵鄧，罵李，罵楊。他們中不僅有年青人，還有中老年人；不僅有一般群眾，還有黨員幹部，包括「三八式」、「解放式」的老黨員幹部。人們憤怒，痛心，失望。難道說這就是我們年青時追求，並為之奮鬥一生的共產黨嗎？難道說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就是這樣對待人民嗎？槍聲，6月3日開始的槍聲，不僅打死了數以百計的無辜群眾，打傷了成千的老百姓，也打傷了

千千萬萬群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信任之心，動搖了許許多多共產黨員對黨的信任，動搖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槍聲，促人驚醒，促人反思。

昨晚我也陷入極端痛苦的反思之中。說實話，自從5月19日宣佈戒嚴那天起，我們就想到，一旦「左」的勢力主宰了中南海，我們是一定會被撤職，被批鬥的，因為《人民日報》和他們的對立已經十年了。我們也想到部隊進城，群眾阻攔，衝突難免，流血難免，但沒有想到會是現在這個慘狀——坦克、裝甲車往人群裡衝，機關槍往人群裡掃！解放前，我們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知道自「五四」以來，從北洋軍伐到蔣介石反動派，都沒有，也不敢如此用坦克、機關槍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請願群眾。我們年青時迫切要求加入的那個黨，真的那麼快就被權力腐蝕得如此腐敗了嗎？我們一生所追求並決心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就是這個樣子的嗎？一個執政黨如此腐敗，如此毫無顧忌地鎮壓要求改革，要求民主的群眾的根子在那裡？……

港澳報紙稱昨天的北京為「黑色的星期天」。今晨未下班，就收到中國留美學生電傳的抗議書，強烈要求鄧李楊集團下台。

今天一版刊登的幾篇文告，矛盾百出，妙不可言。如關於發生「反革命暴亂」的時間，昨天軍報社論說是3日凌晨，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也說是3日凌晨，但是，6月4日電頭發表的戒嚴部

隊指揮部發言人卻說：「今天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又如前些天，誰都知道市民和學生撿到戒嚴部隊丟失的武器（實際上是那些沒有忘記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的戰士，因不願意拿槍打老百姓而自動扔掉的）送到天安門廣場，學生們立即交到公安局，公安局還寫了收據。3日一些市民在六部口一輛大轎車裡收繳的武器，也只陳列在車頂上和新華門前，並沒有想據為己有。學生和市民群眾沒有用武力與政府對抗的企圖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戒嚴部隊的這位發言人的談話裡，卻有這麼一段妙文：

> 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向廣場上一些人發了菜刀、匕首、鐵鏈等兇器，並通過他們架設的喇叭，公然鼓噪人們「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人繼續發表煽動性反動演說，氣焰十分囂張。

學生和市民撿到現代化武器上交政府，自己卻操起菜刀、匕首去推翻政府，其智商不是比幼稚園小孩還不如嗎？這不是比天方夜談還要天方夜談嗎？

和李仁臣、大余、大保商量今後報紙如何辦？我表示，上面控制報紙宣傳越來越緊，登什麼不登什麼，如何登法全由上面定，我們一點點自主權也沒有。我不想繼續這樣當傀儡了，報社的同志又不同意我們放棄報社

這塊陣地，這是一個矛盾，怎麼辦？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經分析，我們一致認為「六・四」以後，鄧、李、楊控制的黨政軍已站到人民的對立面，要想在報紙上發表一些人民的聲音，根本不可能。與其讓他們躲在幕後指揮我們幹，不如讓他們站到幕前來。況且，早在胡績偉同志主持工作的時候，胡喬木、鄧立群這些「左」派就一直想佔領《人民日報》這塊陣地，只因胡耀邦、趙紫陽都不同意把《人民日報》辦成《紅旗》那樣，他們才沒有得逞。現在，胡耀邦走了，趙紫陽下台了，對「左」派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不讓，他們也要來佔領的，只是遲早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根本不存在讓不讓出《人民日報》的陣地問題。將來大氣候變了，他們混不下去了，也不得不退出這塊陣地。問題是怎麼樣讓法？在錢李仁同志病休前的一次編委會上，曾考慮過集體辭職的事。現在看來，集體辭職不可取，因為容易授人以柄，說我們對抗中央。還是我們共同上書中央，在錢、譚病休期間，請中央派人來主持報社工作為好。

讓出報社這塊陣地，對報社來說，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舉措，須取得大家的理解才好辦。我們認識一致後，下午臨時召開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我向大家介紹3日晚上4日凌晨的情況以後，就講我們的想法。同志們都很理解和同情我們的處境，很快就同意我們採取的步驟。我真誠地感謝報社全體同志，在極困難的時候，給予我們編委的理解與支持。

晚上，給中央的信寫好了，李余保和我都簽了名，老范在國外，我們代他簽名。老譚在醫院沒有驚動他，只徵求老錢同意後就送政治局常委（因《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是常委定的）。先電傳，後送信，同時抄送聯絡員王維澄。

不許記者錄音和寫稿的記者招待會

6月6日　星期二　晴轉陰

五人協調小組通知上午九點在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開會，藉口街上不時打槍，司機開車不安全，請假。

中央辦公廳通知在國務院小禮堂開會，要中直各單位的機關黨委書記和部長或副部長參加，我們決定由許仲英和大保參加。他們回來說，會議由中辦主任溫家寶主持，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傳達文件，內容和報紙已發表的告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差不多，只有一點新的——有一位少將失蹤。

少將，軍隊的高級將領，不可能是被群眾打死的。少將失蹤，反映了軍內一種思潮。

由於我請假沒有出席五人協調小組召集的會議，王維澄來電話問報社的情況。我提出，「六．四」以後，街上不時打槍，安全沒有保障，各單位的司機都不敢出車。因此，我們每天印報用的紙張供應不上（紙庫在郊外），印出來的報紙也運不出去，外地的報紙和市內的報紙都

積壓在印刷廠的倉庫裡。倉庫容納不下多少報紙，還容易引發火災。因為不安全，記者出不去，《新華社》發稿也少，每天出八個版有困難。在大環境沒有改變之前，每天只能出四個版，請中央考慮我們的這個意見。他請示後，五點鐘回電話同意每天出四個版，並要求寫個啟事，登在7日的報紙上，說明由於發生了反革命暴亂。

王維澄說，袁木於今天下午舉行記者招待會揭露反革命暴亂真相，新聞要登在7日的報紙上。他一再關照各報與會的記者，不許錄音，不許自己寫稿，必須用《新華社》的稿子。連錄音也不允許，心裡沒有鬼，何必這樣緊張？既然如此，何不乾脆叫做「袁木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

晚上，夜班編輯打電話問《新華社》什麼時候發袁木的稿子。他們說，不安全，辦公室燈一亮，就有人往裡面打槍，因此今晚不發了。他們對付困難的辦法比我們乾脆。要是我們也可以不出報就好了。

夜班編輯按照王維澄的意見起草了改出四版的啟事，說是「由於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我認為這麼說不符合實際情況。一是有沒有「反革命暴亂」？上面說的「反革命暴亂」指的是什麼？都有待澄清。二是「六·四」前，儘管有學生和工人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有群眾遊行，但北京的社會秩序基本正常，人們該幹什麼照樣幹什麼。報紙既不缺紙，印出來後照常送到讀者手裡，並不發生積壓倉庫的問題。被迫改出四版，完全是「六

．四」鎮壓所謂「反革命暴亂」造成的。要實事求是的話，應該寫「由於戒嚴部隊武力鎮壓『反革命暴亂』……」，可是不能這麼寫，又不願違心地說假話，再三考慮，只好改為「近來由於各種原因……」。

有的同志看了說：「這麼改好是好，就怕上面要批評」。我說：「那是一定的，但已到了這個地步，批就讓他批去吧！」

《新華社》發了幾個省市給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擁護鎮壓的電報。《新華社》很聰明，不寫導語，不做標題，一字不動地照發電報原文。夜班編輯犯難了，問我標題怎麼樣做。我說，咱們向《新華社》學習吧！

上面不滿意「北京市民的希望」

6月7日　星期三　陰雨

下午，王維澄來報社，先和我單獨談，後和其他副總編輯見面，寒喧幾句即離去。

他這次來帶有摸情況性質，許多事情點到即止，沒有深談。我也是只聽，最後表個態度。

他這次談話的要點如下：

一、對我們要求中央派人來主持工作的信，中央的意見是維持現狀，因為目前未找到合適的人選。

二、對5月19日以來的報紙的意見，主要是該突出的標題沒有突出，中性標題多，態度不夠鮮明。



劫後的北京市民帶著沉重的心情輪購基本生活用品

三、批發孫巨的信，主要是出於保護《人民日報》。

四、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

五、對今天一版的《北京市民的希望》不滿意，說最好發一些市民幫助軍隊恢復秩序，如拆除路障的報導。

六、現在中間群眾已轉過來了，只是青年人還有抵觸情緒，現在主要工作是把真相（如袁木的記者招待會）告訴群眾。

我說，我們所以用中性標題，主要是考慮廣大讀者的情緒。他們一看見「動亂」、「暴亂」、「戒嚴」等這些詞情緒就來了，就不想看下去。這無異於逼著廣大讀

者收聽《美國之音》等外電的報導。所以，從宣傳效果考慮，做什麼樣的標題，是值得認真考慮的。

他承認，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他還說，用軍隊鎮壓後出現的現在這種局面，是中央沒有料到的。

不打自招，所謂中間群眾已經轉過來了，只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罷了。

王維澄不滿意的《北京市民的希望》，恰恰正是讀者比較滿意的，全文如下：

北京市民的希望
——盡快保障基本生活用品供應

【本報訊】近日來，北京市出現交通阻塞，基本生活用品短缺的現象，對此市民十分憂慮。他們希望市面上政府盡快採取措施，恢復交通，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用品供應。

今日，記者走訪了一些街頭，許多商店都關閉，集貿市場的菜販也比往日大為減少。在少數營業的商店糧店和菜攤前，居民排起了長隊，一些適於貯存的商品，如罐頭、餅乾、糧、油銷量猛增。

下午一時許，小莊副食店運來一車鮮奶。未卸車，就被搶售一空。一位搶到10袋鮮奶的青年人說，他的孩子快斷頓了，這點奶也要全樓幾家分，有的正準備把孩子送往外地親戚家。

據北京電視台今晚新聞報導說，許多市民給電視台打

電話，紛紛抱怨換不到液化氣。市民們希望市政府盡快採取措施，保障基本生活用品的供應，以消除市民的憂慮。

「都要與中央保持一致」

6月8日　星期四　晴

下午，王維澄來報社與我們幾位副總編輯「座談」。這是他昨晚電話約定的。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他的這次來是壓我們轉變立場，提高宣傳調門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從版面安排、標題製作和稿子取捨上，都要與中央保持一致」。

他是有備而來的。他歷數我們與中央不一致的地方。他說，5月19日以前，對趙紫陽的東西宣傳得很突出，很鮮明，如趙5月4日講話，5日版面上，位置突出，標題鮮明，還有學生反應等等。5月20日一版還顯著刊登趙向天安門廣場學生講話的新聞和照片，比李鵬講話突出。總之，5月19日以後，不但不與李鵬、楊尚昆、鄧小平保持一致，還利用自己的稿子，如《北京戒嚴第×天》、《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等，與中央唱反調……他還列舉一些「影射」的新聞。如5月21日的「社會黨天民黨矛盾激化，義大利總理辭職」，5月22日的「內梅特總理說：匈牙利面臨動盪潛在危險，不准用軍隊解決內政問題」，5月24日的「南朝鮮群眾紀念光州起義，示威者遭到警察殘酷鎮壓」。還有兩則國同新聞，一則

是5月16日的「清理整頓公司不力接受宴請，湖南副省長楊匯泉被省人代會罷免」；另一則是5月24日的「愛人民的官兵受人民愛戴，河北人民滿腔熱情為部隊排憂解難，官兵表示：子弟兵要做有益於老百姓的事」，也被說是影射、攻擊戒嚴和要求李鵬下台。

他們如此自動對號入座，連解放軍官兵說「子弟兵要做有益於老百姓的事」也犯諱，那不是自己承認：下令戒嚴，調部隊進北京，向群眾開槍……並不是「有益於老百姓的事」嗎？

末了，他甚至說出「你們如何向中央交代」的話來。這把懸在我們頭上的達克利斯劍真的砍下來了。

老范、老李、大余、大保和我都發了言。我們總的調子是強調宣傳效果：不要因為我們工作不好逼著群眾絕望，去聽《美國之音》，相信《美國之音》。這是多少年來的沉痛教訓。

最後，我再一次表示，希望中央認真考慮我們關於派人來主持工作的要求。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如何向中央交代」的答覆。

袁木、王忍之：「不要再擔心翻船了！」

6月12日　星期一　晴

10日的報紙刊登了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新聞。這是他自耀邦同志追悼會、與戈爾巴喬夫會談

以後第一次公開露面。這是非同尋常的。它可以是有力的對外電傳說他已去世或病危的闢謠；它可以將所謂軍內矛盾的傳說平息下去；它尤其是給國內外一個極其重要的資訊——楊李喬為主體的新領導班子獲得鄧小平、軍隊以及一批元老們的支持。

鄧在講話中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實行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這無疑會使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放心，因為大家都擔心「左」派上台以後要改變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

今天，宣傳協調五人小組召集首都新聞界領導人開會，通知我們幾位副總編輯參加。《新華社》正副社長、廣電部正副部長都去了，其他單位有去三二人的，有去一人的。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看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錄影。講話內容除10日的報紙已報導的外，還有一些未曾報導。一、這次學生運動的口號，反官倒，反腐敗，只是陪襯，真正的目的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論，核心是修改「動亂」二字。二、這次「反革命暴亂」是必然發生的，晚發生不如早發生，現在發生是最好的時機，因為一批老人還在。三、講到部隊執行平息反革命暴亂時，說「空軍還沒有動用哩」！四、十三大路線要堅持，市場經濟

與計劃經濟相結合不能丟，但今後計劃部份要擴大，市場部份要縮小。「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句話，既不批，也不提。

看來經濟改革要有所收縮，至少步伐要放慢。

第二項議程，也是主要議程，是朱穆之談對外宣傳的主要要求。他的長篇講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要以美國為我們打擊的主要對象」。他說，「這場暴亂是美國長期精心策劃挑動起來的。對美國政府和美國輿論要有區別。對《美國之音》，要針鋒相對。不僅對他的造謠要批駁，而且對其居心，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也要揭露、批駁」。

講到加強領導時，朱穆之說：「都是黨的領導，都是黨員，應執行黨的指示。（王忍之插話：《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應聽黨的。）要進一步組織寫作力量，寫文章、評論，前一段聽說不願意寫，這怎麼能行？（王忍之：思想不通，所以寫不出來。）經過這個波折有好處，可以更好地整頓隊伍，可以更好地統一思想。這件事，是國際上大潮流。中國採取這個態度，在國際共運中起中流砥柱作用。波蘭選舉，團結工會獲得壓倒多數。自己『請君入甕』。波蘭政權究竟在誰手裡？（陸按：這是決策者心態──對政治民主改革的恐懼的自我流露）

王忍之、袁木、王維澄講話，都說鄧小平講話標誌著鬥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這個大局定了，不要再擔心翻船了！（又是某些人心態

的自我流露！）他們宣佈：鄧小平講話是今後宣傳報導的總方針，要求各單位跟上來。當然，他們也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再一次嚴厲批評我們（雖然不指名），特別是王忍之。他說：「4月15日至6月12日證明，輿論作用確實很大。毛主席說，推翻一個政權，先搞好輿論。陳雲說，一個經濟要搞好很重要，宣傳搞不好危害更大。4月15日以後，有一段時間輿論導向有問題，特別是「五・四」趙紫陽的講話，5月12日傳達趙對胡啟立、芮杏文的講話——輿論放開一些沒什麼以後，人家以為是中央的意見（陸按：總書記的意見不是中央的意見，誰的意見才是中央的意見？），自己的一些輿論陣地，就造拆共產黨台的輿論！」

王忍之把現在的新聞單位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正確、積極、主動、及時報導，寫文章、評論。如廣播電視部，打破常規，增加資訊；還有其他一些報紙。第二種，還能按中央精神刊登各種新聞報導、文章，該發的都發了，但自己的東西很少，甚至沒有。沒有發出與中央精神不一致的東西，是好的，但自己的東西很少。有客觀原因，如交通堵塞，不安全，要採訪人家不接待。也有主觀原因，幹部思想不通。第三種，有的報紙，仍然通過各種辦法，發出與中央精神不符，甚至相抵觸的東西。我們接到很多群眾來信，舉報批評。

王忍之說，這第三種報紙運用的辦法之一是運用版面

語言：標題大小，如何做，放在什麼位置……。辦法之二，是通過報導其他新聞，如國際新聞，含沙射影，指桑罵槐，針對戒嚴。辦法之三，自己寫一些文章，字數雖不多，但以吞吐曲折的文字表現自己的立場。如《「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北京這一夜》。

對第三種情況，王忍之說，新聞協調小組一成立，5月21日第一次會上就指出：「發生這種事情自己要負責。我們希望從此以後不再發生這樣事情，否則不好向黨向人民交賬……」

王忍之最後說，香港三家報紙（大公、文匯、新晚）與其他報紙沒有多大差別，（袁木說：香港《文匯報》變質了！）要控制閱讀範圍，其他港報更不用說了。前一段有些單位將它們貼出來讓大家閱讀，今後決不允許這樣做。

袁木也慷慨激昂地「講幾點感想」。他指責趙紫陽對動亂採取錯誤態度、方針政策，耍兩面派，搞陰謀之後說：「不能不沉痛地看到，由於輿論導向錯誤，目前人們的抵觸情緒很嚴重，一時轉不過彎來。」他加大嗓門說：「根本是立場問題」，「《「六・一」天安門廣場一瞥》、《北京這一夜》到底是什麼立場？寫的人，批准的人是什麼立場？《北京這一夜》看了後確實令人憤慨，許多人打電話問寫這篇東西的是什麼人？」

說我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還不配， 但我們畢竟是「鐘鼓樓的麻雀」，聽批評聽慣了。看了孫巨的信，今天聽諸位大人的批評，已不覺新鮮了，不僅沒有不舒

服的感覺，而且還暗自高興：那麼個小小豆腐塊，竟能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說明它們確實擊中了某些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經。

耐人尋味的是王忍之概括現在群眾的思想時說的一句話。他說，有人說現在是城外的比城裡的轉變得好，下層的比上層的轉變得好，文化低的比文化高的轉變得好！

這也是一個信號：要搞什麼運動的話，知識份子又將是在劫難逃！因為他們大都住在城裡，又是「上層」，比較瞭解這場所謂「動亂」、「反革命暴亂」的真相，又有較高文化，愛動腦子想問題，不容易受騙，屬於思想轉變得最不好的那一部份。

「屠殺人民，不得好死！」

6月13日　星期二　晴，晚上小雨

上午九點，國務院第一會議室，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喬石傳達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李鵬、姚依林講話，要求各部門集中一段時間，結合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認真學習，把思想統一到鄧的講話上來。

下午二點，主持編委會，照本傳達鄧和李的講話。經討論以編委名義向報社全體同志提出五點要求。一、集中一段時間，一面工作一面學習鄧的講話，結合工作和思想實際討論，希望把對這次事件的產生原因、性質以及十年反思的認識，逐步統一到鄧的講話上來。二、鄧

講話是當前宣傳報導的總方針、總綱領，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要無條件地宣傳。對鄧的講話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宣傳上只能以鄧的講話為準繩。三、各部門結合自己的情況制定一個宣傳計劃。四、對前一段的報紙宣傳，要認真進行總結，如有失誤，責任在編委會，與同志們無關。五、要堅持紀律，堅守工作崗位。

因鄧的講話要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由各部門分頭傳達，在編前會上，我只傳達李鵬、姚依林的講話和編委會的五點要求。大家的思想都很沉悶，頗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歎，什麼問題都沒有人提，只是默默地聽著。

上午國務院的會議散會後，在會議室外面候車的時候，遇見原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同志。自他離開中宣部到全國總工會任副主席一年多來，很久沒見面了。在這次學潮中，我知道全總是發表過聲援絕食請願學生的聲明，並捐贈一筆不算少的款項的。作為主持全總日常工作的他，現在的日子跟我們一樣不太好過。在交談中，我知道他還是原來的他，他的觀點和我們的基本一致。他告訴我，在學生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日日夜夜，不知有多少工人、幹部，包括許多勞動模範、先進生產者 ，給全總打電話，或親自找到全總，請總工會一定要支援請願的學生。他們認為學生的要求就是他們的要求，他們不同意黨和政府對待學生的態度和作法。他說，全

總發表的聲明是代表當時廣大工人群眾的意見的。這我毫不懷疑。我也相信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的聲明也是在類似的情況下發表的，代表了廣大青年和婦女的心願。

今天報紙二版刊登《新華社》的一則短新聞：《石家莊數千人衝擊軍事機關，十九名骨幹分子被抓獲》，光看標題以為「衝擊」是昨天或前天發生的，看了文字才知道是6月5日和6日，即緊接北京的「六・四」之後。文中說，這數千學生和群眾，有的燒花圈、放鞭炮，有的向負傷的戰士擲石塊、玻璃瓶子，有的掀倒門衛的崗台，致使十多位戰士受傷。最有趣的是新聞說，煽動數千學生和群眾「衝擊」的被抓獲的十九名骨幹分子，「有的是沒有改造好的勞教釋放人員，有的是有劣跡的青年工人，有的是無業痞子」。數千學生和群眾竟被這些人煽動衝擊軍事機關，是可能的嗎？未免把今日的學生（姑且不說大學生）的智商看得太低了。依我看，6月5～6日，石家莊數千學生和群眾「衝擊」軍事機關是有的，為的是抗議北京「六・四」的血腥鎮壓。抓獲的十九個人也是有的，但他們並不是什麼「骨幹」，什麼煽動者，只是混在群眾隊伍裡的歹徒而已。早在「六・四」之前，北京就盛傳北京市放出大批勞改未期滿的分子，配合當局製造打砸搶事件，以便有關領導理直氣壯地下令鎮壓請願的學生和群眾。看了石家莊的這則新聞，不能不讓人跟「六・四」前北京的街頭傳言聯繫起來。

其實，為了抗議北京的「六・四」，數以千計的學生

和群眾上街遊行示威的，何止石家莊一地。據我們駐省市記者報告，上海、武漢、哈爾濱、濟南、杭州、長春、太原、蘭州、成都等都有數以千計、萬計的學生和群眾上街遊行示威。他們高呼的口號和舉的橫幅中有：「屠殺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鵬，討還血債！」「反對暴力鎮壓！」等等。

「四人幫」的文痞復活了

6月16日　星期五　晴

近十多天來，上面指定發表的東西越來越多，有的是直接送原稿來，有的是指定轉載某報某日某人的文章，有的是拐著彎子由《新華社》通知說是上面指定要發的。這些文章、新聞、來信，有個共同點，就是沒有真實姓名、地點和單位；有的雖然有署1名，但是假的，沒法查核。僅從10日算起，就有下列文稿：

6月10日一版：十二名大學生的《反思起來我們無限內疚》；北京高校一青年教師的《《美國之音》造謠可恥》；三版：《北京市一普通家庭三代人寫信給偉大的解放軍官兵》。

6月11日一版：《北京日報》的《一位目擊者談六月四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清場情況》，文中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廣場上沒有槍聲」。二版：《首都群眾救了我——戒嚴部隊戰士陳海波談被救經過》。

6月13日三版：《祖國不會忘記你們》，署名「湖南長沙兩共產黨員」；二版：《方勵之違背人民意願》，一位中年知識份子的信（《新華社》據「有關部門提供）。

6月14日，《一些城市連接發生嚴重事件說明了什麼？》作者郭玉水，不知何方人士。

文稿不署名，不提供可查的單位和位址，據說是為了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如《北京日報》在編者按中說的，也如王維澄在發表孫巨來信時一再關照的。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當然是必要的。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統治下，許多批評當局的文章往往署假名，這是報刊對被批評者的保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一些揭露某單位、某領導幹部錯誤的文稿，也不署真名，為的是避免當事人對作者的打擊報復。現在這些不署真名的文稿並不是批評有權有勢者的錯誤，而是相反，都是站在黨和政府的立場，為黨和政府說話的，還要保護作者的人身安全，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有兩種情況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一種是作者所陳述的事並非實情，甚至與廣大群眾所見所聞完全相反，即通常說的顛倒黑白，胡編亂造，署了真名或者可以查實的姓名地址，會受到群眾的指責，因此，不得不署假名或不署名，用「一個青年」、「一個普通家庭」之類代替。二是文稿並不是什麼一般讀者所寫，而是權威機關的人士秉承權威人士的意見編造的，不得不用假署名來矇騙讀者。不管是那一種情況，都說明了主其事者幹了違背廣大群眾的意願的醜事錯事，明明自覺理虧

而偏偏又想充當正義的化身，其實心虛得很。

14日王維澄轉來一篇文章要發表。文章是批評6月11日四版刊登的四通公司一則廣告的，署名「實蒂」，既沒有作者住址，也沒有工作單位。

找來11日報紙一看，四版果然有四通公司的一則通欄大廣告。在「姐妹共攜手，一任群芳妒」的標題下，寫明「6月8日至7月8日四通MS系列產品全國聯合服務展銷月」，並列有遍佈全國的95家參展廠商名單。我請廣告處寫個簡要的刊登這則廣告的情況。他們很快就送來了。想在《人民日報》登廣告的人很多，往往等待很長時間才能見報。四通公司這則廣告是4月份就安排了的，那時這次學潮還沒影子呢。廣告設計者也不是「四通」，而是它的廣告代理商——電揚廣告公司。這是一則地地道道的商業廣告。

但是這位「實蒂」硬給它上綱上線，說是利用廣告搞政治影射，把廣告標題「姐妹共攜手，一任群芳妒」，同「四通」個別人的活動聯繫起來。文章有一段這樣說：

「我們並不否認這則廣告是商業廣告，上面有展銷產品的內容，還有那麼多的參展單位。但是，聯想到『四通』公司某些要員在動亂中的種種表現，稍有社會經驗和政治警覺的人們，都會一眼看出廣告的製作者，顯然是做了手腳，玩了影射的把戲，因而使得這個商業廣告又變成了『政治廣告』。這點睛之筆，就點在標題上，尤其是最後那個『妒』字上。」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作者還在『四通』的譯成英語STONE上大做文章。說「STONE，漢字就是石頭，四通，就是投石問路的意思，即投資產階級之石，問資產階級自由化之路。」作者想告訴人們的是：不僅這則廣告是政治影射，而且四通公司就是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而成立的！這樣，文章就把一個曾經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表揚的高科技企業，打成反革命的政治組織了。按照這種邏輯株連下去，不知有多少單位多少人遭難呢！

奇文共欣賞。「光天之下，天生聖人，以身作則」。「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過去搞文字獄的封建帝皇，看了「實蒂」的大作，恐怕也會自嘆弗如的。

「文網」已經張開。是不是「文革」那一套又回來了？至少是「四人幫」的文痞復活了。

我決不做某些人的幫兇，幫助他們入人以罪。下午給王維澄覆一短信，表示「實蒂」的文章不能用，如果堅持要用，那請允許我們同時發表本報廣告處的說明。

擺脫困境，可喜可賀

6月19日　星期一　晴

上午和大保去看老錢。這是應他的約請去的，也是6月2日他病休後我們第一次去他家。從2日到現在，不過半個月多二天，中國大氣候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

如此震撼世界，都是我們當時沒有料到的。

老錢說，星期六，即前天，宋平找他談話，告訴他：中央已決定他和老譚不再擔任報社的職務；高狄，中央黨校副校長接任社長，邵華澤，總政宣傳部部長，接任總編輯。我們說，這個決定我們昨天就聽說了，是記者從省裡回饋回來的。今天早上，中央辦公廳已通知下午三點在中南海152會議室開會，要全體編委參加。當時，我們就猜測是調整報社領導班子的事了。老錢約我和大保去，是想事先給我們通個氣，讓我們有點思想準備。這是多慮了，因為要求中央派人來主持報社工作，原是我們主動提出來的。

下午3點，我們全體編委準時到達中南海152會議室，李瑞環、宋平、王忍之、王維澄、高狄、邵華澤接著也進來了。宋平主持會議。他在宣佈中央關於調整《人民日報》領導班子的通知之前，宣佈中央決定李瑞環主管中央的宣傳思想工作。

中央通知對老錢老譚用「不再擔任」社長、總編輯這個詞，即既不是免職、撤職，也不是離職休養，似乎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因此，錢李仁同志發言後，宋平馬上解釋說，他們兩位是「正常的工作調動」。李瑞環、王忍之、王維澄、老錢、老譚、和我，高狄、邵華澤、宋平都發了言。老錢講話有二個內容。一是他早就向中央提出請求調動工作，而且不只一次。二是他在報社的工作是經得起檢查的。重要的決定，都有編委

會會議紀要，重要的講話都有錄音。他根本不承認有什麼導向錯誤。老譚的發言很出我意料，他承認犯了錯誤，並表示很痛心。我只表示了一個意思，即請中央派人來主持工作是真誠的。李、高、邵也是表態的。宋平講了對報社職工的基本估計，希望高、邵團結大多數辦好報紙，都是正確的官話。

王忍之、王維澄的調子最高，好像他兩人的分工就是在會上數落《人民日報》的錯誤。由於已不止一次地聽過這些指責或批評，今天聽來已不覺新鮮。他們對《人民日報》的指責，還是胡喬木、鄧力群的老調，即宣傳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力。這是從胡績偉同志主持工作時起就聽慣了的老調。由此可見，他們要調整《人民日報》的班子，並不僅僅是因為最近的所謂導向錯誤，更主要的是要清算十幾年來的老賬。過去，前有胡耀邦、後有趙紫陽，不讓把《人民日報》辦成《紅旗》，他們只好忍著。現在，胡作古了，趙倒台了，他們彈冠之後，不抓住這個良機把《人民日報》抓在自己手裡更待何時？

說心裡話，在目前的大氣候下辦報，對一個有良心的對人民負責的人來說，不但是件難事，而且是件很痛苦的事。走出會議室以後，在過道裡，老錢悄悄地對我說，感謝我們幫助他擺脫了困境。我呢，負責主持報社工作的使命宣告結束了，從今以後，不再任人擺佈了，更是可喜可賀。

人心不可欺（之一）

在「六·四」後不久的一次五人宣傳協調小組的會議上，王忍之在指責所謂輿論導向錯誤的時候，曾說過一句不無憂慮的話：「有人說，現在是城外的比城裡的轉變得好，基層的比上層的轉變得好，文化低的比文化高的轉變得好。」

這裡的「轉變得好」，指的是群眾對黨和政府鎮壓群眾行動從對立變為不對立，或者變為擁護。

我在當天的日記裡，曾說這句話比較真實地反映北京市民的思想。因為城裡的人比城外的人更瞭解鎮壓的情況，上層的人比基層的人從更大的範圍內瞭解事實真相，文化高的比文化低的人更善於獨立思考，不容易受騙。北京青年中流行的一句話說得好：「不管你們怎麼樣宣傳（指當時歪曲事實的宣傳），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還預言：知識份子又要倒楣了！沒多久，所謂整頓清查運動就在各單位、各學校開展了。

這當然不是說，離北京越遠的人就越相信官方的宣傳，越容易從懷疑、對立轉變為擁護。後來的一些調查材料表明，人心並不如某些人想的那樣好欺。

7月7日《人民日報》內部刊物《情況匯編》刊載瀋陽一位老幹部的來信。信裡說：「我近來發現有好多人，

可以說90%的人，都在玩兩面派。他們在學習會上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堅決反對暴亂，可是會後都大罵中央領導人，甚至個別領導幹部也話外有音。我有四個孩子，他們前些日子天天和我辯論，我氣極了，就臭罵他們一頓。他們表面老實了，可我知道他們心裡有想法。後來，我和大孩子交談。天哪！他們的思想真讓人害怕和擔心。我的孩子還勸我放心，說他會保護自己。說穿了，他們也是兩面派。」

說這麼多人，90%的人是兩面派，是言重了，而且是不對的。他們不得不會上一套會外一套，是形勢使然。他們不表示擁護就過不了關，就有被批鬥的危險。當著領導面不說真話，在公開場合不說真話，是一般幹部和群眾用以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是幾十年的政治風浪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他們不是為了想整什麼人，也不是為了升官而討好什麼人，所以不能說他們是兩面派。這種現象的出現，大抵與當時的政治大氣候有關。凡是「左」的思潮，「左」的指導思想（估且不說「左」的路線）居上風的時候，或是單位，或是地區，乃至全國，群眾在公開場合不說真話就普遍出現。這是自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以來的歷史一再證明了的。

在這位老幹部來信的前前後後，我還看到過幾份類似內容的內部情況。在7月初舉行浙江省委擴大會議上，財貿口、高校口的領導人都認為：當前要抓穩定大局，重點是穩定高校局勢，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現在高校學

生普遍對平息暴亂思想不通，出現了不吵、不鬧、不跳和不看（電視和報紙）、不聽（廣播）、不說的「六不」現象，連機關幹部思想也很混亂。因此，怎麼樣做才能統一群眾思想認識，他們也信心不足，缺乏辦法。

大約在這之後一個月，即「六．四」後二個月，共青團湖南省委派人分赴七個大中型企業、五所重點大專院校，以及長沙、望城、湘潭、雙峰等縣市，召開十三個座談會，以問卷形式調查1536名青年工人、農民、教師、學生，就對中央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亂」，制止「動亂」所採取的措施的態度，中央新領導班子以及青年最關心的問題，進行摸底調查。

從收回的1030份問卷和座談會看，約50%的調查物件的認識跟中央的要求有較大距離。湖南師大一些青年教師、學生認為，上千上萬的幹部、群眾上街遊行，確實是出於對現實生活中的腐敗現象不滿。45%的人採取閉口不談或敷衍的態度。只須5%的青年堅決支持中央的措施。

調查發現，對中央抵觸情緒較大的是青年學生。一位學生說：「《美國之音》我不聽，中央電視新聞聯播我不看，對時局麻木一點好！」在青年學生中還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國事家事天下事，管他屁事；風聲雨聲讀書聲，我不作聲。」

這份調查對象1500多人，有城市的，有農村的，有學生、教師，有工人、農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它告

訴我們，90% 以上的人站在遊行示威的學生和群眾一邊，只有 5% 的人擁護中央的鎮壓措施，就是說，在「六・四」這個問題上，連基本群眾也和共產黨不一條心！

人心如此，黨心如何？「六・四」後有幾天，大約從 4 日到 8 日，因為軍隊到處亂打槍，北京老百姓都不敢上街，公共汽車、電車停駛，郵政工人不敢送信送報。《人民日報》印報用的紙不能從郊外紙庫運進來，印好的報紙郵局不敢來運走。中南海有人給報社打電話，說好幾天看不到報紙了。為了讓中南海的同志看到報紙，我們決定由辦公廳一位負責人帶領發行處的幾位同志，冒險開一輛小車把報紙送到中央辦公廳機關事務管理局去。管理局從領導到一般幹部，看到《人民日報》的人來了，都擁過來和他們緊緊握手擁抱，像古詩「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年描寫似的，淚眼對著淚眼，好久說不出話來。當我們的同志說紙張供應不上，報紙運不出去，準備由每天八個版改為四個版時，一位負責人說：「對，要找他們，要讓他們簽字」。「他們」指的什麼人？為什麼要讓他們簽字？這不正是中南海，中國最高首腦機關的一般黨員幹部的最真實的思想感情嗎？

人心不可欺（之二）

「六・四」已過去二個多月，北京街頭人來人往，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中央領導人也一再對外賓說，中國局勢已恢復正常，平暴已取得了勝利。這話不能說不對，尤其是對全國來說。但要消除人們心頭留下的「六・四」陰影，就不那麼容易了。一般市民是這樣，一般學生、一般幹部是這樣，連一些位高權重的人也不能例外。

下面是三篇日記摘要。

8月22日

夜班編輯高保生從河南採訪回來，我問下面幹部、群眾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如何？相信不相信現在的宣傳？他說，相信的很少，大多數人思想不通。縣以下，包括縣一級領導幹部，公開罵中央的大有人在。地委以上的幹部問及此事時，一般只是笑一笑。

小高說，天安門事件對群眾也有影響。現在糧食價太低，家用生產資料價太高，農民意見很大。原來有些地方農民準備集體抗糧（不交售糧食），「六・四」事件發生後，群眾怕政府鎮壓，都打消了原來的打算，按時交售了。

8月31日

中紀委、中組部聯合發一個《情況通報》，反映遼寧省清查工作遇到阻力。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為它不是發生在北京，而是在遼寧。

通報說，遼寧各大專學校師生對這次清查運動，一是持消極態度；二是對被清查對象持同情態度；三是持抵觸態度。

通報說，某某學院保衛科幹部協助公安機關清查，到學生宿舍找人時，有的拒不開門，並且叫喊：「來吧！吾爾開希就在房裡，就是不開門！」前幾天，遼寧大學放映《巍巍昆侖》，當劇中一個國民黨將領說「我與共產黨打交道這麼多年，他們從來就不說真話」時，場內長時間熱烈鼓掌。當劇中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蔣介石說「我可以給你送來軍火，但不能用來鎮壓學生」時，場內再一次長時間熱烈鼓掌！（我們報社放映《巍巍昆侖》時，幹部群眾看到上述兩個鏡頭的時候，同樣報以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新調來報社的頭頭對此十分尷尬，十分腦火，說什麼「這是中央黨報的恥辱」。）

通報要求各地黨組織正視群眾的抵制情緒，警惕這些人將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必須把清查工作進行到底，不留後患。

「六·四」後黨的威信是高了還是低了？

9月25日

金鳳告訴我，上周去中山公園音樂堂觀看中國京劇院的演出，節目很精彩，但觀眾不能從天安門出入中山公園。她是從南池子文化宮東門進去，繞過午門，從中山公園後門進的。散場時也從原路繞出來。

我說，你這是少見多怪。22日24日，我兩次去護國寺人民劇院看上海崑劇院演出《長生殿》和《潘金蓮》，看見劇院大門貼一張佈告，規定觀眾不得攜帶書包、公事包等可能藏著什麼兇器等危險品進場。這到底為什麼？並沒有什麼大人物去看戲。自己不做虧心事，何必如此害怕群眾，處處提防群眾呢？

前些天，有些港台報紙說「六・四」百日祭，北京有些學校有活動，我還不大相信。今天，看國家教委辦公廳22日印發的《高校動態週報》，知道港台報紙並非妄言。

週報反映京津滬等地一些高校確實出現「百日祭」活動。它列舉了四種活動方式：

一、張貼大字報小字報、反動標語，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

二、撒白紙，掛白花，搞悼念活動。

三、聚眾哄鬧，發洩不滿情緒，如晚上熄燈後，從樓上往樓下摔瓶子（「摔小平」），唱《國際歌》等。

四、散發反動信件、傳單。

通報沒有提供具體內容，不知「惡毒」、「反動」到

什麼程度。

1976年「四・五」的時候，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樹上掛瓶子（樹小平），現在，大學生在宿舍裡摔瓶子（摔小平）。一樹一摔，一字之差，反映了人心向背。歷史是真正無情的。

民心不可欺（之三）

90年春節前後，整理89年內部文件和資料，發現391期的《情況匯編》（報社編輯的專供中央領導閱讀參考的不定期刊物），是記載朱鎔基（上海市長）同中央新聞單位駐上海記者的談話的。過去不大注意，現在細看，覺得很有意思，它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我們黨內某些人處事的原則。

朱鎔基說，現在（7月3日，「六．四」後一個月）上海北京都流傳一種說法：「上海不戒嚴，不派軍隊進城，這種做法比北京好。」

朱說，他在北京參加四中全會時，聽到不少表揚上海和他本人的話。他住的招待所（可能是京西賓館）中，也有不少人議論這件事。有一次，一個服務員特意送給他一碗麵條吃，特別熱情，說是表示支持上海的做法，並且讚揚他在電視裡的講話。朱對記者解釋說：言外之意是對北京的做法有所不滿。

朱說，他確實多次對上海市民說過：上海決不軍管，也不派軍隊進城。他收到不少市民來信，表示堅決反對軍管，反對部隊進城。他說，上海這樣做，是得到中央同意的；上海也不提「動亂」，而只提「騷亂」，也是中央同意的，為的是避免刺激群眾情緒。

據駐天津記者說，當時天津市委和新聞媒介也不提「反對動亂」，而只提「防止動亂」，意即天津並沒有動亂。

上海市不提「動亂」，怕提「動亂」刺激群眾，引起群眾更大的反抗，是中央同意的。江澤民馬上從上海市委書記提升為黨中央的總書記！那不正表示上海的做法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嗎？天津市不提「動亂」，李瑞環調中央升為政治局常委，當然也說明他百分之百的正確。而《人民日報》在報導中，在不送審的評論中，不提「動亂」，也是怕提「動亂」刺激群眾，引起群眾的更大不滿，則是百分之百的錯誤，輿論導向的錯誤！這不是很有意思的嗎？

上海根據不少市民來信，反對派軍隊進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北京市人民不同意戒嚴，不贊成軍隊進城，則成為反革命暴亂分子！這不是很有意思的嗎？一樣事情，一樣做法，一樣動機，但受到兩樣對待，作出兩樣截然不同的結論。這是多麼英明的中央！

90年3月初，我還看過一份內部材料，是上海同濟大學一位同志寫給國家教委的，反映該校學生自發組織三個沙龍的情況。

這三個沙龍，一個叫「無所謂沙龍」，一個叫「活著真沒意思沙龍」，一個叫「浪子沙龍」。從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參加者的心態。

寫信的人說，這些沙龍都以宿舍為基地，學校要禁止

也禁止不了，它們只是曲折地反映廣大學生對「六·四」後形勢的一種態度。他「只希望引起領導重視，但懇求領導千萬別把它們上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沙龍』。那樣做，不但顯然太勉強，且容易觸怒學生的不滿情緒」。

應當承認，這位同志比現在的一些決策者更瞭解學生的真實思想，因而頭腦也要清醒得多。

料到的和沒有料到的

在「六·四」後開展的清查運動中，有人在「幫助」我檢查時問道：「你對這場『動亂』的發生有思想準備嗎？」

那時有一本小冊子《驚心動魄的56天》，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的，每人發一本作為學習參考。這本書的第一部份「山雨欲來」，就是講「六·四」前的國內外思想動態的。當然，它是按照鄧小平的講話，即所謂大氣候小氣候的觀點編寫的，用以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按照編者的說法，這場驚心動魄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出現，是趙紫陽勾結海內外反動勢力（海外主要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海內主要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長期策劃的結果。向我提問「說明」我的人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希望我順著他們的思路進行檢查，與中央保持一致。

他們的願望落空了。

我生性不喜交遊，見少識淺，但由於工作關係，國內外出現的政治思想動向，特別是這本小冊子提到的，即所謂大氣候小氣候，還是略知一二的。

1988年下半年起，香港一些報刊陸續發表方勵之等人的文章談話。這些文章談話，大抵反映他們對經濟、政治改革的觀點。如9月2日的香港時報報導的方勵之談

話，說除共產黨外，大陸需加入反對黨，以發揮互相制衡作用。他認為，民間組織反對黨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形勢將會出現，並會成為一個趨勢，因為這是世界潮流。9月6日，這家報紙又發表方勵之的談大陸知識份子處境的文章，說「大陸知識份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

11月，蘭州大學哲學系三名學生貼出壁報，「呼喚自由，呼喚民主，呼喚人性的解放和發揚」。他們讚揚劉賓雁、劉曉波的不怕說真話，不迷信任何權威，勇於獨抒己見。

1989年伊始，海內外就不斷有要求釋放政治犯，特別是魏京生的呼聲。第一個發出這呼聲的是方勵之於1月6日致鄧小平的公開信中提出的。2月，冰心、嚴文井、馮亦代、邵燕祥、蕭乾、吳祖湘、湯一介、蘇紹智、王若水等32位知識份子聯合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在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實行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張顯揚、李洪林、包遵信、戈揚等42人也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

台灣、大陸、香港和海外56位知識份子發表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呼籲：一、中共應開放民辦刊物，政府部門不得干涉；二、保障結社自由，在非暴力前提下，各人民團體和非執政黨有權公開批評執政

黨的政策；三、民選區縣長，受選民的監督，對選民負責，只有原選區選民才有權改選和罷免他們；四、釋放政治囚犯，刪除刑法中關於「反革命罪」的條文，宣佈不得以思想意識和政治立場入人以罪；五、實行黨政分開，撤銷基層單位的專職黨務人員編制。

4月13日，胡耀邦逝世前二天，北京大學出現《新五四宣言——代發刊詞》，說「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已走過了太多的路口」，「現實還是把我們拋向了一個抉擇的路口：是返回到舊體制中去繼續忍受黑暗和愚昧，還是邁向一個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世界？」

宣言說：

> 現在至少我們已經可以認識到，做出這個抉擇權應當屬於大家，屬於人民！
>
> 70年前，中國漫長黑夜的天空開始閃現出普羅米修士的精靈，民主與科學——這一口號激蕩了千萬顆年輕的心。70年後，精靈在翱翔，呼喚仍在激蕩。要民主還是要專政？要科學還是要愚昧？要富強還是要落後？面對這個亙古的選擇，40年來坎坷風雨，迫使我們從麻木中清醒。撞擊就是希望！希望會迎來黎明的曙光！

平心而論，這些呼籲和要求並不過分，且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在胡耀邦逝世前夕，有人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太大

學對師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進行調查，發現學生中傾向於一黨多派、兩黨輪流執政和多黨制的佔50.2%；21.8%的人對社會主義持否定態度，12.3%的人根本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

有人把這股社會思潮和聲勢浩大的要求政治改革的群眾運動，說成是極少數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和海外「亡我之心不死」的勢力相勾結蠱惑起來的。如果不是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話，那也是把少數人的作用看得過重了，誇大了。任何能推動歷史前進的思潮，總是先由少數人提出，而後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共鳴，最後才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把上千上萬的群眾推上街頭，要求改革。少數人的思想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同，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思想反映了廣大群眾的願望和要求，否則，任你喊破嗓子群眾也不會理睬。

就拿要求民主和自由來說，拿到現在的美英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去，就不會有什麼市場，因為那裡這個問題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解決了。在中國就不同。儘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城鄉人民生活水準普遍提高，這是大家都很高興的。但是政治改革滯後，「左」的思想和封建意識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仍有很深的影響，官倒、權錢交易、權大於法等腐敗現象日甚一日，已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改革。特別是積極主張政治改革，發展民主的胡耀邦同志被迫辭職，不僅廣大知識份子，而且廣大黨

員、幹部、市民也都有不滿。年初，一位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負責人就說過：1986年學潮雖然平息下去了，但引發學潮的許多因素仍然存在，青年人的深層次思想——政治觀點和價值觀，遠沒有解決。今年正值「五四」70周年，法國大革命200周年，要求民主自由，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思潮，必然高漲。

我們《人民日報》編委會研究「五四」70周年宣傳計劃時，曾討論過趙紫陽等中央領導人的下述意見：一、「五四」以來，我們黨領導反封建主義做了空前的、大量的工作，成績很大，人際之間的平等觀念與過去比，有很大的進步，但反封建主義的任務仍然很重。二、不贊成新權威主義，不同意用強人政治領導國家，我們還是贊成民主制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和內容都應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完備。但要有個過程。宣傳時調子不能太高，不要提出當前和短期內做不到的要求。三、基層紀念「五四」仍以推進改革為中心，政治經濟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要滯後。四、要正確對待群眾的罷課罷工和遊行示威。不要以是否發生這些突發事件作為判斷形勢好壞的根據。我們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明明存在著許多矛盾，大家都躲進小樓成一統，兩耳不聞窗外事，全國鴉雀無聲，這決不是好兆頭。相反，大家議論紛紛，甚至上街遊行示威，這是人民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表現。因此，對群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固然不應推波助瀾，更不能堵和壓，只能因勢利導。

我們要學會在經常出現群眾遊行示威中繼續推進我們的改革。

對缺乏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體制的不滿情緒在增長，對種種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在增長，像1986年那種席捲全國的學潮，一定會借紀念「五四」70周年而興起的。這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我們所沒有料到的是，受到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愛戴的胡耀邦於4月15日突然辭世，學潮提前發生了。正如香港《明報》4月21日的一篇文章說的：中國知識份子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70周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裡扔了一根火柴。因此，我們對學潮的提前發生並不感到突然，對當時中央領導人提出的要正確引導，不要加劇矛盾，要避免正面衝突的方針，是衷心擁護的。我們的宣傳報導就是遵循這個方針開展的。

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確實有些事情是我（其他編委我不清楚）壓根兒沒有料到的。

第一個沒料到的是有人竟利用學潮，把它納入黨內鬥爭，作為奪權鬥爭的籌碼。「四・二六」社論把得到首都上百萬市民支持，得到全國青年和海外華人廣泛聲援的愛國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這既是為進行鎮壓製造輿論，也是為改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機構找藉口。

第二個沒料到的是，從上到下，從最高領導人到一般黨員，無不口口聲聲要依靠人民群眾，要為人民服務的

共產黨，竟用坦克、機關槍對付和平示威請願，要求民主改革的人民群眾。在中國歷史上，包括北洋軍伐、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沒有那個政府和政黨像共產黨和它領導的政府一樣，敢於如此瘋狂地鎮壓人民群眾。這也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

青年人的思考

在《料到的和沒有料到的》一文裡，我引用北京大學等五所高校師生的政治思想的調查材料說明書，1998年下半年起少數人就民主改革發表的談話、呼籲、聲明，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近日（96年5月）整理舊資料，發現1998年4月5日編印的《情況匯編》(187期），刊登的湖北省委高校工作委員會對該省各高校不同層次的師生的調查材料——部份師生對一些熱點問題的看法，其結論與北京地區五所高校的大體上是一致的。

對黨的領導的看法

調查表明，對黨組織和黨員的現狀不滿，在高校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情緒。大約有40.4%的學生表示：由於黨風不正，暫不想加入黨的組織。相當多的學生認為，由於黨風問題，黨的威信下降，共產黨已無政治優勢可言。

在青年教師和學生中，雖然多數人承認黨的領導是中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歷史性的選擇，這種選擇當時是對的，但現在面臨著新的選擇。他們認為，黨的權力過大而又缺乏制衡。我們的黨刊和黨內文件，只承認「黨內有腐敗現象」，但有些教師和學生都認為「共產黨腐敗了」。有的人說，一個再偉大的黨，若沒有對它的制約力量而單獨執政幾十年，不腐敗才怪哩！有的人甚至說：

「過去是共產黨好，國民黨壞；現在是國民黨好，共產黨壞！」

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

調查發現，社會主義的信念在部份青年教師和大學生中正在動搖。認為中國搞資本主義強大得更快，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無優劣之分的人在增加。

對社會主義能發展，能超過資本主義表示懷疑的人中，青年教師、文科學生、研究生的比例相對較高。有的說，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有了更多的社會主義因素，經濟繁榮，發展穩定，而社會主義國家正處在制度危機之中。40.3% 的學生認為，只要把生產力促上去就是好主義，不必先說這『主義』那『主義』。有的說：「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我們現在請來了抓老鼠的黑貓，卻硬說是白貓在抓老鼠。」

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

調查表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思想的地位正在下降。青年教師中多數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諸多學術派別中的一個派別」。他們不主張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認為一旦作為信仰，就會使它教條化。不少人認為，馬克思的理論經過列寧化、斯大林化、毛澤東化後已經走樣，被教條化，摻進了封建意識。他們主張「正本清源，還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

25% 的青年教師和學生認為：「中國現在應少說主

義，多幹實事，奢談主義於現代化無補。」

對民主自由的看法

絕大部份教師和學生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在十年改革中有了不少進步，但作為一種制度，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人的自由等權利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教師和學生關心的民主、自由，主要集中在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保障公民遊行、集會的權利；實現民主選舉等方面。有的教師說，「強求人們思想上保持一致，不允許『異端』的存在，勢必造成大批的奴才，窒息科學和創造，這是一種愚民政策」。有的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黨大於法的問題，實行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而不是現在形式上的分立」。

對學潮的同情普遍增加

不少教師反映，198五、1986年學潮時，教師都站在黨組織一邊，積極做勸阻工作，找學生談話。後來再發生學生貼大字報、集會時，教師則站在一邊觀望，不支持也不勸阻。近一段期間，青年教師對學潮的同情普遍增加，表示理解和支持，甚至鼓勵學生上街遊行，以求解決實際問題。

有的學生認為，「學潮雖然形式過激，但利大於弊，它打破了一些舊的腐朽的東西，對社會有啟發作用」。

「現在社會上的問題術多，積澱很深，正常的管道解

決不了，只有走非常道路。」

「老革命以及現在的當權派接受新事物比年輕人慢，而受傳統的束縛比年輕人多，新舊交替時期，新老力量必定發生衝突，衝一衝是必要的。我們現在擔心的不是有人鬧，而是沒有人鬧。有人鬧是好事，說明還有人關心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

中師大中文系一個學生講演：「知識份子地位低，教師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要採取一種手段來實現，如搞一場大的文化運動，像五四運動那樣，提高國民素質，提高國民對文化教育和知識的認識。為什麼聽說要給知識份子加工資，有的工人就可以罷工不幹，那我們能不能也採取一種手段來解決呢？」這時，下面的聽眾熱烈鼓掌。

調查表明，約有5%的學生認為，應該以貼大字報、上街遊行的方式參與改革。

我在這裡大量引用調查材料，只是想再一次說明：1989年中國大地上存在著以廣大青年學生為主要力量的要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全面改革，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客觀條件，即使沒有胡耀邦同志的猝然逝世，一場規模宏大的愛國民主群眾運動也會借紀念「五四」70周年而興起的。這是必然的。

他們要找出一條黑線

中央全會已經結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中央領導已誕生，對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的處分已公佈，對《人民日報》的「導向錯誤」也敲定了。作為一個黨員，我組織上擁護中央的決定，但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仍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用通俗的說法，就是組織服從，思想不通。

為什麼會發生中央指出的「導向錯誤」？

在8月以後的幾次檢查中，我說，在黨中央主要負責人——總書記和主管思想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犯了錯誤（按照中央全會的說法）的大背景下，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要完全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人民日報》的錯誤，編委有責任，但我要負主要責任。因為，如果不是我陸某人，而是別的副總編輯或總編輯值班編報，錯誤雖然不可避免，但錯誤的表現形式和嚴重程度是不同的。現在中央和一些讀者指出的錯誤及其嚴重程度，都有我個人的印記。

發生錯誤的主要原因，我說是過多地看學生和群眾的合理要求，對所謂「極少數極少數人」的操縱沒有像中央那樣看得嚴重，也沒有像鄧小平同志那樣，把這場鬥爭看作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在整個學潮期間，我憂心忡忡，怕這怕那，組織上表示

同意「四·二六」社論，實際上按照趙紫陽「五·四」講話組織報導。有人把錯誤歸結為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化的錯誤，我不敢苟同。

在這次清查運動中召開的思想檢查會議，一律定為「組織生活會」。因為是組織生活會，別人對我的批評、質問，就只可叫做「互相幫助」，而不能叫做「批判」。這不能不說是出點子的人的高明處。

在「幫助」我的發言者中，新任總編輯邵華澤說，我的思想深處是認為趙紫陽正確，鄧小平和黨中央錯了，所以才按照趙的講話精神組織報導。

不能說邵的分析不對。在我的檢查裡有這個意思：趙紫陽「五·四」講話學生能接受，也符合我的想法，如果不是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派人到學校，通過黨組織散佈趙的講話不代表黨中央等等，那麼學生已宣佈的復課聲明是會變成事實的。當然，我不想，也不可能把話說得那樣明白。所以對邵的「幫助」和對其他人的「幫助」一樣，我只聽不回答。

最可笑的是新任社長高狄和一位以整人著稱的王澤民，離休幹部，文革前任報社機關黨委書記，離休前任國內政治部主任，外號叫「王半仙」的，為了證明我們編委跟趙紫陽的關係非同一般，說我們編委聽到趙紫陽下台後抱頭痛哭，老錢當時正在食堂吃飯，飯也吃不下去，一路哭著回辦公室。他們還追問：派去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記者為什麼用一個聯絡暗號——「闌珊處」？「闌

珊處」出自辛棄疾《青玉案·元夕》的最後一句：「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真不愧是知識份子，聯絡暗號也是文縐縐的。

對第一個問題，我當時就作解釋。趙紫陽的下台雖然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我們甚至認為是冤案，但決沒有抱頭痛哭之事。至於第二個問題——聯絡暗號，我聽了大吃一驚。為什麼提這麼個離奇的問題？「六·四」的時候，編委裡李仁臣分工負責記者採訪工作，會後我問他知不知道「闌珊處」這個聯絡暗號。他說，這純粹是瞎猜！我們派往天安門廣場的記者告訴家裡，有急事要找他們，可以到紀念碑第三層欄柵附近去找，並不是借辛棄疾詞取個聯絡暗號，好像做什麼不可告人的事似的。

我想起來了，接連幾天一些同志反映：有人認為編委成員跟趙紫陽之間，除了領導與被領導的工作關係外，還有一條秘密聯繫的黑線。《驚心動魄的56天》那本小冊子，不就是認定這場風波是趙紫陽勾結海外反革命勢力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挑起來的嗎？趙紫陽又是怎麼樣勾結的呢？他們的「大膽假設」是：中南海（趙紫陽）——《人民日報》——天安門廣場極少數極少數分子，在他們的心目中，我們派到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記者，就是充當趙紫陽與極少數極少數分子之間的聯絡員的，所以才有「闌珊處」這個聯絡暗號！他們那麼熱衷追查聯絡暗號，原來是想從我們身上找到一個缺口，挖出從趙紫陽到《人民日報》編委會到天安門廣場上極少數極

少數分子間的一條大黑線，然後一網打盡！

他們不甘心追查聯絡暗號的圖謀落空，大約過了兩個月，即10月27日，中央關於我和余煥春停職檢查的決定下達以後，高狄鄭重其事地對我說：看來，宣傳報導問題編委會的認識是一致的，但看不出指導思想的來龍去脈。他要求我檢查自己的錯誤外，也應講一講有關人的問題。聽話聽音。他說的有關人，主要有二位。一位是社長錢李仁，他經常列席中央的會議，這次又不承認有什麼導向錯誤。另一位是保育鈞，他在文教部工作時，與鮑彤（當時他主要工作在國家科委）有過工作來往。在這次學潮中，他負責行政後勤工作，所謂報紙錯誤與他無關。清查運動開始時，可能是出於團結的考慮，曾經吸收他參加報社清查領導小組，不久，他的一位人大同學揭發他與鮑彤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的清查領導小組的工作便被撤銷了。高狄談話表明，他們還念念不忘那條黑線！

他們心目中的這條黑線，事關黨中央高層的政治鬥爭，實在太重要了。12月13日發下來本報編印的《內部情況》（66期）《動亂前後中央對報紙宣傳的指示和意見》，收集了從4月18日到6月9日的所謂指示，連國家教委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對報紙的意見都收集進去了，唯獨不收趙紫陽出訪朝鮮前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立足疏導，避免激化矛盾和正面衝突。趙的這個意見，是他們不知道，還是故意視而不見？我看是後

者。

因為這個指示，我一再講過，並一再說這是我們編委會組織報導的根據。我一再跟他們說這些，意在說明《人民日報》的宣傳報導，與中央領導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們如果將趙的這個指示編進去了，就不能在群眾中說我們編委是千方百計與中央對抗的了！也就不能追查所謂《人民日報》編委會與趙紫陽的黑線了！就不能動員群眾揭發編委會的陰謀了！他們用心之良苦可見。

但是，正如常言說的：不敢正視事實，搞小動作，決不是有力量的表現。

《人民日報》何時以批評為主？

在「六·四」以後的清查運動中，涉及的人和事大大越出了「六·四」的範圍。有人不但要追查所謂中南海——《人民日報》——天安門廣場的黑線，還要追查所謂「導向錯誤」的思想根源——人民性的影響。

當時印發過一份胡喬木同報社新領導的談話紀錄，詳細內容記不清了，但大意是忘不了的。因為胡喬木說，《人民日報》從粉碎「四人幫」，胡績偉重新領導《人民日報》起，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就與中央沒有保持一致，根源就是胡績偉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新聞觀點在作怪。人們都清楚「政治上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的分量有多重，因此這個談話在報社引起震動是很自然的。

這個談話對粉碎「四人幫」以來《人民日報》歷屆編委的評價，跟黨中央的評價是截然不同的。黨中央（經中央書記處討論）對《人民日報》歷屆編委工作，包括胡績偉辭去社長職務時對他的評價，都是很高的。這個談話也與胡喬木過去親自對報社同志（胡績偉同志也在場）說的「粉碎『四人幫』以來的《人民日報》是自創辦以來辦得最好的時期」的評價相矛盾。既然是辦得最好的時期，怎麼可能在政治上又與中央不保持一致呢？許多離退休的同志看了這個談話後都非常憤慨，表示要跟胡喬木辯論。繼胡績偉任社長、現為全國人大常委的

秦川同志，當面以中央歷次對《人民日報》的評價來批駁胡喬木，並質問誰授權他來否定中央對《人民日報》工作的決定？胡喬木很狼狽，說《人民日報》印發的他的談話紀錄，沒有經他看過。



胡喬木批評《人民日報》「與中央不一致」，遭到反擊，狼狽不堪。

這個本來打算在運動後期供全報社學習，用以肅清所謂胡績偉思想影響的談話紀錄，不但很快被收回，而且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它，好像壓根兒沒有發生過似的。

但是，追查所謂「導向錯誤」與胡績偉的人民性思想的關係的想法，並沒有像談話紀錄那樣被收回，鎖在保險櫃裡。在9月間召開的一次有報社支部書記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上，高狄在部署下一步清查運動工作時，一再講《人民日報》過去以揭露黨的缺點錯誤為主，是胡績偉人民性新聞觀點的表現，今後非改變不可。又一個月以後的一次編委學習會上，高狄以五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依據，大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又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講到黨風和報紙宣傳。他認為我們國家和黨的領導層並不存在特殊化問題，社會上所說的特殊化等腐敗現象，完全是報刊宣傳不當造成的。當時《新華社》發過一則關於取消供中央領導人購買副食品的特供商店的新聞，說所謂特供，只是每戶

每月可以多買一斤半平價油。高狄以此為論據，批評《人民日報》過去以批評為主，刊登揭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的東西太多了，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他話裡有話：四、五月間群眾上街遊行示威，高呼反對腐敗，要求民主改革，完全是報紙的錯誤宣傳引發出來的。我們這些編委真正是罪該萬死！

《人民日報》1948年創刊至今四十餘載，哪一位領導說過宣傳報導以批評為主？哪一個時期的報紙以揭露社會陰暗面為主？以刊登批評稿件比較經常，影響比較大，至今仍為人們稱道的五十年代前期，也沒有人提出以批評為主，也沒有那一天的報紙以刊登揭露陰暗面的稿件為主。胡耀邦是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任總書記時說過，報紙宣傳報導，表揚八千，批評二千，即允許批評性稿件不要超過20%。即使如此寬容，批評稿的比例，別說20%，連5%，甚至1%沒有達到。如果不是存心把《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掛鉤，怎能得出《人民日報》宣傳報導以批評為主這樣的結論來呢？

有個叫《報告文學》的刊物，原歸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好像是「反自由化」以後，中央為了加強對它的領導，劃歸公安部領導。中央可能考慮到刊物上印上公安部出版不大好，故把出版單位改為《人民日報》出版社。我們認為，既然是《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我們就有責任把刊物辦好，但我們沒有那個能力和時間。我們正在給中央寫報告，請求讓《報告文學》與《人民日報》脫

鉤的時候發生了「六．四」。有些人便在這個刊物上大做文章。在一次編委會上，高狄硬把《報告文學》打成宣傳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刊物，一再指責它「老在封面登裸體照片」！事實上《報告文學》只是在一期的封底和裡頁登過二幅名家的人體油畫。已經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五四」宣傳新文化已七十年，文藝刊物刊登人體油畫，不應值得大驚小怪，更不應大加撻伐。有人故意歪曲誇大為「老登裸體照片」，為的也是把「六．四」前的《人民日報》編委會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掛起鉤來！

誰中傷胡喬木？

89年9月8日下午，編委會繼續給老范提意見，同時也給我和其他編委提意見。總起來說，無非是版面上錯誤，實質上是立場錯誤——在黨內，站在趙紫陽一邊；在社會上，站在一小撮陰謀分子一邊。這是認識上的錯誤導致政治錯誤，也導致組織上的錯誤，云云。編委會陸陸續續開了二個多月，這類意見聽得多了，既不感到新鮮，也沒有尖銳不尖銳之感了。

在這以前的一些會上，有人為了全盤否定歷屆編委會的工作，用一竿子橫掃一船人的戰術，說這幾年報社進來的研究生水準太低，派駐省市的記者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都不行。有一次，我忍不住當面給頂了回去。我說，我們報社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合辦的新聞研究生系的教師，都是首都新聞界很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編寫的教材，在全國新聞界，包括人民大學、復旦大學等新聞系，都是很有影響的，有的院校的新聞系教師還自願來進修。新聞系畢業生，在報社的已經成為各部門的業務骨幹。派駐省市的記者，水準雖參差不齊，但總體上說，在中央各新聞單位派駐的記者中，我們的記者是受到同行敬重的。想不到在今天的會上，有人（這次清查運動的高參王澤民）不僅把研究生說得一錢不值，而且把他們說成是一群陰謀篡權分子！根據麼，一是研究生在一些請

願書上簽名，二是參加了遊行示威，三是研究生在採訪中，反映了各階層群眾的不同聲音。這些都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寫著的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跟陰謀篡權有什麼相干？

翟向東同志（原副總編輯、社務委員）的發言也令我吃驚，說報社有人公然中傷胡喬木同志，造謠說胡喬木83年來報社作檢討，傷心得痛哭流涕……。

胡喬木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工作，是《人民日報》的頂頭上司。有人竟敢公然中傷他，這還了得？所謂中傷胡喬木，指的是1983年10月30日和31日胡喬木在《人民日報》黨員幹部大會上的兩次講話。

1983年10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一項決定：同意胡績偉同志辭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請求，秦川同志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李莊同志任總編輯；決定將副總編輯王若水同志調出《人民日報》，暫不安排工作。10月30日，胡喬木和鄧力群（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到《人民日報》來，就是向報社黨員幹部宣佈這個決定的。

胡喬木親臨報社宣佈中央關於報社領導班子調整的決定是很正常的。當時相當多的黨員幹部感到不理解的，是胡喬木自稱受中央書記處的委託宣佈決定以後，作了很長的那個講話。胡在講話中，簡單地肯定《人民日報》每年都有進步，《人民日報》工作有很大成績，而這與

胡績偉和王若水的積極工作是分不開的以後，便歷數他們倆的錯誤——在四項基本原則上與黨中央長期沒有保持一致！

有根據嗎？根據就是胡績偉在中央黨校和報社記者會上的兩次內部講話中，說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那麼「中央服從誰？」「為什麼共產黨執政以後就要變？」「『四人幫』會不會捲土重來？」胡績偉只不過是從實踐中提出這些問題，供大家思考。這說明他是真正關心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可是，胡喬木卻上綱上線，說這是「散佈對黨的領導不信任的悲觀情緒」，是懷疑黨的領導，「是不道德的」，「這是有悖於今天做一個中國人的道德的」。這就是胡績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與黨中央沒有保持一致的證據！

王若水被指責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不與中央保持一致的根據是什麼呢？就是他為文為人道主義辯護，談異化，說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

胡喬木在這個一萬四千多字的長篇講話裡列舉胡績偉、王若水的一些論點，只不過是與胡喬木的觀點不一致而已。且不說這些論點是正確的，在人民真正享有思想言論自由的國度裡是根本不成為什麼問題的，就是在我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年代，在黨內，在社會上，對一些重大問題持有不同看法，也是很

正常的。如果沒有不同的看法，不論什麼問題一提出來就很一致，「輿論一律」，反倒是不正常的，黨和國家的命運是很令人擔心的。對於一位積極工作，並且把報紙辦得很有生氣，很受讀者歡迎的同志，只因提出一些與自己不同的意見，便給扣上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與中央不能保持一致的帽子，即打成「四反分子」(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比毛澤東當年提的「三反分子」還多一反。因此，這個講話使在座的黨員幹部為之震驚是很自然的。

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胡喬木，還有鄧力群陪同，過了不久又來到《人民日報》，在同一個會議室，對著同樣的黨員幹部發表講話。他不再批評任何人，而只是作檢討。他說，他昨天的講話，胡耀邦同志和中央書記處並沒有委託他；他對胡績偉、王若水的那番講話，也不代表中央；有人說他整人，打棍子，他並沒有整人的意思……。講話不長，但幾乎從頭到尾，都是痛哭流涕，好像很受委屈的樣子。《人民日報》創刊至今四十多年，除「文革」十年外，胡喬木從來以代表中央的名份和《人民日報》打交道，《人民日報》的幹部也一向把他看作上級領導。他對《人民日報》幹部講話，不知有多少次，都是發指示，批評這個那個的，很少聽到他作自我批評。如此先殺氣騰飛地批評人，不多久就來痛哭流涕作檢討，這還是大姑娘出嫁頭一回。在胡喬木的

一生中，這樣的事，恐怕也很難有第二次。

報社的同志都納悶，是什麼原因促使胡喬木這樣做？沒有官方的說法，只有同志們私下議論分析。我所接觸的人都認為，一定是有人聽講話以後，向中央領導報告了，中央領導人不同意胡喬木的觀點，更不同意他代表中央和胡耀邦講的那些話，要求他在同樣範圍內作檢查性講話，以消除不良影響。

指責有人中傷胡喬木的同志和我一樣，當時都不在北京。他正率領《人民日報》代表團訪問朝鮮，我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但根據錄音整理的胡喬木的講話稿，報社內部印發了，發給我的那份，我一直保存著。所謂痛哭流涕，是差不多我所接觸的人都是這麼描述的，而且在以後從未聽人說這不是事實，因此我是深信不疑的。「六·四」之後的清查運動中，有人翻出這個陳年舊賬，說什麼「中傷胡喬木」，不知是為了說明胡喬木當年的講話是正確的，還是為了說明胡績偉對《人民日報》的影響太深了？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總是中國的政治大氣候改變了的一種反映，也是每次政治運動必有的一種現象。

疑神疑鬼　草木皆兵

89年9月29日上午，有位原記者來談她的離休返聘事。閒談中，她說，她有個親戚在經貿部工作，該部傳達上級指示：國慶日不准穿純白或純黑的衣服。她這位親戚剛買一件黑色夾克，準備國慶穿的，聽了傳達，自認倒楣。

我把這個類似笑話的事告訴老范。他說，確實有規定：國慶日去天安門廣場跳舞的人，不得穿白色或黑色衣服，他說，是不是經貿部把這個規定擴大化了？

白色是中國傳統的喪服顏色，黑色是西方國家喪服的顏色。規定不准穿純白或純黑衣服，可能是出於一種考慮：國慶日應該是到處興高采烈，鶯歌燕舞的，幹麼要穿孝服？是不是借此來悼念「六・四」亡靈？借此來表示對黨和國家領導的抗議？海外不是有人號召：把今年10月1日作為國殤日嗎？不作硬性規定，大家都穿白色的或黑色的衣服到天安門廣場去，到大街上去，那還了得！

下午，在大院裡看見王惠平（原科教部副主任）。他說，在社科院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訴他，社科院宣佈：9月30日下午4點起淨辦公樓，該院在建國門裡的辦公樓，統統由戒嚴部隊負責安全；在節日期間，任何人不得擅

自打開窗子或亮燈，否則被打死要自己負責。

大余告：他有位朋友，從外地來北京辦事，明天就要離開北京。大余去旅館看他，問他國慶日就到了，為什麼不多住兩天，在北京玩一玩？他這位朋友說，北京市規定：國慶期間，外地來北京辦事的，或者路過北京的，只能呆在旅館裡，不准隨便出門。「誰願意整天呆在旅館裡受罪？」

真真的草木皆兵！

有人在「六．四」中幹了虧心事，對人民犯了罪，患了疑神疑鬼的恐懼症。人民共和國四十大慶，又想粉飾太平，要搞到處鶯歌燕舞，又怕群眾鬧事。可憐可憐！

太認真了是要吃虧的

89年10月5日，記者傳來李瑞環4日在天津市委會議上講話要點，其中很有值得認真思考的內容，因為它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最權威的詮釋。

一、李瑞環曾經想爭取胡啟立回天津當市長。他說，胡啟立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沒有多少事，只是在關鍵時刻，在小平同志處開會表態時，不贊成戒嚴、出兵，後來圍繞這一點有些毛病。但是，一來他與閻明復正在審查階段，出來工作一時不容易被理解；二來胡本人向他表示：「無此雄心壯志了」。

二、人大常委會委員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從全國人大到省市人大都如此。核心是爭取實際上的最高權力，不甘心在同級黨委領導下行使最高權力。動亂中要萬里回來，聯名要求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是想罷免李鵬。一些省市人大開會，選舉時否定省市委提出的許多候選人，等於公開宣佈省市委的決定沒有用。這個問題中央要解決。擬在適當時機開一個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原選區撤銷胡績偉（聯名要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倡議的發起者）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然後讓他回《人民日報》接受黨籍審查。胡績偉較為惡劣，與趙紫陽有不少聯繫。

三、經濟形勢較為嚴重，金融財政矛盾很大。治理整


李瑞環

頓任務艱巨，不少地方發不出工資。金融問題嚴重，至少要發300億票子，但又不能發這麼多。去年講，今年物價漲幅要明顯低於去年，現在已肯定至少上漲22%，而去年只有18%。為了穩定市場，採取保值儲蓄，平均利率22%，今年銀行存款5000億，80%是長期的。1991年存款可能達到1.1萬億，每年利息要2000億，加上外債460億美元，全國合計每人1000元債務。明年還外債70億美元。所以，現在的形勢，一是群眾氣大，二是債多。

李瑞環講的三個內容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二。近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只不過是提意見多一些，不大像以前那樣做馴服的橡皮圖章罷了，就被視為「自由化泛濫」，並認為核心是爭取成為實際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就是說，憲法上寫的全國（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全國的（省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實際上是決不能讓它成為真正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這就如憲法上寫的公民有信仰自由，有思想、言論自由，有結社和遊行示威自由的權利，也不過是說說而已，並不是真的要付之實施的，誰要是信以為真，要求真的實施，那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

對新規定的實行差額選舉，他們也是反對的，說是「等於公開宣佈省市委決定沒有用」。所謂讓群眾（人民）監督黨和政府，也完全是假的，也不過是說說而已。他們的真實思想是：監督是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首先你（人民代表）得服從我的領導，完全按照我的指示行事，連批評什麼，批評到什麼程度，也必須在我的允許的範圍之內；或者是保證我的一切意圖都得實現的前提下，才讓你來監督，讓你（人大及其常委會）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即一切聽從共產黨內少數決策人指揮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恐怕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精髓。

記得5月下旬，北京實行戒嚴以後，各省市區和軍區，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決策，有些編輯記者很不理解，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說，這沒有什麼不好理解的。在現有的省市一級幹部中，不乏真心要實行政治民主化的人，但在目前這個氣候下，誰還敢講真話？況且作為一級領導機關，特別是類似封疆大吏的省市一級領導，他們中有相當一部份是不贊成民主制度的，他們恨不得天天講「以階級鬥爭為綱」才稱心呢！你想，像「文革」前那樣，手裡拿著一根「階級鬥爭為綱」的鞭子，在群眾頭上幌來幌去，誰還敢不服服帖帖的？誰還敢爭民主自由？誰還敢給領導出難題？這樣的領導當得多舒服？

毛主席說過：世界上的事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是最講認真的。現在看，對毛主席的這句話，也不能太

認真了，特別是對毛主席和共產黨說的一些話，不能太認真了。誰要認真了是要吃虧的。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上，歷來講認真的知識份子大都是吃苦頭的，想不到現在仍不能完全擺脫這種影響！

外鬆內緊——解嚴

1990年1月9日

中午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俞成秀。他現在仍然是報社清查領導小組的成員，剛開完清查小組會回來。他說，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面上的運動如何搞。有關遊行、簽名（部份同志在給中央領導要求對話的信上簽名，部份同志在聲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信上簽名）的事已清查完了，大字報在戒嚴前夕總編室同志已經燒掉，沒法查，本來不打算搞了。現在出現新情況，有位高級記者交出一套錄音帶。她為將來寫報告文學收集材料，把當時大字報的內容和簽名者姓名都錄了音，現在交出來了！今天的會就是研究這件事。到底什麼時候與大字報的起草人和簽名者見面，是春節前還是春節後？會上，多數人傾向於春節後，讓有關同志好好過個年。

為什麼現在交出錄音帶？是出於無奈，還是有所圖？

下午，機要室同志送來一份剛收到的文件，是關於解除北京戒嚴令的。具體日期還空著。老范說，可能在最近。我猜測，為了取悅於民，可能在春節前宣佈。大余、老范都認為，這個決定是與美國總統布殊達成的契默之一，是做給外國人看的，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因為文件說的明白，戒嚴部隊（解放軍）改穿警服，郊外部隊原封不動。故名為解嚴，實際上仍然

戒嚴。這一點，連機要室的同志也看出來了。

1月10日

晚上，正式宣佈從明晨起解除北京地區戒嚴令。這比我們預料的快。李鵬發表講話，報紙發社論，有點打腫臉充胖子的味道。這次解嚴，並非出於真正感到「安定」、「政局穩定」，因為內部文件稱「要提高警惕，要外鬆內緊」，而是逼於外國的壓力（乞求外資）。李鵬講話和社論一再吹牛如何穩定，這既騙不了國內群眾，也騙不了洋人。

1月12日

解除北京地區戒嚴令在國際上的反應果然不出所料。西方通訊社的記者本事相當高，在短短的新聞裡，不僅報導了中國官方的主要觀點，而且報導了中外不同的意見。

法新社記者援引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和分析家的話說，「這項舉動基本上是一個象徵的舉動。幾乎不表明中國領導人的態度軟化下來」。

《美聯社》說，「這種象徵性舉動看來是打算緩和外界對中國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批評和說服世界銀行和工業化國家恢復中國迫切需要的貸款」。

合眾社說，「這一舉動目的可能在於扭轉去年春季暴

力事件以來外國投資、貿易和旅遊大幅度下降的趨勢」。

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認為，「解除戒嚴與去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訪華有關……」。

美聯社記者在北京街頭採訪的幾個中國人說，「取消戒嚴是件好事，它將使學生們容易恢復抗議活動」。然而，在多數人看來，取不取消戒嚴令沒有什麼區別。一位年輕婦女說，「這對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什麼影響。當然，他們可能感到心情放鬆一些，知道戒嚴取消了，僅此而已」。

不管你如何挑剔，這些記者的報導給人印象是反映了不同的聲音，與我們的一味唱讚歌的宣傳，效果顯然是不一樣的。

誰代表中央？

1989年12月13日

《人民日報》編印的《內部情況》66期，《動亂前後中央對報紙宣傳的指示和意見》，收集了從4月18日到6月9日的所謂指示，連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的意見都收進去了，唯獨沒有將趙紫陽同志關於立足疏導，避免矛盾激化和正面衝突的指示收進去。

是高某人他們不知道有這個指示呢，還是故意視而不見？我看是後者。因為我曾經一再對他們講過這個指示。

趙紫陽的這個指示，是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之後，他出訪朝鮮之前講的，政治局常委都知道，北京市委和首都主要新聞單位都傳達了的。它是當時黨對方興未艾的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群眾愛國運動的方針，也是我們報紙宣傳報導的方針。

在總結胡耀邦同志逝世以來的宣傳報導工作的時候，在編委會開所謂組織生活會的時候，我反覆介紹趙紫陽的這個指示，反覆強調這是我們編委會組織宣傳報導的根據。我這樣做，意在說明《人民日報》對群眾運動的宣傳報導，與中央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高狄他們如果將趙紫陽的這個指示收進《動亂前後中央對報紙宣傳的指示和意見》裡，那麼他們就不能在報社群眾中，在會

上說我們是千方百計地與中央對抗的了。追查《人民日報》編委會與趙紫陽的黑關係，動員報社群眾揭發我們編委會的陰謀，一直是他們的追求，說不定還是他們來報社的目的，至今並沒有放棄。為了這個目的，他們不惜把何東昌、袁立本等阿貓阿狗的極左屁話冒充「中央」的意見，用心之苦可見一斑。

不過，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這些小動作中窺見他們內心深處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早在5月19日，北京戒嚴前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宣告趙紫陽靠邊站之前，他們就已不承認趙紫陽為黨中央總書記了！

誰是馬克思主義者

1990年1月6日

今天《人民日報》一版頭條位置刊登社論《領導權要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加上花邊，說明社論極其重要。

領導權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這個觀點並不新鮮，可以說是唱了幾十年的老調了。江澤民在最近召開的黨建研討會重新提起吧了。

既然是共產黨，並且是在全國執政的共產黨，領導權要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裡，是理所當然的。但從十月革命迄今七十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問題不在於叫喊，而在於由誰來判斷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是非馬克思主義者或反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這個問題好像解決了，在實踐上遠遠沒有解決。中國沒有解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解決。

實踐是，誰實際上掌握了最高權力，誰就是最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者，誰也就是是非的最後裁判者。毛主席在世時，所謂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就是百分之百忠於毛主席、擁護毛主席的人。在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毛主席說有相當多的一部份機關、學校、企業的領導權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是因為他看到越來越多的幹部對他推行「左」的一套有意見，要想利用紅衛兵把

他們從各級領導崗位上拉下來。林彪「忠」字唱得最動聽，「紅旗」舉得最高，故被封為毛澤東之下的最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被指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寫進黨章裡。「四人幫」橫行時，他們及其爪牙，因得到毛主席的賞識和撐腰，也成為最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四人幫」倒台，華國鋒上台，成為英明領袖，因而也就成為最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華國鋒下台，鄧小平上台，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中國最大的最權威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非他莫屬了。

所謂忠於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功勞很大（如果不是「最大」的話），很得群眾擁護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而是唯鄧小平之是聽的人。如江澤民，在上海任市委書記期間，按兵不動，坐失改革開放良機，受到上海群眾幹部的批評；如李鵬，任國家教委主任期間，思想僵化，阻撓教育改革，引起教育戰線廣大師生的不滿。這兩人因為在「六．四」的時候，堅決擁護鄧小平鎮壓群眾的愛國運動，便成為全國黨政的一把手，江澤民還被封為第三代領導核心。

至於各級領導，那怕你是「四人幫」餘孽，還是典型的風派，只要你「六．四」時擁護戒嚴，擁護「平暴」，把要求政治改革、反對腐敗的人民群眾臭罵一通，也就會有人封你為忠於馬克思主義者，官運亨通。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央，在地方，在我們報社，比比皆是。

反之，即使你工作很有成績，得到群眾擁護，但只要在「六·四」時對戒嚴、平暴，說個「不」字，或有點保留，那也被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而打入另冊！

以權力來區分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在學術領域也難避免。最明顯的例子是王若水為文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問題，胡喬木不同意這個觀點。這本來是學術之爭，孰是孰非，可以通過平等的公開的討論來解決，一時不能取得共識，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爭論歸爭論，朋友歸朋友，這是「五四」時知識份子對待學術爭論的態度。

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允許這樣。身為政治局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的胡喬木，雖然口上表示歡迎討論，實際上卻把對立面的觀點判為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把堅持己見的王若水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還借助鄧小平的權威，撤了王若水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最後「勸」王若水退出共產黨！

應該說，以權力來區分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我們中國的特產。從蘇聯算起，共產黨先後在十幾個國家執政，時間長的有七十多年，短的也有三四十年。但從歐洲到亞洲，社會主義的名聲都不大好，共產黨的威信也江河日下。有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脆弱得不需要很強大的反對派活動，群眾起來一鬧就土崩瓦解，如羅馬尼亞；有的群眾沒有鬧，只是實行公開的公

正的民主選舉，便敗下陣來，如波蘭。原因固然很多，可以寫一本書，但社會主義缺乏真正的民主，誰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經人民群眾認可的，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造謠和失真

1990年1月13日

看到一份內部材料，說北京戒嚴解除以後，戒嚴部隊的「駐地和任務不變」。宣佈解除戒嚴，主要是做給外國人看的，跟布殊的特使訪華有關，這又是一個證明。

今天《人民日報》一版刊登《還是老實些好》一文，既非本報評論員，亦非《今日談》或者《人民論壇》。文章比《今日談》長，約一千五百字，署名「甘為」。「甘為」者，俯首甘為孺子牛也，可見並非一般人物。

文章批評香港一家報紙著文說蘇曉康──「六·四」被政府通緝的作家乃中央黨校副校長蘇醒的兒子，蘇醒受兒子牽連丟了官。文章說這是造謠，是政治墮落的表現。

香港某報把蘇曉康和蘇醒連在一起，肯定是錯的，批評它也是對的。但該報為什麼搞錯了？原因恐怕比較複雜。是有意，也可能是無意，不過是屬於道聽塗說一類，因無法核對所致。一家嚴肅的報紙，根據道聽塗說寫報導，是不可取的。不過，一下子就上綱到「政治上墮落」，也很難使人信服，總感到有點「文革」遺風的味道。

列寧確實說過，不敢講真話，故意說謊，是政治上墮落的一種表現。但「失真」，即與實際情況不完全一致，

與「造謠」還是不能劃等號的；即使是有意不講真話，也不一定等於造謠。

過去，在「左」的路線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人人自危，不知有多少老實人因講真話而招致無窮災難。在這種政治氣候下，人民群眾在公開場合，往往不願也不敢講心裡話。這種講話「失真」，是出於自我保衛，是隨處可見的。正直的政治家，真正關心人民群眾疾苦的政治家，作家，新聞記者，誰說這些不講真話的人是「政治上墮落」？別說群眾，就是領導幹部，而且是不一般的領導幹部，在特定情況下不講真話，也是屢見不鮮的。

當然，有一種情況例外。明明經濟生活中困難很多，卻睜著眼睛說：「形勢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大好」！又如東歐，特別是羅馬尼亞的事變，在一些大學生和軍隊中的反應，當局害怕得要命，卻公開聲言「政局穩定」云云。如此騙人騙己，如果有人給扣個「政治上墮落」的帽子，倒是很合適的。

答考察組問

1990年1月18日

中央派來幹部考察組，不知什麼時候到報社的。應約，今天上午與他們談話。

從他們的提問看，他們很想瞭解在「動亂」期間編委會是如何討論宣傳報導問題的，特別是每人的態度、言行。聽話聽音，他們是要我揭發別人。

我說，我們編委會討論問題，包括宣傳報導問題，每次都有文字紀要。這些紀要都是大家意見的產物。至於每人說的什麼話，我也記不得了，要瞭解最好分別找他們。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編委討論問題，向來是暢所欲言，意見都比較一致，從來沒有意氣用事，針鋒相對，爭持不下的。有些問題在討論中，有不同意見而又一時統一不了的，錢李仁同志從不以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一般都是暫時放下，不作決定。

他們問：5月18日報紙刊登聲援學生的新聞那麼多，兩塊版，編委會是如何討論決定的？

這個問題一直是清查的重點。高狄等人一直想從這裡找出什麼陰謀來。對這個問題，我也不知講了多少回，他們就是不相信。

我說，我們編委會沒有討論，連編前會也不會討論具體版面安排。每天的編前會只大致決定什麼新聞重要，

應該優先考慮；什麼新聞不重要，可以不用。至於如何用，用多少版面，那是晚上夜班編輯和值班副總編輯的事。5月17日我值班，18日報紙有什麼問題，由我負責，與別的編委無關。我找出5月份《人民日報》縮微合訂本，打開18日的報紙給他們看。我說，工會、青年團、婦聯、文聯、作協，都是黨中央直接領導的群眾組織，各民主黨派也是在我們黨領導下參政議政的，他們都發了聲明。這些聲明並不是一味聲援學生的，而是同時也勸學生撤回學校，希望黨和政府領導人和學生對話，緩和矛盾。當時我們沒有接到中央哪一位領導同志指示不讓登這些聲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們處在我的地位，你們怎麼辦？除非你們不贊成中央關於要緩和矛盾，避免正面衝突的指示，或者當時就知道後來所採取的戒嚴、鎮壓的措施，我想你們也不會有別的選擇。

我當時根本沒料到5月20日以後中央所採取的措施，直到現在仍然認為要緩和矛盾，避免正面衝突的方針是對的。我們認為，這些聲明跟當時中央的方針是一致的，既然中央沒有指示不讓登，我們就沒有理由不予發表。這些聲明都發表，不就要二塊版了嗎？

他們問：中央要登孫巨的信（6月4日），你們怎麼看？為什麼要求登全文，恢復中央刪去的兩處？

我說，當時我並不認為孫巨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我承認他是一家之言，因為我們收到更多的是支援、讚揚報紙的來信和電話。我認為全文發表孫巨的信，包括中央

刪去的要求改組報社領導班子的內容，不但無損《人民日報》在讀者中的威信，而且相反，會提高《人民日報》的聲譽。

他們問：對1986年、1987年處理劉賓雁（開除黨籍）、王若水（勸退出黨）有什麼意見？

我說，86年87年我兼任中紀委駐《人民日報》社紀檢組組長，執行中央的決定是我經手的。第一、作為一級組織，我們是堅決執行中央決定的；第二、我至今仍認為那樣的處理不妥。

先說劉賓雁。劉賓雁對黨內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嫉惡如仇，經常以報告文學的形式進行揭露，這不只要有正義感，而且需要勇氣，因而在讀者中頗有影響。在作協選舉領導機構的時候，在當選的諸多副主席中，他獲得的選票僅次於巴金。這恐怕與他敢於同不正之風作鬥爭有關。他也有缺點錯誤，我們收到一些來信，接待過一些來訪，批評他的某些作品（報導）的一些情節不夠真實，或者是誇大了缺點，或者是對某人的批評錯了，等等。對此，我們報社領導找過他談話，批評過他，希望他正確看待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寫批評稿時要謹慎小心。但這次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主要的依據不是他文章，而是他在報社外面的講演、談話，以及和某某人共同發起舉辦反右派鬥爭30周年學術座談會等活動。這些，我們事先完全不知道。他的這些講話和活動的是非，暫且不談。即使是錯誤的，我們黨的規矩，是允許黨員犯錯

誤，允許改正錯誤，應該給劉賓雁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這也是黨員的一個權利。但中央卻一下子作出開除他黨籍的決定，不教而誅，這有悖於我們黨傳統的做法。

王若水，他講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有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講，在我們國內，有同意的，有反對的。胡喬木同志就是反對講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並公開與王若水進行論戰。贊成也罷，反對也罷，這本來是理論問題，學術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中央——主要是胡喬木同志硬把它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把王若水作為錯誤傾向的代表。即使這樣，幾年前就已處理了——把王若水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免除了，讓他提前離休了。到198六、87年，王若水沒有什麼錯誤，中央硬作出決定勸他退黨，如不聽勸退，就除名。說他是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積極分子，可什麼根據也沒有。中央可能是吸取處理劉賓雁黨籍時遭到基層黨組織黨員抵制的教訓，這次直接給我們下達紅頭文件，不管基層的黨員思想通不通，都必須執行。如此處理一個黨員的黨籍，我從來沒有見過。

他們還問對錢李仁同志的看法。我說，老錢原則性很強，考慮問題周到，作風民主，正派公道。他領導我們進行新聞改革，「六・四」以後有人想否定我們的改革，但我至今仍然認為，我們新聞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老錢領導我們恢復了記者站的建設，結束了《人民日報》自1958年以來將近三十年沒有自己的省市記者站的歷史。

老錢帶頭脫產參加黨員訓練班學習，受到中直黨委表揚。我還針對現在報社出現的個人專斷的壞作風，強調老錢帶頭定的好規矩：編委成員在有關人、財、物（住房）等問題上，不准個人說了算。在人事方面，即使調進一個記者，也幾經派人考察，反覆討論；任免一個處長，也反覆徵求意見、考察，從不搞個人專斷。

罵政府與愛國

1989年9月19日《人民日報》國際版刊登法國《歐洲時報》的一篇社論：《謾罵自己國家最可鄙》。

文章是批評嚴家其、吾爾開希等人的。文章說，「一位旅法老華僑說得對：『人民用血汗養活了他們，他們卻逃到國外來咒罵自己的國家和合法政府，算哪家本領』？法國著名記者佩雷菲特在中國訪問時說：『我是反對派人士。不過，我從不在國外批評我國政府』。西方國家有識之士都懂得這個基本原則，在國外一定要維護國家的尊嚴。如果要談國格、人格，在這個問題上最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國格和人格。」

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當然是重要的；一個行事和說話，也須顧及國格和人格，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應做有虧國格和人格的事。這是極對的。

但國家和政府是有區別的。政府要一屆一屆的更換，國家卻要長存下去。把兩者等同起來，合而為一，是朕即國家的封建專制帝王意識。用現代的眼光看，罵（批評）政府不等於罵國家，更不等於不愛國，不管在國內罵還是在國外罵。問題只是罵得對不對，有沒有道理，也就是該不該罵。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北洋軍伐把持的北京政

府，是合法的代表中國的政府，這在國內國外都是沒有異議的。但這個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幹著喪權辱國的勾當，人民批評它，罵它，是愛國的表現。在國內罵的是愛國，在國外的留學生和華僑罵的也是愛國。不但罵，而且進行推翻它的活動，如當時逃亡海外的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士。正直的歷史學家無不認為這些反北京政府的活動是進步的愛國的。

又如「九一八」以後的蔣介石把持的南京政府，也是當時國際上承認的唯一的中國政府，對日本的侵略行動採取不抵抗主義，卻傾全力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根據地，也遭到海內外進步力量的嚴厲批評。除了國民黨少數頑固派外，沒有人認為批評者是不愛國的。對當時在國外批評它的人，也沒有人說他們喪失了國格、人格。

同樣道理，對政府一味唱讚歌的也不一定是愛國。政府辦了好事，有利於民富國強，有利於提高中華民族在國際上的地位，為它唱讚歌是愛國的表現。政府辦了壞事，人民遭了殃，苦不堪言，它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你還一味為它唱讚歌，這不叫愛國，而叫為虎作倀，助紂為虐。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不是特殊呢？

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確實為中國人民辦了許多好事，得到人民的擁護。但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也不等於

國家，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也同樣辦了很多錯事。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文革」等不用說了，且說1989年的「六·四」，從全國調解放軍到北京，用坦克機關槍鎮壓要求反腐敗，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手無寸鐵的請願示威群眾，曝屍街頭，慘不忍睹。這是連北洋軍伐、蔣介石都不敢幹的大錯誤，大罪過。

毛澤東說，鎮壓學生運動的沒有好下場。你對人民犯了那麼大的罪，為什麼不能批評，不能罵？你濫用權力，剝奪人家的公民權利，不准人家在國內批評，要抓人家坐大牢，人家才不得不跑到國外去批評。

在國外批評政府和在國內批評政府一樣，為的都是推動政府改正錯誤，推動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看，這正是愛國的表現，是真正維護國格和有人格的表現。在對待「六·四」這個問題上，對共產黨和政府大唱讚歌的那些政客和無恥文人，才是愧對人民，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

如果《歐洲時報》的立論能成立，凡在國外罵自己的合法政府就是最可鄙、最沒有國格和人格的，那麼，該怎麼樣當年周恩來、鄧小平等一批革命家在法國的活動呢？該怎麼樣評價當年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在國外所從事的反對清政府的活動呢？難道他們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現在有一種傾向：只要是幫共產黨和政府說好話的，

都歡迎，拍手叫好，並用以打擊持不同政見者，而不管這些文章、談話的立論是否站得住，有無說服力？

這也是政治腐敗的一種表現。

蒼白的理論

89年9月21日《人民日報》六版刊登一篇長理論文章，題目叫《社會主義的共和國是顛覆不了的——評嚴家其的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

這篇文章與時下的所謂批判性文章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它力圖想說一些道理，避免簡單上綱上線和謾罵。但因為作者不敢正視中國的現實，所以文章的效果跟時下的「批判文章」相比也好不了多少。

嚴家其指出：「現在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封建專制政體實質上沒有多大差別，國家的最高權力最後集中於一人之手，不容許任何人、任何機構分割」，「最高權力的繼承是非程式的」。

文章是怎樣反駁嚴家其的呢？它抬出了憲法和黨章，說明國家的最高權力在全國人大，共產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最高領導人也只有一票……。的確，我們的憲法和黨章是相當完備的，其紙面價值是可以用來誇耀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但是，除非是弱智或小學生，誰會相信我們的憲法和黨章會百分之百地實行呢？

就以各級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來說，我手頭有一份《情況匯編》(89年4月27日）刊載山西省一些領導幹部對省「兩會」(人大和政協）的議論。一位省領導幹部說：省長的工作報告，是供登報的，該說的沒有說清，眾人

知道的又年年說一遍，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人大最高權力機關、立法機關，但是真正關係全省命運的大決策，由省委常委定。

另一位省級領導幹部也說：「『兩會』開完，還要留下地市委負責人再開兩天會，談一些具體問題。這事正好說明我們的政治體制非改革不可。」

這個內部情況是我們駐省記者寫的，百分之百可靠。憲法上寫的最高權力機關的人大，只不過是黨委的橡皮圖章而已。不僅山西省如此，全國各省市也莫不如此。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全國人大是不是好一些？不。別的不說，就說89年4至5月間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請願示威時，部份全國人大常委（已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緊急倡議召開臨時常委會，討論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這本來是憲法規定的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權利，開成開不成，會議的結果如何，都是無可指責的。

但是，不是有權威人士發話，說要求把人大變成真正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嗎？不僅說說而已，而且是照此辦理的。《人民日報》的老社長胡績偉同志，因為是這個倡議的發起人之一，就被指責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並被按照憲法規定，先由四川省人大撤銷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後由全國人大撤銷他的常委職務！

至於黨章規定的民主集中制有多少民主，建國幾十年

的實踐也明擺著。毛澤東不顧多數人反對，發動史無前例的「文革」，一句話就可以把黨的第二把手、國家主席打入地獄；鄧小平兩次繞過中央委員會更換黨的總書記（撤換趙紫陽時，他連中央委員也不是，只是掌握軍隊的垂簾聽政的現代慈禧），這些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是引起黨內外強烈不滿的事實。

這些事實說明，憲法和黨章如果還有什麼用的話，那只是用來約束群眾的，是寫給別人看的。它們不能約束握有最高實權的人，就如歷代封建王朝的法律約束皇帝老兒一樣。

不敢正視現實的理論是蒼白無力的，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

形式主義不搞也難

89年10月4日

國慶日加星期日，共三天假。今天剛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下午開編委會學習江澤民的報告。這我早就料到，因為這兩天看電視，知道北京市委和一些省委，決定國慶日不休息，抓緊學習了，我估計報社不會自甘落後。學習最高指示不過夜，「文革」中用以表忠心的那一套現在復活了。

中宣部通知，要求學習不要走形式主義，我們報社的評論也這麼要求。但是既然學習「不過夜」，不想滑入形式主義也很難。

一種人，學習主要是給上面看自己如何積極主動，不能不搞形式主義。

一種人，本來並沒有興趣學，不想學，但形勢逼著非學不可，就只好隨大流，裝出很好學的樣子，因而也不能不搞形式主義。

要人家不搞形式主義，首先是報告有內容，有新意，確實能回答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疑問，吸引人。其次是堅持自覺自願原則，不願學者實行「三不主義」。沒有這兩條，要求大家一周學幾次，人人發言，談體會，沒話找話，那不搞形式主義才怪哩！

在今天的學習會上，有三個人發言。一個是東拉西扯，硬拉趙紫陽來批一通，就是做給上面看的，這是個聰明人。一個是重複報告的話，顯出一副不講不行的被動相。一個是真想發表一些高見，說怎樣堅持學馬列理論，怎樣堅持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宣傳……，可惜，他的馬列和社會主義，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貨色。這樣的貨色，報刊可以連篇累牘地登，可以當作往上爬的敲門磚，但要用來回答現在人們心中普遍存在的種種疑問，那真是難矣哉！

《人民日報》編委會是個省部級的中央直屬單位的領導班子，學習尚且如此，遑論基層單位！

要求只有一條——齊奧塞斯庫政府下台

1989年12月22日

據外電和《新華社》報導，羅馬尼亞西部市城蒂米什瓦拉繼續發生群眾反對政府的遊行示威。

法新社引匈牙利電視台20日晚間消息說，駐守蒂市的羅軍隊和警察在當天中午已撤到離市區約20公里的兵營中。目擊者說，當天參加示威活動的人估計將近10萬（該市人口為35萬）。蒂市市長要求示威群眾成立一個委員會，提出他們的具體要求。示威者稱，他們的要求只有一條，就是「要齊奧塞斯庫政府下台」。蘇聯《真理報》詳盡地報導了群眾示威情況，說「蒂市公民們喊出了激進的政治口號，其目的是要盡快改變現有國家秩序」。

很明顯，羅馬尼亞群眾的行動，也是席捲東歐的民主化和改革潮流的一部份。

可是，我們今天是如何報導的呢？《新華社》只摘發齊奧塞斯庫的一項呼籲全國團結的命令。把數以萬計的群眾要求改革和民主的行動，說成是「發生了恐怖主義行動」，「幾個流氓團夥尋釁鬧事，攻擊了一些國家機關，搗毀和搶劫了一些建築物、商店、公共設施」。

齊奧塞斯庫真不愧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同

志。他的呼籲同半年前響徹中國上空的公告、聲明多麼相似！《新華社》精心編發的新聞多少也反映了我們的某些人的心態。

23日，星期六。九點上班，在二樓樓梯口，外事局高福源同志告訴我：《美國之音》廣播，齊奧塞斯庫垮台了！我告訴老范和大余，他們都說知道了。

大余說，《美國之音》有詳細報導。說22日齊奧塞斯庫召集群眾大會，本來是想爭取支持他對遊行示威群眾採取鎮壓措施的，沒想到卻變成了反對他獨裁統治的大會。他講話沒多久，就被群眾噓聲打斷。

老范說，聽說羅馬尼亞國防部部長自殺了；齊的兒子指揮警察鎮壓群眾，當場被激怒的群眾打死；齊奧塞斯庫夫婦想乘直升飛機逃走也沒逃得了。

我國古代學者荀子把人民群眾比做水，把統治者比做舟，警告統治者：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羅馬尼亞的現實又一次證明了這個真理。

對這麼個大新聞，全世界稍為有名的報紙都登頭版頭條的大新聞，我們中國新聞媒介卻隻字不提。到了晚上電視新聞聯播，才報導說反對政府的群眾示威還在繼續，發生了武裝衝突，齊奧塞斯庫不知去向。這比外國，包括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報導，整整晚了一天。後來看《參考資料》，知道並不是《新華社》駐羅馬尼亞記者不報導，記者是寫了比較客觀的報導的，所以不發，是北京決定的。可能是想封鎖，但封鎖不了。想封鎖也有道理，

因為前幾天，我們還不斷地報導齊奧塞斯庫如何堅持社會主義，並引為同調，誰料到不轉踵群眾起來一鬧就垮台了！如實報導，會不會引起國內「不滿意的人」的連鎖反應？

去年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歸來，我說過，南斯拉夫新聞媒介什麼聲音都登，包括叫聯邦政府下台的聲音。黨中央和議會開會，任何人的發言都可以登，表決新聞不只講總的結果，還報導了誰投了反對票，誰棄權。總之是很透明的。

羅馬尼亞則什麼都封鎖，不讓外國人進企業與職工接觸，不讓外國人與國內人民接觸，防民如防洪水猛獸。表面上看，好像羅馬尼亞很安定團結，實際上群眾對齊氏家庭的統治，對經濟生活——物資匱乏的不滿情緒隨處可見。

我們的記者告訴我，在某市舉辦的一個漫畫展覽會上，有一幅畫著齊奧塞斯庫帶領群眾走進一條死胡同的畫，引起群眾的廣泛共鳴。南斯拉夫表面看有點亂，但較能驚得起風浪的襲擊。羅馬尼亞搞輿論一律，是脆弱的表現，說不定那一天群眾起來一鬧就垮台。現在，果不出所料。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齊奧塞斯庫剛上台的時候，高舉反對蘇聯控制，捍衛民族利益的旗幟，很得群眾擁護。站穩腳跟之後，搞家族統治，搞個人崇拜，經濟又搞不好，盡吹牛，早已失掉人心。在這次席

捲蘇歐的改革、民主浪潮中垮台是不足怪的。相反，他不垮台倒是不可思議的。

對齊奧塞斯庫的下台，我們國內的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把他引為馬列主義同志、親密戰友的人，不知有何感想？

是腐敗還是滲透？

1998年12月25日

上班後打開報紙國際版，找有關羅馬尼亞的新聞。在很不顯眼的地方找到一則二欄題的新聞：羅馬尼亞支持齊奧塞斯庫的部隊和反對他的部隊之間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內展開激烈的巷戰，局勢仍然緊張。

這是一則讓讀者懸念的新聞。誰支持齊，誰反對齊，看新聞不得要領；消息也沒有告訴讀者，目前誰佔上風。

這兩天的消息都提到「救國陣線委員會」，但都沒有說它的政治綱領和背景。

丟開報紙找《參考要聞》和《參考資料》來看才清楚，原來支持齊奧塞斯庫的部隊是保安部隊，反對他的是站在人民一邊的國防部隊。局勢誠然仍緊張，但反對齊的部隊得到人民的擁護，已控制了全國的大部份地區。

救國陣線委員會於23日成立時，宣佈了十點綱領：取消一黨制，建立多黨制；在明年四月舉行自由選舉；實行三權分治；所有政治領導只能任職一屆，最多二屆，取消終身制；今後國名為「羅馬尼亞」（原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新憲法制訂委員會立即工作；以利潤和效益為標準對國民經濟進行改革，取消中央集權經濟；對農業進行改革，鼓勵農民的小生產；對外貿進行

調整，停止農產品和石油產品出口；履行所有國際義務。

我們對羅馬尼亞的報導，論客觀和詳述，非但不能與蘇聯東歐其他國家比，連阿爾巴尼亞也不如。這是有信心的表現，還是沒信心的表現？是相信群眾的表現，還是害怕群眾的表現？是馬克思主義的表現，還是假馬克思主義的表現？

12月27日

秘書室通知：下午二點在大禮堂傳達中央文件。通知沒有說明什麼文件，我猜想可能是昨天下午和老范談起的那個文件，即關於東歐形勢的電報，是用來統一全黨全國思想的。

我的猜想對了。

文件把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改革進程，一是歸因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所謂和平演變，二是歸因於戈爾巴喬夫的「出賣」──「新思維」的負面影響，三才歸因於各國經濟沒搞好，人民群眾有意見。這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傳下來的思維定勢，也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的標準觀點。不過，這些觀點能否說服人，能否起到統一思想的作用，就很難說了。因為把外因看得那麼重，就不是辯證唯物主義。況且這也不符合事實。如東德，那麼多群眾，不僅知識份子，還有相當多的工人農民，都對堅持社會主義那麼失望，難道說這也是帝國主義「滲透」的結果？羅馬尼亞，幾乎舉國上

下，從城市到農村，工農商學兵都起來反對齊氏的統治，連國防部部長也不聽他的指揮，這也是帝國主義「滲透」的？如果說是滲透的結果，那麼，為什麼你老被人家滲透，人家卻不怕你滲透？這又說明什麼呢？

文件的最後結論是：我們「六·四」對要求民主改革的群眾運動採取血腥鎮壓的辦法是最正確的。但人們不禁要問：齊奧塞斯庫不正是以我們為師，採取鎮壓的辦法嗎？為什麼在東歐諸國中，反而垮得最快，下場也最慘——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呢？

12月28日

據26日塔斯社記者報導，羅馬尼亞救國委員會主席揚·伊利埃斯庫談到羅這次事變的原因時說，這是齊奧塞斯庫政權所負歷史性責任之一，這個政權已經把國家引向一場最大限度的危機：經濟的、社會領域的、政治的和所有其他方面的危機。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緊張，這種緊張具有爆炸性。

伊利埃斯庫強調指出：這是一次由於內因而掀起的浪潮，它壓垮了一個政權；把發生的事說成是一場由某些勢力策劃的、並且得到國外支持的政變是不對的。

羅臨時政府總理彼得·羅曼在《塔斯社》的同一篇報導中也說：不是運動產生了政變，而是政變產生了運動。救國陣線是推翻齊奧塞斯庫以後成立的。沒有任何結構。這就是特點。

他說：人民群眾的憤怒是起義勝利的主要因素。軍隊只是支持了人民。人民，首先是青年人積極而廣泛的參與確定了起義的結局。這是青年人的勝利，是青年的一場革命。

今天還看到一份我國駐羅馬尼亞使館發回的秘密報告，說明他們25日在布加勒斯特街上與各界人士接觸的印象。他們總的印象是：人民群眾是興高采烈的，他們認為這是已盼望了好幾年的勝利。

這些事實說明，我們的一些領導人思想是多麼的僵化。他們總是抱著某些權威的片言隻字不放，總是從事物外部找變化的原因，說什麼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戈爾巴喬夫出賣，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等等，用以證明自己用軍隊鎮壓人民的正確，彷彿真理只有他們才能掌握。如果硬說有什麼和平演變，有什麼滲透的話，那麼，這種演變和滲透，人民是興高采烈的，是盼望了好幾年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與人民一樣興高采烈的嗎？

所謂和平演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其實是毛澤東為了維護個人獨裁和少數人專政而製造出來的理論，是阻止社會進步的說教。

難得的真實材料

1990年1月3日

現在是假話盛行的年代。

領導不說真話，為的是騙群眾，好像一切都很妙，如什麼「三穩定」呀，「形勢比預想的好」呀，等等。

群眾也不願說真話，為的是不想讓領導知道自己的真實思想，免得惹起麻煩。1957年有些老實人響應黨的號召，向黨交心，結果被打成右派，大家至今記憶猶新。在不得不表態的時候，只好說些領導願意聽的話，或者重複報紙和電視裡反覆說過的話。

在這樣「大氣候」下，要想瞭解群眾的真實思想真是太難了。今天看到的駐上海記者蕭關根寫的《上海學生思想狀況的調查》(《情況匯編》89年12月30日，816期）是近幾個月來少見的一份材料，它可以教人驚醒。

材料開頭是這樣寫的：

> 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所發起舉行了「1989年學潮反思學術研討會」，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和復旦大學調查了本校學生的思想狀況發現，經過學潮後的學習和反思，大學生表面上對學潮、動亂的看法有所改變，基本上承認了中央有關文件的思想，但深層的認識問題並未真正解決。

原文在「表面上」三字下面有重點號，和後面的「基本上承認了……」一起讀，它要告訴我們的東西太多了。

最有說服力的是上海大學國際商學院對大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的綜合調查材料。它反映大學生在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與1982年調查時比較，「有明顯的滑坡」。如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從1982年的60%下降到1989年的2.96%；對宗教信仰，卻從1982年的8%上升到1989年的41.8%；為個人成名成家及為了出國而學的比例，從1982年的20.6%上升1989年的69%，為祖國富強及為人民造福而學習的，則從72.1%下降到10%；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相信，從5.7%上升到58.2%。

材料還列舉了復旦大學學生普遍關心的六個問題：

一、「託福熱」繼續升溫。

二、對畢業分配感到迷惑不解。對大學畢業後一定要下基層尤其不滿。新聞系一位同學說：「今年（89年）畢業的一位北大中文系同學來信說，他分到廠裡後，主要工作是辦黑板報。國家培養四年，花了那麼多錢，就這麼浪費人才」。（這種浪費人才現象，在極左統治年代不足為奇，鄧小平曾尖銳地批評為「糟蹋聖賢」。沒想到在鄧的「四個堅持」下，又復活了！這恐怕是鄧小平所沒有料到的吧！）

三、對國家經濟走向持觀望態度。

四、對知識份子命運深感憂慮。

五、對經濟壓力無所適從。

六、以無聊為特徵的「世紀末心態」。這場風波過後，學生們既對專業學習缺乏興趣，也無心學外語；既不願多談國家大事、國際形勢，對自己個人前途似乎也不那麼關切，表現了一種「世紀末的心態」——無聊、空虛、無所事事。一些人寄望在玩樂中尋求刺激！

「哀莫大於心死」。經過這場「風波」，廣大青年學生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對共產黨領導，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關心之心「死」了。那些動輒乞靈於老一套的所謂政治思想工作的決策者，不知看了這份材料以後有何感想？那些一而再、再而三高唱「穩定」歌的人，不知看了這份材料以後有何感想？

不要有非分之想

1990年1月5日

今天的《人民日報》一版刊登該報社長高狄的大作《怎樣看待中國的「窮」》。

文章用意極清楚，窮字是打引號的，實際上是不承認中國的窮。作者聲稱「要用全面的和階級分析的觀點看問題」，意即誰說中國窮，美國富，資本主義國家富，便是片面看問題，便是缺乏階級分析。

這是一篇唱老調的典型文章。它的主要觀點、道理別人在一二年前就說過了。也像許多說教文章一樣，它有一個致命傷，就是不敢回答下面幾個問題：

你說中國人多，不好同其他國家比，但為什麼不拿北朝鮮與南朝鮮比，不拿東德與西德比，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呢？北朝鮮在日本統治時期為工業區，南朝鮮為農業區；北朝鮮人少，南朝鮮人多。東西德原來的經濟基礎不相上下，東德人少，西德人多。按照高狄文章的邏輯，應該是北朝鮮比南朝鮮富，東德比西德富，可是事實卻恰恰相反。南朝鮮已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北朝鮮卻窮得連肉也吃不上，飯也吃不飽；東德的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還算不錯的，但比西德也差一大截，所以這些年來，人們只聽說東德人往西德跑，而從沒聽

說西德人往東德跑。

還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日本經濟不如中國，中國自然資源豐富，日本幾乎沒有什麼資源，但到了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為何遠遠落在日本後面？

迴避這些問題，不承認現在的社會主義體制有缺陷，不承認我們過去長期的指導思想有錯誤，光說人多，光說過去被帝國主義侵略，給人扣片面性、不作階級分析的大帽子，那是不能說服人的。

不過讀這篇文章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的。這篇文章給人一個暗示，就是叫中國人民明白：中國十二億人，有飯吃有衣穿就應知足了，不應有其他非分之想。這篇文章還給我們暗示：為什麼現在，在領導人的講話中，在報刊的文章中，「和平演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聲音，掩蓋了改革開放的聲音？

有些大學生對現在中國經濟的走向持觀望態度，是頭腦清醒的表現。

不是孤立現象

1990年1月11日

9日的《參考資料》有三篇文章很值得一讀。

這三篇文章，一是法國《解放報》報導的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捕經過，二是法新社報導審訊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紀錄稿，三是路透社報導西方記者參觀住所見聞。

> 皮鞋後跟用鑽石鑲飾，所有房間都掛滿了各種名畫，擺滿貴重的裝飾品和鍍金的傢俱，自來水龍頭也鍍了金，每個房間都配有一台西德電視機，他能夠從電視機螢幕上看到法國影片或美國影片，在他的房間裡，放滿了大量的法國影片和美國影片……。

這就是西方記者看到的齊奧塞斯庫的生活。

在全國冬天缺乏必要的暖氣（《火花報》陪同我參觀的同志告訴我，因為缺少煤，城鄉居民冬天的室內溫度只能保持自來水管不凍裂的程度），人民連買土豆也要排長隊的羅馬尼亞，他們的領袖就是過著這樣比資產階級億萬富翁毫不遜色的奢侈生活，跟人民完全處於尖銳的對立地位。在封建的專制主義國家，產生這種領導人是毫不足怪的。齊奧塞斯庫卻是一個口口聲聲堅持馬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如在我國說四個堅持一樣），處

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領袖！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嗎？

可悲的、值得人們深省的是齊奧塞斯庫在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一個孤立現象。從蘇聯、東德等國家揭發出來的材料看（其實朝鮮以及我國某些領導人何曾不是這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子在一黨專政，黨又缺乏民主，對掌握權力，特別是掌握最高權力者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權大於法。誰的權大，誰就是馬列的化身，就能壟斷馬列的詮釋權，即使他錯了，例如毛澤東搞「三面紅旗」，明明是錯了，他還是馬列，所有的臣民，不管黨內黨外，也得對他三呼萬歲。這樣的一個制度，掌權的日子一長，不出現大大小小的齊奧塞斯庫才怪哩！

同一期的《參考資料》登的捷共主席阿達麥茨在捷共中央全會上的講話說：沒有真正的民主就不是社會主義；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就不會有充分的民主。這後半句話是否正確，估且不論它。用阿達麥茨的話來衡量，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有哪個是夠得上真正的社會主義？

胡耀邦的「不合時宜」思想

——紀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

(一)「中華魂」——胡耀邦活在人民心中

去年(編按:199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時候,首都所有報紙沒有刊登一篇文章悼念他。在刊物中,只有《炎黃春秋》發表鍾沛璋寫的一篇文章。在中國已故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受到這樣的冷遇,是非常罕見的。是胡耀邦不值得中國人民懷念嗎?我想不是。十年前,1989年4月15日,當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傳出後,自動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的人人山人海,大書「中華魂」的巨幅挽幛日夜飄揚在天安門廣場上,出殯那天,所過之處,十里長街,萬人空巷。這情這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50年歷史上,只有1976年周恩來總理的逝世可以相比。

1997年擁有「第二代領導核心」、「改革總設計師」殊榮的鄧小平逝世時,當局用錢收買人上街為他送行,群眾也沒有表現出像對胡耀邦那樣真切的哀悼之情。這樣受到人民群眾真心擁戴的人不配發悼念文章,還有什麼人可以配發呢?

是胡耀邦沒有恩於現在台上的領導者和資格更老一些、已退居二線的領導人嗎?我想也不是。在毛澤東「左」



被罷黜後的胡耀邦1988年攝於黃山

傾路線下一大批被鬥得半死不活的蒙冤受屈的老幹部，包括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等，正是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主持中央工作，開展真理標準討論，撥亂反正的時候才得以平反，重新回到領導崗位上的。現在台上的許多領導人，從中央各部到各省市，也是在胡耀邦主持工作的時候被發現和提拔起來的。我同意這個論斷：平反冤假錯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吳江：《十年的路》*）。正是胡耀邦領導的思想上政治上撥亂反正，組織上提拔一大批能人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才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樣有大功於黨和國家，有大功於人民的人尚

不配受惠的人寫文章悼念，世上還有什麼人配呢？

到底是為什麼？胡耀邦到底做了些什麼事，不見容於當世，使有權有勢者總想把他從億萬人民的心中抹掉？

我從1949年初從北京大學調到《人民日報》工作，一輩子沒離開過。五十年代，胡耀邦做團的工作，我在報社做財經報導，不關心青年團的工作，對胡耀邦一點也不瞭解。「文革」結束後，胡耀邦主持真理標準討論，撥亂反正，平反冤假案，先後任黨中央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秘書長、主席、總書記。我在報社，先是總編室副主任、主任，後是副總編輯。我直接面對面地聆聽胡耀邦的講話，也不過五六次，都在1986年。一次在1986年3月27日，中央剛剛調整完《人民日報》、中宣部、文化部的領導班子的時候。27日這一天，中央書記處把三個部門的領導人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開會。胡耀邦聽了文化部高占祥、中宣部朱厚澤談各部門的打算和困難後講了話。他勉勵大家對人對事都要一分為二，對老班子的工作和成員也要一分為二。要注意團結，注意克服自由主義，把風氣搞對頭。

會議快結束時，耀邦同志再次講話。他說，不要把打開新局面的希望寄託在少數人身上，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他就三個部門的工作重點講了自己的看法。談到《人民日報》工作，他講了二條。一是新聞要及時，要準確，以準確為前提，這是鼓舞作用。二是多發些短小精悍的評論，這是教育作用。講到處理人與人關係問題時，他

要求我們學習任弼時同志。他說，任弼時在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至今許多老同志都很懷念他，沒有一個人說他的壞話，這跟他既堅持原則，又善於團結同志，為人公道正派是分不開的。

他說，事情反覆考慮清楚了，要提倡敢想敢幹的精神。只要有90%的人擁護就幹，得罪少數人不要緊。你怕得罪少數人，就會得罪多數人，得罪我們的事業。當然，對得罪的少數人，也不要做絕了。比如對周而復，他犯了錯誤，開除了他的黨籍，還讓他當作家，當政協委員。這就是沒有做絕。

這一年的十一月，我列席過幾次書記處會議，也都是聽胡耀邦講話，沒有個人交流。但是由於《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是黨的耳目喉舌，我又處在負有一定責任的崗位上，所以或者是聽傳達，或者是閱讀各種內部文件，知道胡耀邦對各種工作的意見、指示，還是比較多的。我對他的為人和思想，就是這樣一點一點地瞭解的。比如說，粉碎「四人幫」不久，為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進而為改革開放掃清道路，針對當時黨的主席華國鋒等人提出的「兩個凡是」，胡耀邦在主持組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同時，也提出了「兩個凡是」（也叫「兩個不管」）——凡是搞錯了的，不管什麼人批的都要平反；凡是搞錯了的，不管什麼時候批的都要平反。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出了「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對鄧小平和胡耀

邦的二個都是針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我們曾經在很小範圍內議論過，認為鄧小平畢竟是黨內鬥爭經驗豐富，老謀深算，「要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可進可退，可攻可守，是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來的。

與鄧小平相比，胡耀邦就不如鄧小平那樣善於保護自己。他主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在平反冤假錯案中提的「兩個不管」，誰都明白是既衝著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的，也是針對毛澤東的錯誤，甚至包括鄧小平的一些錯誤（如反右派的錯誤就有鄧小平的一份）的。時機一到，凡是派隨時都可以把它上綱上線為反毛澤東思想，搞非毛化等等，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但也正因為這樣，我們都更加敬佩胡耀邦的捍衛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勇氣，更加敬佩他為人民為黨的利益而衝鋒陷陣的精神。

記得1987年春節前夕（1月28日），胡耀邦剛剛被迫辭職，黨內黨外許多人，包括不少高級幹部和知識份子都思想不通，剛任代總書記的趙紫陽把在京的中央黨政軍中副部長以上幹部三百多人找到懷仁堂談話，總的題目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講到胡耀邦辭職的原委時說，耀邦的辭職，並不是因為處理這次學潮有什麼問題。這次學潮是耀邦、啟立、李鵬和他共同處理的，沒有什麼問題。主要是這次學潮鬧這麼大，反映了這幾年政治思想領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力，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促使耀邦同志感到這幾年自己工作有問題才



胡耀邦(左)與趙紫陽都是改革開放的代表性人物，但兩位總書記先後都因與鄧小平意見不合被黜下台。

提出辭職的。

趙紫陽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以來，總感到有點問題，難以長期幹下去。這個感覺不是最近才有，恐怕有一年多了（萬里插話：二年了）。耀邦同志雖然沒上過中學，但克苦學習，讀很多書，學識淵博，幹勁很大。平反冤假錯案，撥亂反正，沒有他那個幹勁，那個魄力，是不可能的。但十二大以後，他的問題就慢慢暴露出來了。他對改革開放是堅定的，但對四個堅持，相當曖昧。

對這一點，小平同志直接批評過幾次，也間接請啟立、李鵬傳過話，勸耀邦同志「多講四項基本原則，下面的人都說你開明，所以你要多講四項基本原則」。耀邦同志聽不進去。「清污」出了些問題，書記處、國務院已經糾正了，解決了，耀邦同志還反覆講今後再不搞了，說「清除」不科學，無非是想把「清污」搞掉。他可能是那麼想的，認為只要堅持改革開放，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好解決。他常說，「讓實踐來檢驗」。有些搞自由化的人，把他作為保護傘，有恃無恐。因此，老人家們就考慮：我們國家，在老人家們不在時，耀邦同志能否長期領導下去？去年九月北戴河會議期間，中央常委幾位同志已商量，十三大時變動耀邦工作。

耀邦同志逝世後，因為訃告和悼詞裡都沒有提「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引起黨內外許多人的不滿，認為這樣評價胡耀邦不公平。為此，1989年4月25日，鄧小平有個講話。他在講話中，除了表示堅決反對動亂，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要怕外國人罵（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根據他的這個講話精神寫的）外，還說胡耀邦「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動搖的。反自由化的時候他下的台，現在還是那些人支持他」。又說，「對『兩個凡是』，耀邦同志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正因為這一點，不能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夠格。我也不夠格，《資本論》我沒讀完。」

看來，胡耀邦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人家們的主要分

岐是在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面，是在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走向方面。在這方面，胡耀邦到底說過什麼話，做過什麼事，使得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人家們不高興，不放心，非把他拉下來不可呢？

我翻閱了近十年的筆記。

（二）關於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

統一戰線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共產黨歷來重視對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團體的工作，是不用說的。當然，在不同歷史時期，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是不一樣的。1949年以前，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都處於非執政的地位，儘管共產黨擁有武裝力量，受到執政的國民黨另眼相看，但彼此是完全平等的，沒有高低上下之分，有的共產黨員也同時參加其他民主黨派，但一般是秘密的。1949年以後情況起了變化，共產黨變成了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就不再是平等的了，而變成了執政黨與參政黨、議政黨的關係，領導黨與被領導黨的關係。這在1949年4月下旬，百萬大軍剛渡長江，全國勝利在握的時候，毛澤東在和柳亞子先生的《七律》一詩裡講得明白：「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似富春江」。毛主席請柳亞子先生留在北京只是「觀魚」，而不是和共產黨一起「釣魚」或「結網捕魚」。將詩的語言翻譯成普通語言，就是柳

亞子先生這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能在共產黨領導下參政、議政，而不能像共產黨那樣謀取執政黨地位。不但原來已參加民主黨派的共產黨員逐漸成為民主黨派的領導成員，而且共產黨還不斷在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中接納黨員。這樣一來，各民主黨派不但在政治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而且內部事務也逐漸被共產黨員控制。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關係，變得與共青團、婦聯差不多了。這既有損於民主黨派在國際上的形象，也不利於發揮各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

胡耀邦在一次談到統一戰線工作時，提出要有步驟地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內部事務，共產黨不要干預人家的內部事務。為此，第一步，已在民主黨派內擔任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先辭去領導職務；第二步，共產黨員要退出民主黨派。

葉篤義先生在《雖九死其尤未悔》一書中說，1981年他得了結腸癌，作了切除手術，正在進行化療之際，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統戰部副部長代表統戰部與他談話，說由於他在民盟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批准入黨諸多不便。由此可見，胡耀邦這個讓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決定內部事務的意見，在實際工作中曾經得到貫徹。

對人民團體，如全國文聯、作家協會、婦聯、學聯等群眾組織的領導班子，過去都是先由黨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名單，交給這些組織選舉通過。這是共產黨實行領導的重要內容。這樣產生的領導班子，好像是群眾民主選

舉產生的，但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選舉產生的，參加選舉的人只能按照上級黨委指定的名單選，並不是選舉人自由意志的表現。胡耀邦想改變這種由黨包辦的情況，主張由各人民團體自己獨立自主決定內部事務，包括人事安排。1984年12月，中央書記處討論作家協會工作，與會的夏衍同志問：中宣部用七個月時間，搞了一個作協領導班子名單，這個名單是指令性的還是指導性的？胡耀邦說，是無效性的，永遠無效。要相信出席作協大會的代表們，誰當選就是誰。喬石同志同意胡耀邦的意見，說中央不提名單，誰當選後報中組部批即可。胡耀邦說，連批也不要，只要報個名單備案就行！

著名記者、作家劉賓雁常常以《人民日報》記者名義發表揭露黨內不正之風的特寫，受到廣大讀者的讚揚，同時也遭到一些省市領導人的非議，抓住文章的片言隻語，上綱上線告到中宣部，最後被鄧小平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為此，中央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堅決把他調出《人民日報》，不讓他當記者。在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選舉作協領導班子時，由於貫徹執行胡耀邦的黨組織不指定候選人名單，由與會代表自由選舉的指示，劉賓雁不但當選為作協副主席，而且獲得的選票之多，僅僅次於當今的中國文學泰斗巴金老人。這件事很得到作家、廣大知識份子的好評。

（三）對「精神污染」與其他

198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討論並通過

了整黨的決定。

這次會議是根據十二大的決定召開的。「文化大革命」雖然已結束七年，但它遺留下來的黨內思想、作風、組織不純和紀律鬆馳的問題還相當嚴重，妨礙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這次整黨的任務，在思想上，就是進一步把全黨的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上來，繼續克服各種「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在作風上，就是整頓和糾正各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反對和克服官僚主義；加強紀律性，改變黨組織對各種嚴重刑事罪犯打擊不力，對各種錯誤思想糾正不力的軟弱渙散狀況；在組織上，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子清理出來，開除出黨，重點是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造反起來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會議從開始到通過決議，都是圍繞整黨這個主題進行的。在已經通過整黨決定的閉幕式上，鄧小平起來講話，講二個問題。一個是「整黨不能走過場」，另一個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重點是第二個問題，主要是說理論和文藝戰線問題。（在鄧講話的前幾天，鄧力群已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這個講話的內容）

鄧小平也肯定粉碎「四人幫」以來理論和文藝戰線有很大成績，但又說「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他把一些同志談論人的價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異化，講民主，講不應以言定罪，講在一定的條件下黨性與人民性有矛盾等觀點都說成是精神污染。



鄧小平把人性論、人道主義等，都說成是「精神污染」。

在文學藝術方面，他把揭露和批評黨和社會生活中的不正之風，揭露「文革」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中的錯誤的作品，把文藝理論中的「表現自我」觀點、人性論、人道主義等，也都說成是精神污染。他還把社會上的種種消極現象、歪風邪氣、犯罪行為，以及一些人反社會主義的敵對活動等的產生，歸咎於思想戰線，說「不能低估思想戰線混亂造成的影響」。他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的主要負責人一定要重視理論界、文藝界以及整個思想戰線的情況和問題，如同在整黨中對於錯誤傾向和壞人壞事，必須採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樣，對於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也必須採取

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且一抓到底。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傳達以後，在黨內外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混亂。有的問：鄧小平聽了誰的匯報而得出思想戰線混亂嚴重的估計的？由於鄧小平的觀點基本上是胡喬木的觀點，所以有人說鄧小平上了胡喬木等「左」派的當。鄧的講話也給各級黨委出了難題。鄧的講話在通過整黨決定之後講的，會議沒有討論就閉幕了，整黨與思想戰線不搞精神污染，是一起進行呢，還是有先有後？熟先熟後？

有些「左」派聽了鄧小平的講話，就像得了令箭似的，一下子就在群眾中開展清除精神污染了。如當時北京市作出決定，穿喇叭褲、牛仔褲，留披肩髮的，都當作精神污染加以清除；為了防止精神污染，穿喇叭褲、牛仔褲的，留披肩髮的，不論男女，不論老少，都不得進出北京市委、市政府大門！再發展下去，就要組織紅衛兵上街剪行人的褲子和頭髮了。社會上籠罩著一股恐怖氣氛，人們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毛澤東說過，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來一次。從1977年到1983年，恰恰是七年！毛主席的話真靈！有人已經歡呼「兩個凡是萬歲」了。有人想起了五十年前魯迅先生那篇諷刺正人君子反對婦女穿裙子、穿短袖上衣的雜文，開玩笑說，如果魯迅活到現在，肯定躲不過「清污」這一關！

一年之後，即1984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習仲勳同志在會上說：「去年這個

時候，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決定整黨，但整黨不久，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搞清除精神污染，並且一下子搞到社會上去，有二十七天。後來中央把它扭轉過來了。那時，你們擔心，我們也擔心，國內外也擔心，怕『文革』又來了」。

二十七天！這個引起關注中國命運的海內外人士深深憂慮的二十七天！這個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高度警惕的二十七天！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同志在以後的日子裡一再講到它，用以提醒中國人民警惕「左」的思潮對改革開放的干擾。

1983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共產黨人決不能當「老好人」》，是耀邦同志出的題，並經他審定後發表的。原稿中有幾處提到「清除精神污染」，他審閱時統統刪去了。過了二天，即12月13日，耀邦同志和出席共青團中央二中全會的各省市區團負責人談話時，也談到了二十七天「清污」走樣的事。

他說，走樣子的實質是什麼？就是用「左」的觀點，或者守舊的觀點，用封建主義的觀點，去對待所謂精神污染。這是萬里同志提出來的，他提得很對。在前天的書記處會議上，楊尚昆同志說，我們很多事情一做起來，有些人就採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的那一套做法，造成很大損失。「文革」後撥亂反正，已經過了五年，怎麼還能搞「左」的東西，還有封建主義的東西？有封建主義思想的人，對現代，對現代世界各國的東西都看

不慣，還要把社會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回到封建秩序方面去。胡耀邦要求青年團少談些清除精神污染，多想些如何開創新局面。共青團中央全會通過的關於學習整黨文件的決定裡，也只要求團員提高覺悟，抵制精神污染，而不是號召參加清除精神污染。

在習仲勳同志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後不幾天，1984年12月20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會議，討論作協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有關問題。會議明確提出：「小平同志提出理論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自己工作的失誤主要表現為：第一，把這一口號擴大到全社會；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聲勢。因而出現了一些毛病，但很快就發現了，糾正了。這次會議就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關於社會主義創作自由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應保證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與自由，不能把創作自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起來。因此，這次會議也不要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還是提『肅清封建主義餘毒，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好。」

趙紫陽說，胡耀邦無非是想把「清污」反掉。是不是這樣，像我們這樣的人是很難斷定的。

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講話開了頭，批判白樺的電影《苦戀》，批判王若望、吳祖光、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水、周揚、胡績偉、阮銘等人的所謂錯誤思想就陸續在

不同範圍內開展了。鄧小平甚至指示要把王若望、吳祖光、劉賓雁等開除出黨。這些動輒給人上綱上線，企圖把人一棍子打死的所謂批判，遭到廣大知識份子的抵制，胡耀邦等一些高級領導人也是有看法的。

例如，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黨性和人民性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矛盾的觀點，鄧小平和胡喬木都批評說是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也就是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指責胡績偉自視比黨高明。胡耀邦沒有表態，只是對胡績偉說，決不會像毛澤東對待鄧拓那樣對待他。

中宣部編印了供批判用的胡績偉的材料（斷章取義的），並幾次從省市報紙調人到北京，住在賓館裡，讓他們撰寫批判胡績偉的文章。但這些被調來的人看了胡績偉的文章、講話後，覺得說得有道理，沒有什麼可指責的，都不肯昧著良心寫批判文章。所以，除了胡喬木自己出馬寫文章外，全國回應者寥寥無幾。一直到1989年「六·四」武裝鎮壓群眾之後，新上台的《人民日報》領導人，才找出幾個早已被撥亂反正的洪流衝得靠邊站的「四人幫」追隨者出來批胡績偉。

白樺的電影《苦戀》有一句著名的台詞：「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這本來是很正常的。本來嘛，要人們愛國，這個國家總有值得人們愛的地方才行。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把國家（祖國）比作母親，人民比作兒女，即使母親很窮很醜，作兒女的也不應嫌棄自己的母親，也要愛自己的母親。這話沒有錯。不過，作

為母親，不管是窮母親還是醜母親，必須愛護自己的兒女，對兒女有慈愛之心，兒女才不會嫌棄母親。「父慈子孝」，父要慈子才孝。做母親的，動不動就無緣無故地把兒女打得死去活來，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也沒有，兒女怎能愛得起來？就是這樣一部反映知識份子在「左」的 路線下的真實感受的電影，卻被鄧小平點名批判，作為自由化的典型。

就在《解放軍報》發表一系列文章批判《苦戀》的時候，在北京大學出現了一張小字報：《母親，為什麼你老愛打老九？》雖是小字報，文字也不多，但由於它反映了知識份子當時對批《苦戀》和所謂「清污」的心聲，所以很快就在京城內外傳開了。與之成鮮明對比的是《解放軍報》批《苦戀》很起勁，但全國報刊回應者無幾。作為黨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沒有發表一篇批判文章，全國作協機關報的文藝報與《人民日報》差不多。可能是考慮到鄧小平指示開展的批判太冷清了影響不好，中央書記處決定讓文藝報組織人寫一篇真正以理服人的評論，《人民日報》轉載後就結束批判。中央分工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和鄧力群，對《人民日報》如此對待《苦戀》的批判極為不滿，但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卻一再表揚《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處理得好。

在「清污」的同時，鄧小平還點名要處理王若望、吳祖光、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水等一批人。胡耀邦對這件事也有看法。他嚴格按照黨章辦事：要不要處分，給

什麼處分，由黨的基層組織——支部討論決定。直到胡耀邦被迫辭職，除了在中央黨校工作的阮銘被校長王震強迫開除出黨外，其他人都還留在黨內，有的人只是工作有所變動，如胡績偉辭去了《人民日報》社長職務，王若水被免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有些人很不滿意胡耀邦這樣處理。1986年鄧小平就質問：「為什麼仍把王若望、劉賓雁這些人留在黨內？」「左」派說胡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護傘」，指的就是對這些人的處理沒有完全按鄧小平的意見辦。

這樣指責胡耀邦是不公正的。胡耀邦是一位原則性很強，是非觀念很強的政治家。他是主張在人民內部通過開展積極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增強團結的。但他痛恨整人立威，以整人之術作為往上爬的手段，將自己的權威建立在他人的冤屈和痛苦之上的大批判或批評。他十分清楚在知識份子中對批評普遍存在著一種懼怕的逆反心理。這是過去幾十年在「左」的路線指導下開展錯誤的過火的批判造成的，不能怪知識份子。

他提出要在報刊中開展積極的批評。什麼是積極的批評呢？他說，不管批評什麼人，只要人家沒有觸犯刑律，在批評的時候，就要給他準備一把梯子，讓他在適當的時候下來（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所以，這種批評，一是與人為善的；二是實事求是的，充分說理的，並留有餘地的；三是允許反批評，批評者與被批評者是平等的，有往有來的。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批評的那些觀點，

包括《苦戀》的所謂錯誤，純屬不同的學術觀點和藝術觀點的爭論，只能通過平等的、自由的討論（也可以叫批評）來解決。通過爭論、討論仍然達不到一致認識的，應允許人家保留觀點，留待實踐的檢驗，決不能因為人家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以權力改變人家的工作。

胡耀邦很贊同中宣部部長朱厚澤同志提出的「三寬」——要造就一個寬鬆的思想學術環境和藝術創作環境；對不同的意見要寬容；對確實犯了錯誤而願意改正的人要寬恕，為的就是活躍思想，增進團結，發展文化和學術。這個「三寬」很得人心，雖然隨著胡耀邦的辭職，特別是隨著1989年「六・四」而受到批判，但至今仍為廣大知識份子所深深懷念。

在大專院校，胡耀邦也想營造一種寬鬆的、活潑的、有秩序的學習環境。有一個時期，許多大專院校對學生的思想管得很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外的許多學說不準接觸，怕學生受不良影響，而對學生的行為卻管得很少，甚至處於無人管理狀況，有的學生在宿舍裡通宵達旦地打麻將，既不利於自己身體健康，又妨礙別人的正常休息。當時流傳一種說法：大學生中主要有兩派——託派和馬派。

「託派」，指的是那些整天準備考「託福」，一心想出國留學的人。「馬（麻）派」，指的是那些搓麻將打發日子的人。對此，胡耀邦認為該管的沒管，不該管的亂管，工作重心搞顛倒了。他主張對學生的思想要管得

鬆，要鼓勵學生接觸各種思想，研究各種學說，鼓勵學生在一定範圍內開展自由討論、議論，並允許用一定的形式（如壁報）發表。但在行動上，要經過大家討論訂出幾條共同遵守的紀律，以維持學校的正常秩序。總之，他主張學生思想要活躍，行動要遵守紀律。當時聽了這些意見，我感到胡耀邦很想在我們的大專院校裡，發揚蔡元培先生當校長以後的北京大學的優良傳統。

鄧小平點名要開除王若望、吳祖光、劉賓雁、王若水等人的黨籍，本來是一種以權代法（黨章）的行。別的人我不清楚，劉賓雁、王若水我太瞭解了。劉賓雁對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堅決與之鬥爭，真心愛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人，沒有不敬佩他的勇氣的。即使他對一些黨員和黨組織的批評很尖銳，甚至有點刻薄，或者言過其實（現在回頭看並沒有言過其實），但他並沒有反對共產黨。直到1989年被迫去國的時候，他仍然認為在當今的中國，沒有一個政黨能夠代替共產黨的領導。這樣富有戰鬥性的黨員被鄧小平批評時，《人民日報》的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不說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認為批錯了。

胡耀邦辭職以後，中紀委下達文件叫開除劉賓雁出黨，正直的共產黨員莫不感到痛惜。劉賓雁所在的黨支部討論中紀委決定的時候，沒有一個黨員同意開除的。中紀委沒有辦法，決定繞開支部，由報社黨委紀委表決通過。可報社紀委委員也想不通。經報社領導反覆做工

作，委員們總算同意了，但在正式表決的時候，仍發表聲明說：思想不同意，舉手只是出於組織服從。中紀委鑒於開除劉賓雁出黨遭到基層黨員反對的情況，勸王若水退黨的時候，乾脆下達紅頭文件，即以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下達文件。這樣，《人民日報》黨委和基層組織，就只能執行，不能討論。



劉賓雁在「六四」後流亡美國，力求歸國不得，於2005年12月去世。

胡耀邦確實想保護一些被鄧小平錯誤批判和要處理的人，但這些人並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化分子」。這些人在反對「兩個凡是」、撥亂反正中都是有功之臣。他們反對的只是共產黨內的腐敗分子和不民主的缺陷，反對毛澤東的「左」的路線及其思想影響。他們希望共產黨能夠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應該說，他們只是對一些問題抱有獨立見解的、真正熱愛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人。胡耀邦一生光明磊落，從不搞個人小圈子，也反對別人搞小圈子，他保護這些人，為的是給共產黨和中華民族保留一些積極推進改革的力量。

（四）堅決反對鎮壓學生運動

「鎮壓學生運動的沒有好下場」。毛澤東晚年說過許多錯話，但這句話卻說對了。可惜，也像其他正確的觀點一樣，毛澤東只是說給別人聽的，自己並不打算實行。在他逝世前的1976年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轟轟烈烈的「四．五」運動，群眾提出的要求與他的思想相衝突時，他便毫不猶豫地下令鎮壓，開了共產黨鎮壓群眾運動的先河。在半個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或者沒有這些頭銜的實際上的第一把手，只有胡耀邦和趙紫陽，自始至終堅決主張對學生運動和其他群眾運動採取疏導方針，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決反對採取鎮壓手段，即使威脅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也不動搖。

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發生的最大的學生運動在1986年。也是這次學生運動直接導致胡耀邦的辭職。

這次學潮發生在1986年12月。當時任安徽合肥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於11月分別在上海交通大學和同濟大學作講演時說：「社會主義運動是個失敗，全盤西化才是現代化的唯一出路」。於是有人就把這次學潮的發生歸咎於方勵之，說是他煽動起來的。有人還乘機造謠說，這次學潮與劉賓雁在廣州作報告有關。劉賓雁聽了十分驚訝。他說：「我根本沒去廣州，何來作報告？」連比較開明的胡啟立也接受這種觀點。他在12月27日召開的一個會上說：這次學潮之大，波及地方之多，是解

放以來所沒有的、出乎意料的，經驗教訓要總結。其中一條是，我們的教師、幹部講馬列主義不聯繫實際，不回答學生的思想問題，給那些搞自由化、發表不負責任演說的人以可乘之機。他們作講演、寫文章倒是聯繫實際的。

過高估計少數人的鼓動作用，以為幾個人就能鼓動數以萬計的群眾上街遊行請願，這是中國的傳統說教，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蔣介石，開的都是這個方子，都不過想借機打擊自己的政敵和那些持不同政見者。這個政治毛病，連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共產黨也不能免。

實事求是地說，這次歷時近一個月的學潮，是從安徽合肥市二千多科技大學學生上街抗議省委違背諾言，禁止學生參與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競選開始的，蔓延幾個省市，大小三十多起，最後到上海達到高潮。

12月8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一個形勢漫談會，趙紫陽有個發言。他認為，儘管今年財政赤字比去年大（地方財政有盈餘），但經濟形勢是好的。（耀邦同志插話：到年底，已八年持續發展，超過建國初期七年半持續發展。）政治形勢也是好的，儘管有些大學生鬧事，但就事論事，三分之二是官僚主義引起的，只有三分之一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一般是要求政治體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比較出格的是山東大學，有人要求「共產黨滾出學校」。（12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學生上街時，有人喊出：「把馬列主義趕出中國理論

界！」）這種小鬧事，以後還會有，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一有人鬧事就以為形勢不好，就是政治不安定的表現。我們要學會和習慣在不時有人鬧事的環境中進行改革。

趙紫陽說，我們確實民主不夠，需要發揚民主和法制建設。我們要學會正確處理和引導鬧事。對於鬧事，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任自流。在這方面，香港英國當局很有一套。香港有些人聽說將在大亞灣建設核電站，怕核污染，起來鬧事，港英當局就組織人到已建設核電站的地方去參觀訪問，消除人們的顧慮。台灣對自由民主黨的處理也可以。我們現在最缺乏這種本領。

胡耀邦說，學生要求民主，選好人民代表，是正當的，應該支持，但要引導。

有些參加會議的同志說，對學潮，報刊宣傳時不要推波助瀾。如對政治體制改革，中央還沒有具體設想，心中無數，因此，宣傳、講話都要慎重，不要調子太高，把大家的胃口吊得高高的，結果辦不到，引起群眾的更大不滿。

這就是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

到12月下旬胡耀邦被迫辭職，中央對學潮仍堅持這個態度。上海是學潮起來較晚的，也是學潮鬧得較嚴重的城市。12月15日，同濟、交通、復旦校園開始出現大字報，有要求改善學生生活的，有呼籲加快進行民主改革的。交大一張披露一位研究生參加搖滾音樂會時被公

安人員毆打的大字報，最引起公憤。星星之火，一下子就蔓延整個城市。對此，胡耀邦指示採取「疏通與對話」的方針，並派曾任上海市副市長、時任公安部部長的阮崇武去上海，確保按照「疏通與對話」的方針行事，寬大對待學生集會遊行。

江澤民與學生代表對話。學生要求新聞自由，要求如實報導他們的遊行示威，要求享有貼大字報進行自由公開辯論的權利，承認遊行示威合法，保證對參加學潮的學生不採取壓制行動。江澤民由於以訓人的口氣說話，兩次與學生嚴重衝突，兩次被學生包圍，兩次被交大校長鄧旭初救駕。

即使這樣，12月18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學潮的時候，仍然堅持「疏通與對話」的方針。與會同志發言時，雖然沒人說以爭民主自由為主要內容的學潮是好事，但卻認為是不可避免的，是時代潮流。從長遠看，只要我們在工作——改革開放中不犯大錯誤，大亂子是不會出的，小鬧則不可避免，要想恢復五十年代那種風平浪靜的狀態，是不可能的。全黨上下都要適應這種環境，要學會疏導、引導，學會運用法律武器同極少數懷有政治野心的人作鬥爭。大家都不贊成採取簡單、粗暴、鎮壓的辦法對待鬧事的群眾，不管他們是學生，還是工人農民。

有的人，如薄一波同志，講起學生鬧事，就責怪思想、理論、文藝和新聞界。胡耀邦同志不同意他們的觀

點。他說，宣傳部門工作不好做，粉碎「四人幫」以來，宣傳部長換了幾茬，沒有一個落得好評的。再往上看，不是犯「左」的錯誤，就是犯「右」的錯誤。報紙、電台，不出一點差錯是不可能的。出了一點差錯，希望大家諒解。

12月19日，上海市各大專院校學生都罷課，有五千（也有說一萬）學生上街，先在人民廣場，後到外灘市人民政府，要求和江澤民（市長）芮杏文（書記）對話。由於上海市對聚集在市府大樓前的學生採取驅趕的辦法，激起學生更大的不滿，到12月2一、22日，已有三萬學生上街，還有部份工人和農民。上海市領導有點緊張，向中央報告說，如果學生強行乘火車進京請願，妨礙鐵路運輸，準備調動警備區部隊。胡耀邦、趙紫陽堅決不同意，仍要求他們對學生、工人、農民採取疏導方針，即使衝擊市委、市府，也不能用鎮壓的辦法。

這次學潮之大，波及地方之多，是解放以來所沒有的，是出乎意料的。由於自始至終都堅持對話引導，反對鎮壓的方針，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但這個方針，似乎沒有得到鄧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認可。

12月30日，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談話，雖然也肯定前一段對學潮採取引導的方針是必要的，但重點是批評領導太軟。他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

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上海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因此，鬧起事來後，上海人要看一看。

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整理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照我當時聽傳達的紀錄，發現有些話被刪去了。如說「元旦如果有人衝天安門，有一個抓一個，有一千抓一千，非流血不可也在所不惜，我們的形象決不會因此受到影響」。「王若望、方勵之早就叫開除了，還留在黨內幹什麼？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發起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就應該開除黨籍。」《人民日報》年青記者祝華新訪問已改正的錯劃右派知名人士，鄧小平質問道：「《人民日報》想幹什麼？」

鄧小平一表態，對胡耀邦任總書記以來所實行的改革措施心懷不滿的人很是活躍。對這次學潮，《人民日報》奉命不作任何報導，但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胡喬木仍批評《人民日報》，說「自從十二屆六中全會（86年9月）以來，沒有發表一篇宣傳兩個堅持（堅持黨的領

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文章，甚至發展到每天給啟立同志送大樣，等他看完才付印，如1957年反右派時鄧拓同志天天給我送大樣一樣」。胡喬木對《人民日報》的批評，給人一種「項莊舞劍」的感覺。

隨著胡耀邦的辭職，一場震撼全國的「反自由化」運動就在全國開展了。有的人不滿足於只在思想理論、新聞界進行整頓，想把「反自由化」運動擴大到經濟戰線，擴大到農村去。如有人說：「說自由化的受到了批評，幹自由化的仍受到重用！」「這是新的撥亂反正」等等。有人說過，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自由化的總根源。因此，所謂「幹自由化」，指的就是改革開放，就是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的廣大幹部和群眾，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領導人了。所謂「新的撥亂反正」，就是要重新回到毛澤東「左」道路上去。如果當時不是任代總書記的趙紫陽勇敢地及時制止，不知這一次反自由化運動鬧成個什麼樣子呢？

（五）關於四項基本原則

我在《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這個崗位上，聽到的傳達，看到的內部材料是比較多的。我感覺到胡耀邦與鄧小平第一次發生直接的公開的衝突，是在1986年9月在北戴河召開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

這次全會討論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是一個很好的、當時各

界評價很高的文件，因為它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對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並且提出要建設一個具有高度民主化的國家。也因為它提出了「高度民主化」，在以後的歲月裡，特別是1989年「六·四」以後，便很少有人提到它了，即使是講文明建設的時候，就如現在有些人講改革開放的歷史時不願提起胡耀邦、趙紫陽一樣。

據說，在討論這個決議草案的時候，對要不要在文件裡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不要提反對自由化，爭論頗為熱烈。一些很有影響的老革命家如陸定一、李維漢等，都不贊成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胡耀邦也傾向於這種意見。

陸定一、李維漢等同志出於什麼考慮不贊成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自由化，當時傳達時沒有介紹。聽傳達的人的理解是不盡相同的。我們幾個友好議論過這件事。我們贊成陸定一等同志的意見。

我們的理解是：六中全會討論和通過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它的物件是全國十二億人民，而不只是幾千萬共產黨員。對共產黨員，要求人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非常必要的，誰不想堅持，不願堅持，就不能留在黨內。但對十二億人民，就不能提這樣的要求。例如，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怎能要求人人必須信奉呢？人家不信奉，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來規範自己的行為，是合法呢，還是非法？是不是要開除他的國籍呢？如果說不合法，那與憲法規

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相矛盾；如果說是合法的，允許的，那又何必那樣寫進決議裡去呢？那豈不是自欺欺人嗎？這是一。

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也好，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也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包括鄧小平發起的「清污」在內，往往成為一些人用來打人的棍子。因為人們不是以實踐檢驗真理，而是以領導人的話定是非。領導認為你對了，你的意見就符合六條標準或四項基本原則；領導說你錯了，你就是違反六條標準或四項基本原則，你就是右派或自由化分子。在我們這個國家還沒有完全廢除以言定罪和很缺乏民主的情況下，在指導全民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裡，寫下這些過高的又不容易掌握的條款，其流弊將是無窮的。這是二。

還有三，就是不寫更有利於推進和平統一祖國事業。台獨是反對和破壞和平統一的，在台灣他們是極少數。多數台灣同胞是贊成和平統一的，但許多人對無產階級專政心存恐懼；真正獨立的政黨對憲法裡寫的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國家，即一黨專政是堅決反對的。當時海外有一種輿論，即台灣當局提出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或者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作為和平統一的政治基礎。這是明顯的拒絕一黨專政。不管怎麼樣，台灣現在的經濟生活水準比大陸高，政治民主化也超過大陸，如政黨公開、平等競爭，輿論不一律。在台灣，不管在朝在野，現在迫切要求三通的人很多，但迫切要求統一的人恐怕

不太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寫進文件裡，作為人民行動的準則，會給那些一心反對祖國統一的人以口實，也給贊成統一的廣大群眾增加疑慮。

可惜鄧小平和其他一些老人家們的想法不一樣。

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無論是當年聽傳達，還是現在看《鄧小平文選》，都感覺到鄧小平的強烈不滿情緒。鄧小平說的自由化思潮，來自香港、台灣的也好，來自內地的也好，都是根據幾十年來政治體制的弊端，要求政治民主化，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為政治不民主，權力缺乏權力的監督和輿論的監督，反對腐敗、反對不正之風老不見效，甚至

有越嚴重之勢，以致共產黨在群眾中的聲望日益下降。例如，當時有些大學競選學生會幹部，有的競選者以不是共產黨員相標榜。

還有當時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正副省市長時，實行差額選舉，除了省市委向大會提出候選人名單外，也允許代表們依法提出候選人。有些省市出現了競選團。如北京市的何魯麗（醫生）、吳儀（企業經理）同時當選副市長，並不是北京市委的初衷，而是市婦聯組織競選團幫助她們競選的結果。現在回頭看，代表們推薦的這兩位副市長，論德論才，比市委推薦的毫不遜色。這些新氣象的出現，說明我國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鄧小平不是通過改革克服政治體制中的弊端來對待這些思潮，不是利用這些新思潮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是想用禁止的辦法來消滅這些思潮。但一種思想、思潮，是禁止不了，消滅不了的。

鄧小平說，四項基本原則關鍵是二條，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是什麼，他自己說過，他也沒搞清楚；在全國十二億人中，有多少人搞清楚了？所以，所謂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隨意性是很大的。共產黨的領導，倒是很清楚的，不會產生誤解的，那就是共產黨專擅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壟斷各級政權的領導權，別的政黨只能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參政議政；誰不首先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非但不能參政議政，連存在的權利也沒有。所以，鄧小平政治觀點的核心，

就是維護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在中央全會上，在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裡，居然有人提出不寫上反對自由化，不寫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是總書記帶的頭，這在鄧小平看來，不是最大的挑戰，最大的叛逆嗎？正如趙紫陽說的，老人家們擔心，他們健在時就這樣，他們不在了，還能放心讓胡耀邦領導下去嗎？因此，可以這樣說，讓胡耀邦下台，是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家們早就計劃好了的，借學潮迫他辭職，只不過是提前實現這個計劃而已！

（六）民主實驗田

講胡耀邦的政治觀點，不能不講他同意和支持的蛇口民主實驗田。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工業區舉行了一場「中國青年教育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中國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報告員李燕傑、曲嘯、彭清一三人和蛇口青年近七十人出席。曲嘯在發言時，肯定了特區建設的成績，肯定了特區青年的貢獻，讚美他們不是「斷了線的風箏，而是騰飛的銀鷹」。但又說，來深圳的有建設者，有創業者，也有淘金者。淘金者肯定沒有市場……。他發言後，有一位青年發言，要求他解釋清楚什麼叫淘金者。他說，淘金者有什麼不好？美國的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機者的活動發展起來的……。我們到蛇口來，為什麼不能賺錢？淘金者賺錢，但沒有觸犯法律，無所謂過

錯……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澆鑄的。這樣，雙方就發生了一場辯論。青年人說完，彭清一就說：你敢不敢把名字告訴我？這個青年馬上趨前把名片遞上。會議不歡而散。事後，陪同三位專家去深圳的郭海燕（北師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外國青年研究室主任）為三人抱不平，整理一份《蛇口座談會始末》的材料，點了遞名片的青年的名，上報有關部門。於是，就引發了一場辯論。

對這次座談會，新聞媒介曾廣為介紹，對雙方觀點褒貶不一。8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蛇口風波」答問錄》一文，把有爭論的各方面的觀點介紹給讀者，並於8日開闢《關於「蛇口風波」的議論》專欄，把方方面面的思考和不同的觀點刊登出來。議論專欄於9月14日結束。在36天中，《人民日報》共發表不同地區、不同職業的作者文章共30篇，把在蛇口座談會上爭論的問題引向深入。

與《人民日報》開展議論的同時，還有《蛇口通訊》、《深圳特區報》、《中國青年報》、《人民政協報》、《工人日報》、《中國文化報》、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四川日報》、《南京日報》、《人民前線報》、《新觀察雜誌》、香港《文匯報》等報刊，也發表一些討論文章。這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蛇口風波」。

據《人民日報》負責編輯《關於「蛇口風波」的議論》專欄的馬立誠說，在討論的三十多天裡，報社共收到1531

件來稿來信，其中50%是各地及部隊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寫的；1531件信稿中，有266件傾向或者贊同李燕傑、曲嘯、彭清一的觀點，佔全部信稿的17.4%（見《蛇口風波》後記，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

十年之後，即1999年，袁庚（當年蛇口工業區的主要領導人）在《百年潮》(1999年2月號）上發表文章《蛇口的十年輝煌》中談到這件事時說：「現在回頭來看，這件事情其實很好理解。它的實質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衝突，是兩種不同的經濟體制下不同的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市場經濟講的是公平合理，計劃經濟講的是服從和無私奉獻。究竟如何取捨呢？請讓我打個比方：兩個人分蘋果，一個大，一個小，你拿大的還是拿小的？我說我拿大的，你便說我損人利己。那麼我反過來問，你願意拿大的還是拿小的？你說你拿小的。我便說，你這不是陷我於不義嗎？我還可以這樣說：既然你願意拿小的，那麼我拿大的豈不是正合你意，怎麼是損人利己呢？這樣就亂套了，就像《鏡花緣》裡的『君子國』，讓人不知所措。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這件事該這麼辦：假如這個大蘋果值5毛錢，小蘋果值3毛錢，我若挑大的便補償你1毛錢，若挑小的，你便補償我1毛錢，這樣公平合理，大家都沒意見。這個社會應該做到公平合理，合理才是道德的。當然，個人的道德行為另當別論，就整個社會的普遍原則來說，離開公平合理講無私奉獻，是帶強迫性的道德要求，只會造就另外一批

佔別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觀念與他們的經濟生活密切相關，他們不願意接受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準則，因此衝突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另一方面，在蛇口，人們已經習慣了公開地、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講錯了什麼，也不擔心禍從口出，再說這樣的事在蛇口已是司空見慣。」

在蛇口，為什麼人們已習慣了公開地、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講錯了什麼也不擔心禍從口出了呢？這就不能不說胡耀邦同意在蛇口搞民主政治改革試驗的事了。

袁庚在《蛇口的十年輝煌》裡用一節文字介紹民主政治改革試驗。下面是這部份內容的摘要：

>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表明，委人以重任又不加以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是非常危險的。「習俗移人，賢者難免」。幹部進入領導崗位之後，也就進入了大大小小的「權力圈子」，就有人自動送禮上門，如果不能自律，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而且委任下來的幹部是不大怕群眾的，只怕頂頭上司，怕上司不喜歡就當不成官。於是就欺上瞞下，甚或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公私不分。所以我們認為，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讓群眾監督幹部，群眾有權選舉和罷免幹部，是至關重要的。1983年春，胡耀邦總書記視察蛇口，取得他的同意，我們在蛇口工業區試行直接無記名民主選舉產生管

理委員會的辦法，通過了工業區選舉法（草案）。管理委員會兩年一屆。此外，選民每年對管理委員會投一次信任票，有過半數不信任票者下台。管理委員會經常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企業行政經濟情況和措施，接受幹部群眾的質詢。

我們主張政治有透明度，主張人民有知情權，有意識地要在蛇口這個地方營造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所以我們鼓勵群眾團體、專業團體和學術團體議政，不審查報紙稿件，讓大家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指名道姓批評領導幹部。半個世紀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要免於恐懼的心理，我們也想致力於這件事，就是使所有的同志首先在政治上免除發表意見的恐懼心理，只要不是號召推翻共產黨政權，不是人身攻擊，造謠惑眾的，一律不許有任何打擊報復，穿小鞋，不允許在蛇口發生以言論治罪的事情。

我們還竭力提倡各種新觀念：時間觀念、競爭觀念、資訊觀念、平等觀念、職業道德觀念，等等。

我們相信，要移植、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並不困難，難的是要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來適應這種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進步的人、進步的社會，是任何國家民族經濟起飛的大前提，沒有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經濟的繁榮最終也是靠不住的。就像光有瓦特的蒸汽機不能把西方世

界帶入現代，還必須有啟蒙運動和政治改良。整個中國現在仍然需要啟蒙運動。

社會主義民主要植根於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中。我們覺得蛇口工業區有適宜的土壤，因為蛇口是個現代化的工業社會，經濟尚算發達，人民受教育程度也較高，民主觀念和意識較強，生活比較安定，而行政效率也較高。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民主試驗之後，蛇口的社會道德風尚、人的思想境界、企業的經濟效益有了很大的進步。至今許多蛇口人還懷有一種「蛇口情結」，因為蛇口曾是一個沒有貪污，沒有腐敗，很乾淨的地方。至少到我離任的時候（1992年）止，這裡沒有發生過攜款外逃的事件，也沒有發生過惡性刑事案件。這裡沒有文盲，沒有販毒，沒有人在碼頭上跟在人家屁股後面換外幣。這裡有第一流的醫院、學校，第一流的師資。人們在這裡感覺受到尊重，感覺應該而且能夠在這裡發揮自己的才能。這裡造就磨練了一批年輕有為的幹部，成為工業區最寶貴的資本。

蛇口的經濟一直活躍而有序，沒有大起大落、冷熱交替的迴圈，十多年保持著20～30%的年遞增速度。業務範圍遍及工業、交通運輸、貿易、金融等領域，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這裡沒有誰敢搞重複建設盲目投資那一套，資金的回收情況都比較理想。

政治有透明度，人民有知情權，鼓勵人民議政參政，不審查報紙稿件，讓大家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指名道姓批評領導幹部，不以言治罪，人民直接無記名選舉領導機構，每年對領導幹部實行信任投票。也就是說，人民真正享有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權利，享有選舉和罷免官吏的權利，官吏的命運主要不是掌握在上司手裡，而是掌握在人民手裡。這是中國人民渴望了一個世紀的現代民主政治的雛形。正是在這樣的民主政治氛圍裡，蛇口工業區發生了人們敢於公開發表與所謂權威相對立的意見。在轟動全國的「蛇口風波」之前，還有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蛇口通訊報（中共蛇口工業區委員會機關報）不需送審就發表批評工業區一把手袁庚的讀者來信。黨報不能批評同級黨委及其領導人，這是共產黨報紙的第一條戒律，從蘇聯《真理報》到中國《人民日報》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報紙，都遵守這條戒律，蛇口通訊報公然打破這條戒律，也轟動了全國。當時，北京等地的報刊就發表文章歡呼這個創舉，《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同志更是在新聞界會議的講話中多次讚揚蛇口通訊報和工業區黨委的敢為天下先的民主改革的勇氣。

胡耀邦同意在蛇口進行民主改革試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這十年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谷牧和廣東的任仲夷、劉田夫等同志多方保護蛇口的民主試驗，也是了不得的。這個試驗在戈爾巴喬夫任蘇共

總書記之前，即在所謂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出現之前，比五十年代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的改革，不但更深刻，而且歷時更長，效果更顯著，可以說是第一次從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兩個方面，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無論是試驗者還是批准者、保護者，都得有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

據袁庚說，進入90年代，一位領導人知道蛇口的民主改革試驗以後說道：「讓我說什麼好呢？批評你們吧，不合適；不批評吧，全國都這麼幹，那不就亂套了嗎？」所謂「亂套」，指的就是共產黨領導人說了算，人民只能處於服從地位的局面不存在了，代之以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權力受到有效的監督的局面。為什麼批評又不合適呢？這是因為共產黨口頭上也講民主，講社會主義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高明，講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鄧小平1980年回答義大利一位記者問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時就說過：「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蛇口的民主改革試驗，儘管與這位領導人的想法不一樣，甚至很不一樣，但人民歡迎的事，怎麼好公開批評呢？經過十年實踐檢驗證明是好的蛇口民主試驗就這樣被迫停下來了。

袁庚沒有說這位負責人的姓名，但我們可以猜想，一言九鼎，一句話就能否定兩任總書記認可的事的，不會是中央一個部長級的人，甚至也不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或國務院副總理級的負責人。蛇口民主改革試驗的興起和消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決策層內兩種政治觀點、兩股力量的對立和消長。

（七）讓實踐來檢驗

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呼喚自由，呼喚民主政治，從戊戌算起，已逾百年，從「五四」陳獨秀明確提出唯民主與科學才能救中國算起，也已八十年。一百年，八十年，以每二十年為一代計，已經四五代人了，統治全國的政權也換了好幾茬，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還沒有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這不是因為中國人民不需要，而是因為歷朝的統治者從心裡不願意。慈禧太后以及辛亥革命以後一味想復辟帝制的北洋軍閥不用說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確有濃厚的民主意識，但在二十年代初，他領導的國民黨已成為國內最大的政黨的時候，他接受蘇俄的幫助，拒絕和反對當時蓬勃興起的聯省自治運動，導致這個很有希望的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夭折，至今想來還令人惋惜不已。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多年，一心搞他的「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視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民群眾如仇敵。毛澤東也講民主。1940年在《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裡，他批評蔣介石國民黨的「訓政多年，毫無

結果」，「言論不自由，黨禁未開放」。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不過，毛澤東講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而不是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權利的前提下的現代民主。

特別是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他一再批評把民主當作目的、當作一種政治制度的所謂資產階級觀點，說民主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這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他在未奪得全國的政權的時候，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只是為了爭取和團結其他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共同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他一再強調發揚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嚴厲批評那些聽不得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人「總有一天要霸王別姬」，也只是作為鞏固共產黨的領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手段。

他要發揚民主，號召群眾起來提意見，像在十年「文革」中提倡「四大」，號召紅衛兵起來造反，好像他很講民主似的，其實他提倡的「四大」，號召的「造反」，也是作為鞏固他個人的領導權，打倒他認為對他不忠，對他的領導地位可能構成威脅的人的一種手段，那怕這些人曾經是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親密戰友。而且

群眾的「四大」、「造反」，都是在他的高度集中指導下進行的，都必須按照他的旨意行事，否則便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締和鎮壓。

毛澤東領導新中國二十七年，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明白白地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也只是寫給外國人看的一種手段、招牌。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權利，在很多方面，還不如國民黨統治時期，甚至也不如北洋軍閥統治的時候。比如說言論、出版自由，北洋軍閥和蔣介石也想控制全國輿論，箝制全國人民的思想，但他們本事有限。在北洋政府統治時，除了官辦報紙，還有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新青年》等與北洋政府對立的民辦報刊；在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時候，除了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民晚報》、《新華日報》等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報刊，在大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上，除了官方的聲音，還有其他不同的聲音；除了執政的國民黨，還有其他獨立的政黨和群眾團體。

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全國輿論一律，全國只有一個聲音。不要看除共產黨外，還有這個黨那個黨的，他們宣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上，必須保持與共產黨一致。儘管全國登記註冊的大小報刊不下幾千種，但常常是千人一面，千報一腔。共產黨打擊知識份子之頻繁，打擊面之廣和毫不掩飾，手

段之殘酷，造成冤假錯案之多，不但蔣介石比不上毛澤東，連中國歷代封建帝王都要自慚不如的。

鄧小平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大刀闊斧，高瞻遠矚，功勞很大，在當代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中，沒有那個比得上他，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沒有跳出毛澤東的圈子。他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但又提出四個堅持，這與毛澤東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沒有兩樣，都是用來禁錮人民群眾的思想自由和獨立精神的。

1987年春，他審閱十三大政治報告草稿時，針對一段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文字說道：「我們的改革不能學資產階級三權分立，這個文件好像受了一點影響。我們的目的是保證行政系統（政府）有高效率的辦事能力，不能受人大（議會）的過多約束，搞得辦一件事很難。也要給下面放權，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要有利發揮群眾（包括幹部）的積極性。」鄧小平明白告訴人們，他與毛澤東一樣，講民主，只是作為改進領導作風，發揮群眾（包括幹部）積極性來完成一定任務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要不要給群眾民主，給多大民主，都是由領導決定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是領導的恩賜，不是人民生來具有的不應受侵犯的政治權利。

正是因為這樣，1977至1978年出現的西單民主牆，批評的鋒芒是對著「兩個凡是」的，對恢復和鞏固鄧小平的領導地位有利，鄧小平便加以讚揚，說西單民主牆如何如何的好，可是到1979年，有的文章對鄧小平的對

越自衛反擊戰的決策提出質疑時，鄧小平便說西單民主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並下令把作者投進監獄。接著，他便不斷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懲治那些持有不同政見的人。1989年春夏之交，以學生為主的要求政治民主改革，反對腐敗的群眾運動冒犯他的權威時，他便毫不猶豫地下令軍隊用坦克和機關槍加以鎮壓，造成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大慘案！

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講民主，講政治改革，都是要全國人民，包括憲法規定對政府有監督權的人民代表，都要順著共產黨領導人的旨意說話，按照共產黨領導人的指揮棒行動。民主，監督，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寧可讓共產黨的幹部，讓黨政機關因缺乏有效監督而一天天腐爛下去，像國民黨那樣，也不要不聽共產黨指揮的民主和監督！

胡耀邦同意蛇口進行的民主改革試驗，儘管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如不允許以言治罪中「只要不是號召推翻共產黨政權」，仍然有維護一黨專政的意思，若改為「只要不是號召以暴力推翻依法產生的人民政權的」就好了，但畢竟是把民主與人權法則聯繫在一起了，民主不只是手段，不只是領導作風，而且主要是目的，是一種政治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人民有權選舉、監督和罷免領導幹部，人民有公開政治見解的自由，人民有知情權，新聞媒介有批評任何幹部的自由。這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與法制的改革試驗。胡耀邦以總書記的名義同意、

鼓勵蛇口進行這個試驗，趙紫陽、胡啟立、萬里、任仲夷等同志支持和阿護這個試驗，說明他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走向的設想，跟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胡耀邦等是真正想把中華民族從一黨專政的胡同裡引出來的。

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胡耀邦反對共產黨對國家實行領導，反對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怎麼會反對共產黨對國家實行領導呢？怎麼會反對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呢？問題在於怎麼樣謀得領導權。有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種是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就是在憲法裡寫上：「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這條規定，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有資格領導國家，中國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別的政黨，群眾組織，都沒有資格領導。換言之，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其他政黨要想謀求執政黨位置，都是違反憲法的。這種一黨獨尊執政地位的體制，通常叫做一黨專政或一黨獨裁。

還有另一種思路，就是以胡耀邦為代表的，不主張靠憲法規定來保障共產黨的領導權，而是在民主的、公平

的、公開的競爭中爭取和保持領導權。像蛇口的民主試驗那樣，人民公開選舉領導人，人民公開監督領導人，大大小小的官員都得依法行事。所有政黨都是平等的，誰也用不著接受誰的領導，誰也用不著和誰保持一致。共產黨可以是執政黨，其他政黨也可以成為執政黨，一切都由人民決定。這就叫多黨制，也就是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

有憲法保障執政權，不怕有人來挑戰執政權威，這對共產黨來說，似乎是好事，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還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中國外國，一黨專政，往往變為少數人專政，領袖個人專政，個人獨裁。斯大林是這樣，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也是這樣。因為不怕被人奪去執政黨地位，處於權力中心的人，就往往處於無人監督，無人敢監督，無人可制衡的地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很危險的。即使不被暴力推翻，也難免自己慢慢腐爛下去。中國歷朝歷代的開國皇帝都比較有作為，因為他們是在競爭中走上權力中心的，剛剛奪得天下，行事比較謹慎，不敢太無法無天。以後的皇帝為什麼一代不如一代？因為他們是守成之君，一生下來就註定是當皇帝的，不怕被人奪走皇帝寶座，生長在深宮，脫離群眾，生活腐化，一個個都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有些人等不到人民起來造反或外敵入侵，他們的實際統治權已轉移到權臣、宦官或者外戚的手裡去了。這是封建時代。

近代如蔣介石的國民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論統治的地盤和人民，論軍隊的數量和裝備，論財力，中國共產黨沒法與他比，又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全力支持，為什麼僅僅三年較量，就被趕到台灣海島去了？這固然與中國共產黨領導英明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他自己太腐敗了，腐敗到不但老百姓反對，士兵不願意打仗，連一向扶持他的美國政府也扶他不起來了。再看看九十年代的蘇聯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權都是有憲法保障的，但都因一黨獨大，上上下下都沒有危機感，不思改革，幹部特殊化、官僚習氣日益滋長，越來越脫離群眾，所以經不起世界民主大潮的衝擊，便一個個從執政黨的寶座上滾下來。

放棄一黨獨尊的特權，與其他政黨一樣，要在平等的、公平的、公開的競爭中謀求執政地位就不同了。因為要競爭，全黨上下就不得不時時傾聽群眾的呼聲，處處考慮群眾的要求，居安思危，不斷改革，與時俱進。因為要受到權力制衡和監督，受到新聞媒介和社會輿論的監督，全黨上下就不得不時刻嚴格約束自己依法行事，如古人說的：「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決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自鳴得意地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經常處於激烈競爭環境中的政黨，就能保持旺盛的活力，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腐敗越反越重，大案要案越辦越多。多黨公平、公開競爭執政，對於共產黨本身，對於中華民族都有好處。

政治民主化，把以法治國與保障人權結合起來，這不是什麼新思想。在歐美民主國家，已實行了二百多年，在中國，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的領導人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早就提出來了。六十年前，陳獨秀研究蘇聯的情況以後就指出：「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民主之內容固然也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之全部內容，借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蘇維埃制若沒有民主內容，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但在中國，處於執政黨的最高領導地位真誠地將民主制度逐步付諸實踐的領導人，胡耀邦可以說是第一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在致力民主政治改革方面，至今還沒有一個人趕得上胡耀邦。

我們都清楚，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就是堅持一黨專政，即共產黨獨擅國家的領導權，對於重大的政治問題，全中國只能有一個觀點，一個聲音，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觀點和聲音。說胡耀邦對四個堅持態度曖昧，指的就是他不同意在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裡寫上「四個堅持」，同意在蛇口進行民主改革的試驗這兩件事。說胡耀邦對反自由化動搖，是自由化分子的保護傘，指的就是胡耀邦不同意對持有與黨不同政治觀點的黨內黨外人士以言定罪；對於要求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以學生為主體的群眾運動，只能引導而

不能鎮壓。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人家們之所以不放心胡耀邦的領導，就是怕有朝一日中國共產黨失去獨尊國家領導權的地位，中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變為多黨公平競爭領導權的政治民主化的國家。老人家們與胡耀邦的分歧，是把中國引向何處的分歧，是如何使中國共產黨長期保有戰鬥活力的兩種對立的思路的分歧。

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歷史，高度集權的專制思想影響深遠，胡耀邦的思想不見容於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家們，也不見容於那些靠擁護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得到好處的非老人家們，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是歷史潮流。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對中國政治走向的思考，孰是孰非，不是哪個權威說了算，而是如胡耀邦說的：「讓實踐來檢驗」！

2000-05-07 修改完畢

六四內部日記

作　　者　陸超祺
特約編輯　揚　生
出　　版　卓越文化出版社
香港英皇道信箱35277號
E-maill：info@leepo.net
版　　次　2006年1月第一版
國際書號　962-405-081-3
定　　價　港幣78元　海外16美元